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第二次安倍政權強化臺日關係之成因：

以安倍晉三個人層次分析

Explain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Abe's Second Term: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of Shinzo Abe

鈴木颯子

Fuko Suzuki

指導教授：廖小娟 博士

Advisor: Hsiao-Chuan Liao, Ph.D.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January, 2026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二次安倍政權強化日台關係之成因：

以安倍晉三個人層次分析

Explain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Abe's Second Term: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of Shinzo Abe

本論文係鈴木颯子（學號：R12322033）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  
碩士學位論文，業經下列考試委員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審查通  
過，並經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was completed by Fuko  
Suzuki (Student ID: R12322033)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the  
undersigned committee members on December 19, 2025.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指導教授 Advisor）

## 謝辭



回顧在臺灣的兩年半，初次來臺並進入研究所之時，因語言上的不安，別說撰寫碩士論文，連跟上每一堂課的進度都已經相當吃力。首先，我要深深感謝廖小娟老師。老師始終營造出便於諮詢的氛圍，特別是在外交決策分析專題的課程中，為我確立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在關於碩士論文的諮詢中，老師每次都給予極為精準的建議，使我得以釐清研究中的不足之處，並順利完成本論文。

我也要感謝口試委員何思慎老師。碩一時，老師允許我旁聽大學部日本外交的課程，使我從中獲得許多啟發。每次見面時，老師都以明朗的態度給予鼓勵，使我深受鼓舞。何老師在日本外交領域的深厚知識，更為我帶來了許多新的省思。同時，我也感謝唐欣偉老師。老師在理論面所提出的精準指正，使我能夠進一步提升論文的理論性與嚴謹度。

此外，我也要衷心感謝在留學與研究生活中支持我的 R12 及 623 的夥伴們，能夠與大家相遇令我感到十分欣喜。特別是陳思宇學長、南愛莉學姊與鄭博偉，在許多時刻給予我協助與支持，正因為他們的陪伴，我才能順利完成本論文。

另外，在留學期間的前兩年，我獲得臺灣教育部的資助，最後半年則受到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的經費支持，在此深表感謝。

最後，我要感謝在日本的父親鈴木靖隆與母親鈴木麻子，感謝他們相信我、讓我踏上臺灣的求學之路，並始終給予無限的支持與鼓勵。此外，我也要感謝在日本的土橋正義，在兩年半的遠距離生活中，他始終信任並支持我，成為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對於所有在本論文完成過程中給予支持與協助的師長與夥伴，若少了任何一位的幫助，我都無法順利完成本研究。在此再次致上深深的謝意。回顧這段旅程，我以自己的決定赴臺攻讀研究所並在臺大政治學研究所完成論文為榮。未來，我也希望能持續抱持挑戰與探究的精神，踏實而真誠地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 摘要



自 1972 年日中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臺日之間並無正式外交關係，加之臺日關係的發展牽動日中與兩岸關係，使臺日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限制。然而，2012 年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後，日本的對臺政策呈現明顯積極化，臺日關係被評為自斷交以來達到最高水準。本研究旨在探討此一對臺政策變化如何被解釋。先行研究主要依賴國際層次，例如美中對立與東亞安全環境變化，或國家層次，例如日本國內政治與官僚機構之角色。然而，僅以此二層次難以充分解釋安倍政權對臺政策中的理念性表述與具體政策成果。因此，本研究著重於安倍晉三之信念、動機、決策風格與人際風格，從個人層次分析其對臺政策積極化之原因。

本研究採質性文獻分析法，並納入政治領導人研究之視角。首先，透過與安倍以前之臺灣政策比較，呈現安倍政權對臺政策的特殊性。其次，分析安倍自家庭與社會環境等背景中所形成的個人特性，並進一步探討其在第二次政權以前的外交經驗如何強化其特性。最後，分析上述個人特性如何具體影響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的日本對臺政策。實證部分以《外交青書》中臺灣相關表述之變化、《臺日漁業協議》之締結過程及原因、臺日政府間交流以及領導人於社群媒體上的互動等為代表性案例，分析安倍個人特性如何反映於具體政策成果之中。

本研究的分析顯示，第二次安倍政權對臺政策的積極化，深受安倍個人特性所影響，包括其以保守主義為基礎的理念性信念、對中國軍事崛起的威脅認知與企圖脫離戰後體制的戰略性動機、帶有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色彩的決策風格，以及以元首外交與親信任用為特徵的人際風格。透過導入政治領導人研究的視角，本研究補充既有以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為中心的分析，提供理解政策形成過程之更具多面性的分析架構。

關鍵字：安倍晉三、臺日關係、日本對臺政策、領導人個人特質、決策風格

## Abstract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2, Taiwan and Japan have maintained no official diplomatic ties. As developments in Taiwan – Japan relations could affect both Japan–China rela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bilateral relations were long constrained. However, follow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in 2012, Japan's Taiwan policy became markedly more active, with Taiwan – Japan relations widely regarded as reaching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diplomatic sever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is shift in Japan's Taiwan policy can be explained.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predominantly relied on international-level factors, such as U.S.–China rivalry and regional security changes, or state-level factors, such 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bureaucratic dynamics. Yet these perspectives alone are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discursive framing and concrete policy outcomes under Ab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Abe Shinzō's beliefs, motivations, decision-making style, and interpersonal style, analyzing the policy shift from an individual-level perspective.

Using qualitative document analysis and a political leadership approach, this study first situates Abe's Taiwan policy in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then analyzes how his family and social background shaped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his diplomatic experience prior to 2012 reinforc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ly,

the study examines changes in Taiwan-related language in the Diplomatic Bluebook, the negotiation and signing of the 2013 The Taiwan-Japan Fisheries Agreement, intergovernmental exchanges, and leader-level interactions on social medi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shift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be's conservative ideological beliefs, his perception of China's military rise as a security threat, his strategic ambition to "cast off the postwar regime," his realist and pragmatic decision-making style, and his interpersonal style characterized by top-down summit diplomacy and appointing relatives and close ideological allies to key positions. By introducing a leadership-centere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mplements international- and state-level explanations and offers a more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Japan's Taiwan policy-making process.

**Keywords:** Abe Shinzō; Taiwan – Japan Relations; Japan's Taiwan Policy; leader personality; decision-making style

#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謝辭 .....	ii
摘要 .....	iii
Abstract .....	iv
目次 .....	vi
圖次 .....	x
表次 .....	x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3
壹、國際層次 .....	5
貳、國家層次 .....	10
參、個人層次 .....	14
肆、小結 .....	15
第三節 研究設計 .....	16
壹、理論與分析架構 .....	16
貳、研究方法 .....	21
參、研究限制 .....	22
第二章 第二次安倍政權前的日本對臺灣政策 .....	24
第一節 戰後至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 .....	24



第二節 1972 體制下：第一次安倍政權之前 .....	26
第三節 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 .....	29
第四節 小結 .....	31
第三章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環境因素 .....	33
第一節 國際結構與中美競逐 .....	33
壹、歐巴馬政府時期之美中關係（2012－2017） .....	33
貳、川普政府時期之美中關係（2017－2020） .....	36
第二節 國內氛圍 .....	38
壹、民主黨執政時期日本對中國認知的變化 .....	38
貳、東日本大震災援助所引發的日本對臺認知變化 .....	42
第三節 小結 .....	44
第四章 影響安倍決策的個人因素 .....	46
第一節 結構層面—家庭環境 .....	46
壹、岸信介的價值觀與臺灣重視背景 .....	46
貳、安倍晉三的童年時期與對岸信介的認知建構 .....	49
第二節 結構層面—教育與社會環境 .....	52
第三節 結構層面—早期政治經驗 .....	56
第四節 安倍的個人特質 .....	59
壹、信念 .....	59
貳、動機 .....	62
參、決策風格 .....	65

肆、人際風格.....	69
第五節 小結.....	72
第五章 影響安倍決策的媒介要因.....	75
第一節 對外交的關注程度.....	75
第二節 與外交相關的訓練或經驗.....	76
第三節 對環境的敏感度.....	82
第四節 小結.....	85
第六章 安倍日本對臺政策與行動.....	87
第一節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臺灣政策之形成.....	87
壹、對臺政策的總體方向與基本理念.....	89
貳、實務層面的推進.....	93
參、人際互動與象徵外交.....	103
肆、小結.....	110
第二節 比較安倍兩任政策.....	111
第三節 卸任首相後與臺灣的互動.....	113
第七章 結論.....	117
第一節 安倍個人特質對臺政策的影響.....	117
第二節 後安倍時期的發展.....	118
第三節 研究貢獻與未來展望.....	121
參考文獻.....	124
壹、中文部份.....	124



貳、日文部份 .....	125
參、英文部份 .....	136



## 圖次

圖 1 政治領導人個人特性與其政府外交政策表現之關聯性 .....	17
圖 2 解釋外交行為的三個層面 .....	19
圖 3 個人層次因素與臺灣政策形成 .....	21



# 表次

表 1 第二次安倍政權對臺政策主要動向年表.....8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前首相安倍晉三於 2021 年表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sup>1</sup>若臺灣發生緊急情況，不僅釣魚臺將陷入危機，中國為了包圍臺灣海峽，亦可能派遣部隊進軍至沖繩縣的先島群島，包括與那國島和宮古島等，導致這些島嶼遭受攻擊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sup>2</sup>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及中國頻繁進行軍事演習等威脅加劇，日本國內關於「臺海有事」的報導日益增加，「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認識也日漸普及。臺灣從地緣戰略及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被視為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與安全保障上的重要一環。再加上臺日共享民主主義等基本價值，雙邊關係對東亞局勢具有深遠影響。此外，由於臺日與中國、美國在政治與經濟層面均有密切聯繫，雙邊關係也將受到美中關係及其權力平衡的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影響全球局勢。因此，筆者認為，若要考量未來東亞乃至國際形勢，臺日關係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自 1972 年簽署《日中聯合聲明》以來，臺日關係長期受到結構性的限制。當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下與中華民國斷交，自此以後，日本以「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為原則與臺灣進行交流。臺日之間的實務往來始終是在不妨礙日中友好關係的前提下，或是在日中建交所奠定的基本方針之框架內進行，臺日政府之間的關係僅限於非官方的往來。

然而，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日本對臺的態度已不再侷限於經濟交流等非政治層面，而是更加強調安全保障與共享價值的外交立場。具體而言，包括：2012 年 3 月 11 日邀請臺灣出席以往未曾受邀的「東日本大地震二週年追悼儀式」；在 2015

<sup>1</sup> 原文如下：「臺灣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る。」

<sup>2</sup> 本研究採「釣魚臺」之表述，日文稱「尖閣諸島」。



年版《外交青書》中，將臺灣定位為「極其重要的夥伴與朋友」；2013年4月10日簽署睽違17年未能締結的《臺日漁業協議》；2015年10月6日至10日接待尚未當選的蔡英文訪日；以及2017年3月25日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臺等政府間交流的增加，此為自1972年斷交以來，日本政府副大臣級官員首度正式訪臺。這些在安倍第二次政權所達成的具官方意涵的往來，卻從未在過去日本歷屆政府的議程上，為何能夠在安倍第二次政權的時候發生呢？

許多學者與媒體均評價安倍政權為歷來最重視並積極推動臺日關係發展的日本政府。例如，以研究臺灣選舉聞名的小笠原欣幸指出「自1972年日華斷交以來，安倍政權是對臺灣最為友善的日本政府」(小笠原欣幸，2020)。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熟悉中國與臺灣事務的平川幸子也指出，安倍外交的一大成果正是突破歷任首相因顧慮中國立場而無法積極推進的臺日關係(平川幸子，2022)。從事臺日關係研究的李易璵亦指出「在第二次安倍內閣之下，臺日關係顯然有所發展。從中央政府至地方自治體，皆可見全面性交流。安倍首相多次公開表示臺灣是重要的朋友，促使過去在對臺外交中被視為障礙的所謂『臺灣問題』逐漸淡出，臺日關係也因此邁入新階段」(李易璵，2016：175)。這些觀點清楚顯示，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之下，臺灣已不再只是日中關係中的「臺灣問題」，而是作為臺日關係的主體，雙邊關係的構築也正式展開。

如何回答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日本對臺政策發生變化的原因，過往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從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等三類。其中，國際層次與國家層次的研究相對豐富，從個人層次出發的研究則多係指出安倍晉三個人對於臺灣的重視，但對於其重視臺灣的整體背景，以及個人特質如何具體反映在日本的對臺政策中仍缺乏深入探討。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透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與內閣人事局等措施，顯著強化了首相的權限，因此可以推論安倍本人在政策決策上具有極高的影響力。況且，安倍早在1994年當選眾議院議員的翌年，便以自民黨青年局成員的身份訪問臺灣，可見其自早期即已將臺灣視為重



要課題。再加上，其在政治判斷和對臺的重視上，也有可能深受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之影響，因此，若能進一步釐清這種世代間連結的背景，將有助於從更根本層面理解安倍重視臺灣的原因與政策意圖。

總而言之，安倍晉三個人從日本政府制度、從其家學淵源、從個人特質來看，都對日本對臺政策有直接決策權和影響力，本研究則想要進一步探究安倍對臺友好立場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與戰略，並分析其個人特質如何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具體影響對臺政策的制定，從而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對臺政策的全貌。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圍繞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展開探討：

第一，安倍有哪些經歷與背景塑造了他的信念、動機等個人特質？

第二，這些特質又如何塑造其意圖，進而形塑他對臺友好的立場？

第三，安倍的個人特質又是如何具體影響第二次安倍政權下的對臺政策？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關於第二次安倍政權（2012 年至 2020 年）日本對臺政策的評價方面，整體來說安倍首相長期執政的表現，在內政方面評價兩極，支持與批評皆有，但在外交層面上，整體而言獲得了高度一致的正面評價（平川幸子，2022：66）。而其眾多外交成果中，臺日關係的提升尤為引人注目。許多先行研究指出，第二次安倍政權在對臺政策上展現出高度的積極性，較歷屆內閣更為重視與臺灣的關係，並在臺日關係的實質發展上取得顯著成果。小笠原欣幸（2020）認為，安倍政權為自 1972 年日華斷交以來最為友善的日本政府。平川幸子（2022）則指出，安倍突破了歷任首相多因顧慮中國立場而無法推進的對臺政策限制，成功將臺日關係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李易璵（2016）亦觀察到，安倍任內臺日雙方不僅在中央層級，也在地方層級展開全面交流，「臺灣問題」逐漸淡出，臺日關係進入新階段。林賢參（2017）則明確指出，安倍內閣相較於過去歷任內閣，對臺關係之重視程度有明顯提升。事



實上，無論是邀請臺灣出席「東日本大地震二週年追悼儀式」、在《外交藍皮書》中將臺灣定位為「極其重要的夥伴與朋友」，還是促成《臺日漁業協議》的締結、交流協會名稱的變更，以及政府間交流的增加等，安倍政權皆實現了過去歷屆政府因顧及中國立場而無法實現的多項舉措。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則指出，自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特別是自 2017 年或 2018 年起，臺日關係有些停滯不前。例如，何思慎與楊雯婷指出，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最重大的成果是 2013 年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即使在民進黨執政的 2017 年，雙方仍成功推動了交流協會的名稱變更；然而，自 2018 年以來，隨著日中關係逐步改善，臺日關係的發展卻陷入停滯（何思慎、楊雯婷，2022：84、96）。此外，川島真指出，安倍政權自 2017 年夏季前便開始著手改善對中關係，對臺關係的強化因此似乎一度被擱置（川島真，2020：8）。野島剛亦指出，相較於馬英九政權時期所取得的具體成果，外界原本對「親日」的蔡英文政府寄予厚望，然其任內的臺日關係發展並不順利，亦未見顯著成效（野島剛，2017）。小笠原欣幸亦指出，鑑於臺灣方面持續對福島周邊五縣的食品實施進口管制，儘管日方不斷敦促蔡政府解除相關限制，卻遲遲未見進展，致使 2017 年以後，安倍政權對臺的積極作為日趨減少（小笠原欣幸，2020）。

誠然，上述文獻指出安倍啟動對中關係改善的同時，臺日關係發展的動能有所減弱，這樣的觀察確實值得關注，這亦很可能與安倍對臺灣的認知有所關連。然而，這類評論主要指出的是臺日互動缺乏以往那般的速度感與積極性，並不代表安倍已不再重視臺灣。此外，被認為積極性減弱的原因之一，也有可能是因為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日方可推動的事項基本上已大致完成，導致難以再產生新的具體成果；另一方面，自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上臺以來，中國對於臺日關係接近的敏感度也有所提高，因此對日本而言，相對地更難展現出積極推動對臺關係的行動。

雖然對於安倍對臺積極態度的具體程度仍存有分歧，但學界普遍認為，第二次安倍政權確實大幅推進了對臺政策。實際上，協會的更名以及赤間總務副大臣的訪

臺皆發生在 2017 年之後，而自該年起，《外交青書》中對臺灣的定位也持續提升。平川幸子特別指出「安倍政權前半期對應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政權，2016 年起則轉為民進黨的蔡英文政權。然而，在整個安倍執政期間，臺日關係自 1972 年斷交以來，已實質性地提升至歷來最高水準」（平川幸子，202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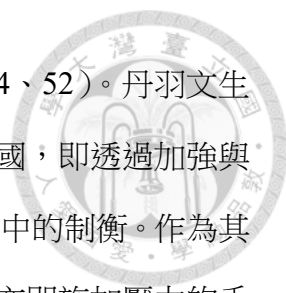
在此基礎上，以下將把「第二次安倍政權積極推進對臺政策的原因」按照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進行梳理與檢視。

## 壹、國際層次

在國際層次的因素中，學者們多點出安倍對臺政策的考量鑲嵌在至少三組雙邊關係之中：日中關係、兩岸關係和日美關係。以下分別討論之。

### 一、日中關係

許多學者指出，安倍接近臺灣的原因在於將臺灣視為對中國的外交籌碼。平川幸子指出，自 2010 年代以來，日本外交所面臨的最重要課題，是如何因應開始挑戰亞洲區域秩序的中國崛起。對此，安倍首相藉由強調「法治」等普遍價值觀予以回應。「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正是安倍外交理念與戰略的結晶，而在此構想中，特別受到重視的乃是東協與臺灣——這些地區不僅共享相同的價值觀，並在民間層面建立了緊密關係，同時也正是中國擴張影響力的主要目標（平川幸子，2022：66-67）。林賢參亦指出，安倍首相於 2016 年 1 月的國會答辯中，將中國在東海的軍事行動，以及對釣魚臺日本實質控制的挑戰，視為威脅日本領土、領空與領海主權保障的外交與安全危機。為因應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安倍首相不僅持續強化日美同盟與防衛合作，並以「地球儀俯瞰外交」之名，強調「不僅應關注雙邊關係，而是以俯瞰地球儀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推動以自由、民主、基本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戰略外交」，其中亦特別重視臺灣。他認為，避免臺灣向中國傾斜、避免兩岸統一，並將臺灣納入對中風險分散的



戰略，已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的重要目標（林賢參，2017：44、52）。丹羽文生亦指出，安倍所推動的「價值觀外交」，其最大目的在於牽制中國，即透過加強與共享民主、法治及尊重基本人權等價值之國家的關係，以達成對中的制衡。作為其中一環，強化與臺灣的關係則被視為對中國的一張「外交牌」，亦即施加壓力的手段（丹羽文生，2018：163）。陳友駿則說明，對安倍政權而言，若要牽制中國，臺灣問題始終是一張有效的「政治牌」，特別是在日中關係陷入僵局之際更顯重要。事實上，即便在親中派的馬英九政權時期，安倍政權亦展現出對臺灣的支持與靠攏。此舉被視為將臺灣納入「圍堵中國」戰略的一環（陳友駿，2016：134、141）。李易璵指出，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後，「臺灣牌」與「牽制中國」等用語在媒體與學界之間廣泛討論；在「積極和平主義」的框架下，臺日交流確已成為日本外交中牽制中國的有效「臺灣牌」。事實上，日本每當加深與臺灣的關係時，中國便會敏感回應並表達不滿（李易璵，2016：173-174）。實際上，第二次安倍政權十分重視安全保障議題，而安倍晉三所提出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球儀俯瞰外交」「價值觀外交」等理念，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因應中國崛起。吾人認為在此脈絡下，積極推動與臺灣的關係，確實帶有以對抗中國崛起為目標之秩序建構意涵。

這些觀點認為，日本為牽制中國而接近臺灣，並將其視為一張外交牌。然而，也有學者主張，這同時意味著臺日關係相較於日中關係居於次要地位；他們指出，一旦日中關係相對穩定，日本往往會擱置對臺關係的提升。何思慎與楊雯婷指出，當日中關係緊密時，日本擔心發展對臺關係將導致日中關係惡化，因而有所顧慮；相反，當日中關係惡化時，日本的對臺政策則轉向友好且積極。換言之，日本藉由打出臺灣牌、推動對臺關係發展，以增添中國的不安，進而促使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讓步，或形塑對日本有利的局勢。然而，他們亦強調，此種日本對中與對臺政策的連動，其背景在於「1972年體制」，就日本而言，對中關係遠較對臺關係重要，故每當日中關係走向改善之際，臺日關係往往被擠壓至次要位置（何思慎、楊雯婷，2020：97-98）。中國的崛起固然構成威脅，然而對日本而言，中國尤其在經濟層面



上仍是不變的重要存在。日本依舊受制於「1972年體制」，承認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並與臺灣無邦交。是以，日本對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對中政策影響。實際上，有學者指出，自2017年以來，日本對臺政策已不若以往積極，而其原因之一即為日中關係的改善。2012年上臺的第二次安倍政權，最初一年對已然惡化的日中關係採取觀望態度。然而，2013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使日中關係陷入谷底。為打破該局面，安倍於2014年的施政方針演說中開始提及改善日中關係，並逐步釋出修復關係的訊號，展現出對中方更積極的姿態。自2017年起，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攜首相親筆信訪中，並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顯示安倍政權對中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轉向（川島真，2020）。另一方面，在對臺政策上，有學者指出，自2017年初交流協會更名以及赤間總務副大臣訪臺以來，並無顯著成果（何思慎、楊雯婷，2022；川島真，2020）。

然而，依據安倍的說法，這一時期對中國的靠攏，與其說是「從對立走向包容」（対立から包摂へ），不如說是一種「戰略性包容」（戦略的な包摂）。其背後不僅包含日本認為自身參與能推動更高品質基礎設施建設的考量，也同時意在測試：當日本選擇合作時，是否能促使以國營企業為主的中國，對齊那些共享民主等基本價值觀的國家標準。此舉正是一種「若彼此關係能帶來利益便合作」的戰略性互惠關係（安倍晋三等，2023：301-302）。

綜上所述，安倍政權的對臺政策雖仍因「1972年體制」的制約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日中關係變動的影響，但同時也不可忽視的是，作為安倍所主張的「價值觀外交」及其他戰略構想的核心之一，臺灣正逐漸成為日本區域秩序建構中的重要夥伴。

## 二、兩岸關係

許多學者指出，當兩岸關係穩定時，臺日關係較容易發展。何思慎和楊雯婷指出：「日本的對臺政策往往放在對中政策的框架下，因此當兩岸關係過度緊張時，日本為了避免刺激中國，在對臺政策上會更謹慎，以免開罪對臺日關係異常敏感的

中國。...尤其，比起美國，日本曾經在甲午戰爭打敗清國使其割讓臺灣，殖民臺灣五十年之久，日本與臺灣在歷史上曾有的連結，讓中國更忌憚臺日之間的接觸」（2022：99）。當兩岸關係處於不穩定狀態時，中國對臺日關係的接近表現出高度敏感性。

實際上，有學者指出，在兩岸關係相對穩定的國民黨馬英九政權時期，臺日關係得以較為順利地發展；然而，在民進黨蔡英文政權時期，由於兩岸關係惡化，臺日關係的進展便相對停滯。門間理良認為，在馬英九政權時期，臺日關係之所以能順利發展，是因為中國對馬英九政府抱持一定程度的安心感，認為即使臺灣與日本的關係有所進展，也並非意圖謀求臺灣獨立（門間理良，2017：47）。此外，松田康博亦在《臺日關係史》中指出：在馬英九政權時期，由於兩岸關係改善，臺灣在推動與其他國家關係發展時，形成了一種中國較難加以阻止的氛圍。其原因在於，若中國在臺灣推進與日本關係改善時公開阻撓，便會使馬政府在臺灣內陷入政治不利地位，反而有利於民進黨。兩岸關係的穩定，使臺日關係的政治敏感性降低，從而成為推動臺日實務關係發展的重要助力（川島真等，2021：245）。

在馬英九政權下臺日關係的發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許多學者評為第二次安倍政權最大成果的《臺日漁業協議》之締結，普遍被認為正是因為有兩岸關係的穩定才得以成功。石原忠浩指出，在馬英九政權下，由於兩岸關係相對穩定，通常被視為臺日關係發展最大障礙因素的中國，其在漁業談判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石原忠浩，2023：166）。福田圓亦指出，臺日漁業談判雖由臺日雙方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但其得以實現的更大區域政治背景，則在於自馬英九政權上臺以來的兩岸關係穩定。中國雖對此協議提出批評，但因若馬政權在臺灣失去支持，「一中」前提可能動搖，故未採取損及臺灣利益的行動，亦無法加以干涉（Fukuda, M, 20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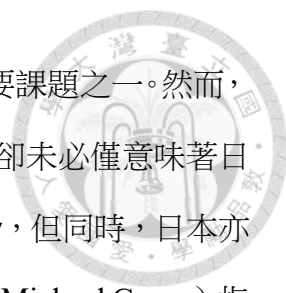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當兩岸關係維持穩定時，中方不至於過度敏感，日方亦能較為放心地推動臺日關係發展，因此兩岸關係的穩定成為臺日關係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在

第二次安倍政權初期，臺灣由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兩岸關係相對穩定，這一背景被認為大大有助於安倍晉三上臺後能以更快的步調推進臺日關係的發展。



### 三、日美關係

張雲指出，日本戰後的主流戰略思想普遍認為，日本缺乏單獨左右臺灣問題的能力，其對臺政策基本上受制於日美同盟的大框架，而日本戰後國際戰略的核心正是管理日美同盟（2019：7）。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認為，第二次安倍政權之所以積極接近臺灣，主要是為了回應川普政府時期日美同盟面臨的不確定性，藉此鞏固雙邊關係。川普就任總統後，主張「美國第一」主義，批評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僅藉由搭便車來獲取安全保障，並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此舉對長期推動 TPP 的安倍政權造成重大打擊。日美同盟的信賴基礎一旦被削弱，對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決策所施加的結構性制約也隨之鬆動，進而擴大日本依據本國意志作出獨立決策的空間。然而，日本在面對川普政權時，選擇在其上任初期便迅速鞏固日美同盟，將其定位為日本外交的核心支柱，並全力以赴試圖「拉住美國」。對日本而言，儘管川普政權本身的不確定性相當高，但日中、日朝、日韓、日俄關係的不確定性更為難以掌握，因此處理相關外交議題時，仍需依賴日美同盟作為後盾。特別是基於日中之間戰略互信的缺乏，日本為達成「拉住美國」的戰略目標，也將臺灣議題納入其對美戰略考量之中。臺海局勢的緊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提升美國新政府對區域局勢的關注，為日本提供了牽制中國的寶貴契機。因此，在川普政權過渡期的 2017 年上半年，臺日關係強化的趨勢亦日益明顯（張雲，2019：16-18）。陳友駿亦指出，安倍晉三認為日美同盟是維繫臺灣海峽地區穩定的主要支柱，並且透過日美同盟的持續與穩定擴展，方能維持對中的戰略性嚇阻態勢。在此基礎上，由於日本更清楚地認識到，在中美對立中最重要因素即為臺灣問題，因此安倍政權企圖利用臺灣問題激化美中矛盾，進而迫使美國在日中衝突中完全站在日本一邊（陳友駿，2016：140）。



確實，對第二次安倍政權而言，維繫並強化日美同盟是最重要課題之一。然而，日美同盟的不確定性上升，使日本在外交上有了更多自主空間，卻未必僅意味著日本只能選擇接近臺灣。誠然，中國的崛起對日本而言是一種威脅，但同時，日本亦抱持著審慎關注對中經貿往來所帶來利益的態度。邁克·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由於美中關係惡化，日中關係對中國政府而言比以往更具重要性。這使得日本有可能同時建立起比美中關係更為緊密的日美關係以及日中關係」（Green, M. J., 2022：76）。何思慎與楊雯婷亦指出：由於中國的經濟地位極為強大，日本無法忽視，因此安倍首相只能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面對川普總統退出 TPP 以及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消極反應，安倍感到困惑；在對中外交上，安倍亦不必完全追隨川普的對中戰略，而是可以選擇採取接近中國的政策。如此一來，也能避免被捲入川普難以預測的對中政策劇變之中（何思慎、楊雯婷，2022：103-104）。

因此，吾人認為相較於日中關係或兩岸關係的變化而言，單就日美同盟的強化因素，對於解釋日本對臺政策積極化的影響力仍顯薄弱。日美同盟確實為日本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戰略基礎，然而其本身並不足以成為推動日本接近臺灣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日美要因的影響往往僅止於限制與約束，日本對臺政策的積極化則更主要取決於中日關係的緊張、兩岸關係的動態，以及安倍本人所推動的「價值觀外交」與戰略理念。

## 貳、國家層次

關於安倍政權的文獻中也有學者認為國家層次的因素促使安倍能夠採取對臺較為積極的態度，這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獻認為是由於日本國家認同的重新定義，讓日本與臺灣、中國的關係都有所改變。第二部分則認為是由於安倍改革了日本政府體制，讓內閣有更多權力，因此才能推動對臺政策的變化。



## 一、日本國家認同的重新定義

張雲指出，日本對中國與臺灣的政策受到了日本需要重新定義國家認同的影響。戰後，日本接受了憲法第九條而放棄重新軍備，僅保有非軍隊編制的自衛隊，在安全保障上依賴美國保護傘。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被納入美國主導的自由陣營，並在戰後處理與冷戰這兩大歷史脈絡下，逐步確立以輕武裝與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吉田路線」外交方針。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國民的「大國地位國際認同」(national identity)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然而，冷戰結束後，「吉田路線」所隱含的「政治性國家認同缺失」問題逐漸浮現，關於「日本應成為何種國家」及「應如何為國際貢獻」的討論也日益升溫(張雲，2019：5-6、12-13)。

在此背景下，1993 年小澤一郎於著作《日本改造計畫》中首次提出「正常國家」概念，主張日本為成為真正國際國家，必須：(1) 於國際社會中承擔理所當然的責任，該原則亦適用於安全保障領域；(2) 對致力於建構富足穩定生活之國家，在地球環境保護等課題上提供最大程度的協助(小澤一郎，1993)。針對「正常國家論」，雖然國內亦有批評認為其中暗含日本成為軍事大國的意圖，但同時該論點亦促使日本反思其安全保障政策。例如，1992 年自衛隊首次派遣至海外，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在正常國家論的討論熱潮中，1990 年代中期的朝鮮核危機與 21 世紀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加速了日本國家認同重新定義的需求(張雲，2019：13)。

張雲指出，特別是 2005 年日中關係的惡化，成為日本重新界定國家認同的重要契機。當時，安倍以自民黨幹事長代行的身分訪美，並向美方說明中國的反日示威根源在於中國長期推行的反日愛國主義教育，以及由此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sup>3</sup> 自此以後，安倍以「擺脫戰後體制」作為其政治訴求，並塑造出「不民主」「缺乏法治」的中國形象，將其作為日本在探索新國家認同過程中最為便利的「反面例證」。另一方面，臺灣則被定位為擁有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價值觀的「正面教材」

<sup>3</sup> 日本政治文脈中的「代行」係指在正式職務者空缺、離任或不在時，暫時負責該職務權限之職務名稱。



(張雲，2019：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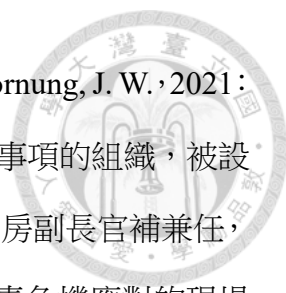
作為透過推廣民主、自由、基本人權與法治原則來重構國家認同的證據，實際上，安倍晉三在其第一次執政期間便指出，日本的魅力在於尊重自由與民主、基本人權，並建立於健全的法治之下；同時，日本與印度、澳大利亞、美國等多個亞洲國家共享價值觀，並擁有市場經濟的共同認識(安倍晉三，2013：162-164)。而且，2007年，於第一次安倍政權期間，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將從日本、東南亞、印度、中東直至北歐的廣大區域視為由共享自由、民主、市場經濟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國家所連結而成的「弧(Arc)」，並以其形成與擴展來追求世界和平與秩序的穩定。到了2016年，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又推動 FOIP 構想，致力於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構築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使自由貿易、航行自由與法治等對於實現區域穩定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原則逐步落實。

日本在積極推動價值觀外交的過程中，可以認為臺灣被視為共享價值的重要夥伴。實際上，安倍在2015年的參議院特別委員會上就臺日關係問題答詢時表示：「臺灣是共享基本價值觀的夥伴，也是重要的朋友」(日本李登輝之友會，2015)。

## 二、透過制度改革強化內閣權限

在過去的日本，外交政策由外務省負責，防衛政策則由防衛省負責，這些職責由不同部門分工負擔。因此，政策決策需要在部門間及政黨間的對立中進行調整，並透過自下而上的過程來推動，從而，首相的權限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安倍政權下，透過推動一系列制度改革，這些限制得以大幅緩解。安倍在第一次執政期間未能實現的 NSC，於2013年設立，並於2014年成立其事務局——「國家安全保障局」(NSS：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安倍首相透過擔任 NSC 議長，將原本分散於各省廳之間的情報集中至首相官邸，使以往難以實現的自上而下式安全保障決策成為可能。在 NSC 創設之前，外務省與防衛省的各部門掌握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隨著 NSC 作為官邸主導的行政機構設立，可以說，安倍打造




出一個統一指揮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及情報蒐集的「司令塔」(Hornung, J. W., 2021: 25)。NSS 作為專責擬定與協調外交、防衛政策基本方針及重大事項的組織，被設置於內閣官房，其局長直接輔佐官房長官等人。此外，次長則由官房副長官補兼任，統籌跨部會的情報蒐集與協調工作。換言之，NSS 並不直接負責危機應對的現場指揮，而是作為負責外交與防衛政策立案及部會間協調的「司令塔」而發揮功能。隨著 NSS 的設立，內閣官房的權限擴展至安全保障領域，從而形成了由首相官邸主導，能夠統一協調與推動政策的體制。結果，安全保障政策決策的集權化得以推進(小熊真也，2013：199-200)。

除了 NSC 與 NSS 之外，安倍內閣還設立了內閣人事局，掌握了各省審議官以上高層幹部的人事權。其中，一些高層幹部脫離原本的出身省廳，轉任首相秘書官或首相輔佐官等官邸直屬職務，作為首相的親信直接參與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這些人被稱為「官邸官僚」。透過此舉，統轄行政機構的權限進一步集中到首相手中(平川幸子，2022：68；Hornung, J. W., 2021：23-24)。此外，安倍亦推動了《特定秘密保護法》的通過，強化政府對洩漏機密資訊者的處罰機制。特定秘密的監督權限屬於首相，首相可就特定秘密的指定與解除，以及適性評估的執行情況，對各行政部門進行指揮與監督(日本內閣官房，2014：15)。

平川幸子指出，透過這一連串的制度改革，安倍強化了內閣的權限，並建立起所謂的「官邸外交」機制，使首相官邸能夠自上而下、快速且整合性地推動涵蓋從安全保障到經濟等多領域的外交政策(平川幸子，2022：68-69)。她在討論這些制度改革對對臺政策的影響時，具體提及了長年未能達成共識、卻在 2013 年安倍政權下締結的《臺日漁業協議》，並指出此一協定是在官邸主導下推動、強行克服主管省廳反對而達成的案件。安倍任用許多對臺灣抱有好感、且具備高度中臺關係素養的政治人物，而在推動《臺日漁業協議》時，這些人士也曾在幕後與臺灣政府高層接觸(平川幸子，2022：82-84)。

這一連串制度改革確實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中強化了首相的權限，這顯示安倍



首相的意向可能在日本政策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反映。依然需要指出的是，若要判斷制度改革是否使日本的對臺政策更加積極，就必須觀察安倍晉三在個人層次上的臺灣認識。然而，平川所指出的「《臺日漁業協議》係在官邸主導下推動」的觀點，仍可視為制度改革對日本對臺政策積極化產生影響的重要依據。

## 參、個人層次

最後，有學者指出，安倍本人對臺灣展現出高度重視與友好姿態。根據丹羽的說法，安倍於當選眾議院議員的翌年，即 1994 年 9 月，以自民黨青年局次長的身分訪問臺灣，並與時任總統李登輝會晤。自民黨青年局在黨內對臺工作中扮演關鍵聯繫角色，對促進自民黨與臺灣之間關係的深化具有重要意義。此後，他多次訪臺，逐漸以「親臺派」的形象提升其在臺日關係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丹羽文生，2018：151）。此外，安倍與黃昭堂、金美齡等臺獨運動人士保持密切往來，他也曾觸及臺灣獨立論，說道：「像臺灣這樣民主化進展順利，經濟水準與教育水準不斷提升的情況下，總有一天他們可能會追求獨立，這種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同時，他亦與李登輝維持著個人層面的親密關係（丹羽文生，2018：155）。平川亦指出，安倍家與岸家（安倍外祖父）皆曾與蔣介石、之後的李登輝保持家族層面的往來，近年來安倍家族與臺灣之間亦持續展開密切交流。舉例而言，母親安倍洋子擔任「櫻花返鄉會」的日本名譽會長，而臺灣方面的名譽會長則是李登輝夫人曾文惠。<sup>4</sup>此外，2015 年蔡英文訪日時，曾造訪安倍的故鄉山口，由其弟岸信夫擔任陪同。更進一步，在蔡英文於 2016 年就任總統後，洋子亦曾訪臺，並與蔡一同觀賞公演（平川幸子，2022：82-83）。

此外，安倍亦屬於自民黨內傳統上最具反共主義傾向、在斷交後仍與臺灣保持

---

<sup>4</sup> 「櫻花返鄉會」是一個由臺日民間人士推動的組織，旨在將昭和天皇擔任皇太子期間訪臺時所種下的櫻花樹送回日本。



深厚關係的親臺派系——清和政策研究會。而他所重用的許多政治人物，包括他本人在內，也都出身於長期扮演連結自民黨與臺灣關係角色的自民黨青年局（平川幸子，2022：83）。

由此可見，安倍晉三在其政治生涯中明顯重視與臺灣的關係建構，而在就任首相後，更大量任用親臺人士。一些學者則指出，其外交方針的背後，與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外交政策具有連續性。平川幸子指出，安倍晉三將其外祖父岸信介視為政治上的典範並深表敬仰。岸在戰後從 A 級戰犯嫌疑中復出並出任首相，推動以日本自主國家責任為基礎的亞洲外交，並明確表達反共立場。因安保條約修訂，在國會前爆發大規模反對運動之際，岸仍堅定不移；此一態度對安倍產生深遠影響，並促使其採取積極介入國家戰略與國際秩序的姿態（平川幸子，2022：69）。此外，丹羽文生指出，安倍外交可見與岸外交的連續性，其中亦包含對臺灣的重視；換言之，安倍之所以重視臺灣，根源於他自身內在的情感（丹羽文生，2018：164）。

安倍個人重視臺灣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若要理解其中的目的與動機，仍有必要分析其重視臺灣的背景，其中亦包括與岸信介之間的連續性。

#### 肆、小結

國際層次的分析提供了日本因應國際情勢變化而戰略性接近臺灣的視角。然而，當中亦存在某些矛盾。一般而言，兩岸關係惡化時，臺日關係通常較難發展。但許多研究者指出，自蔡英文政府上臺以來，儘管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日本仍未放棄對臺灣的重視，即便存在結構性制約，仍盡可能推動雙邊關係的建構。

國家層次的因素，如「日本的國家認同重新定義」以及「國內制度改革」，確實有助於說明國際層次所無法涵蓋的動機，以及日本能夠順利調整對臺政策的原因。然而，這類制度改革是否推動了對臺政策，依然取決於安倍本人是否重視臺灣。此外，仍有部分問題尚待釐清，例如：為何安倍如此積極推動國家認同的重新定義與價值觀外交？他又為何實行制度改革？這些問題至今仍缺乏明確答案。為了回

應這些疑問，有必要進一步理解安倍此類行動背後所反映的個人價值觀、政策判斷標準與動機。

而且，在個人層面的分析上，安倍自 1994 年、即首次當選眾議員的翌年起，便著手與臺灣建立關係，顯示其早期即已重視臺灣事務。然而，多數研究僅停留在理解安倍個人重視臺灣的事實，並未深入探討安倍為何個人重視臺灣的背景，以及這一點對日本臺灣政策的具體影響，相關研究仍顯不足。考慮到安倍政權下內閣權限的制度性強化以及他重用親臺派政治家的做法，可以推測安倍個人的認知對臺灣政策的影響深遠。因此，分析安倍個人層面的特徵對於理解日本的對臺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 第三節 研究設計

#### 壹、理論與分析架構

在解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時，行為者與結構分別扮演何種角色，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一般而言，外交政策的決策可從個人層次、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三方面進行分析。1950 年代，華爾茲（Kenneth Waltz）在其著作《人、國家與戰爭》中探討戰爭與和平的根本原因，並提出應從不同的社會政治層次加以分析，包括個人層次、國家層次與國際體系層次。隨後，辛格（David Singer）於 1961 年進一步將「分析層次」的概念系統性地引入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框架之中（Waltz, K., 1959; Singer, J. D., 1961）。

在從「個人層次」進行分析時，荷曼（Margaret G. Hermann）聚焦於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對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並以此進行理論建構（見圖 1）。首先，她認為在眾多決策者特質中，對外交政策影響最為關鍵的有四項：「信念」(Beliefs)、「動機」(Motives)、「決策風格」(Decision Style)與「人際風格」(Interpersonal Style)。信念是指行為準則的哲學信念，即領導者對世界的基本假設。動機是指他們做出某

種行為的理由，即驅使他們的慾望。決策風格是指他們偏好的決策方法。人際風格則與政策制定者在與其他政策制定者互動時所採取的獨特方式有關。這些特質主要影響外交政策的兩個層面，也就是政府在外交政策中所採取的「戰略方向」，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風格」。政治領導人的信念與動機會形塑其「對世界的看法」(views of the world)，進而影響政府對外關係的基本行動方針，例如傾向合作還是競爭、選擇單獨行動還是合作行動、是否投入資源於他國、偏好多邊協定還是雙邊協定，以及在各項國家利益中如何排序優先順序等。此外，決策風格與人際互動風格則構成其「個人的政治風格」(personal political style)，進一步影響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所選擇的手段，例如：政策發表時所運用的傳播管道、推動政策時所依賴的特定技能與資源、言語與行動的運用方式、是否採取個人外交，以及官僚體系在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參與程度等。這些因素最終共同塑造了政府的實際外交政策 (Hermann, M. G., 1978: 5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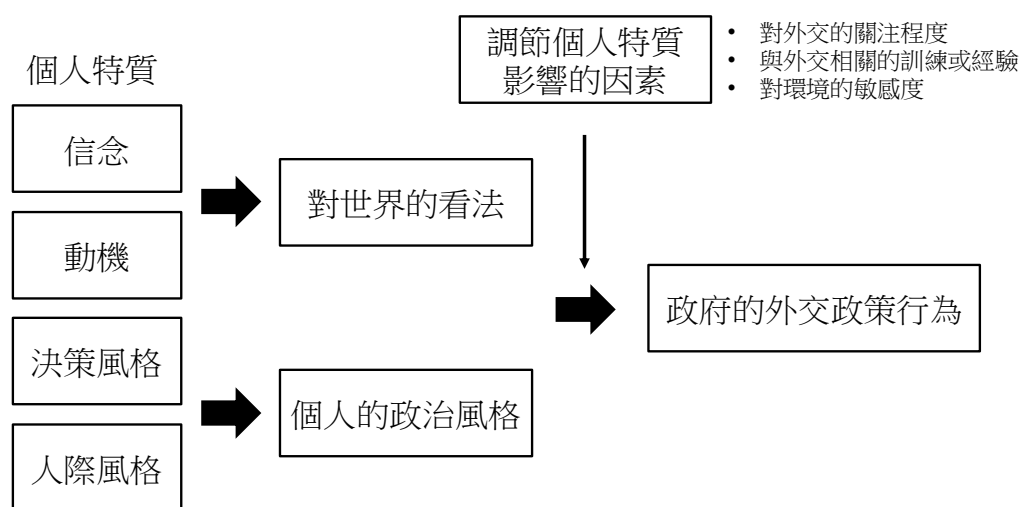


圖 1 政治領導人個人特性與其政府外交政策表現之關聯性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Hermann, M. G. (1978: 63) 繪製

此外，她也提及三項調節個人特質影響的因素。具體而言，政治領導人「對外交的關注程度」、「與外交相關的訓練或經驗」，以及「對環境的敏感度」這三項因



素構成了影響外交政策的過濾機制。首先，若政治領導人對外交具有高度關注，其個人特質的影響力便會更加顯著。而且，政治領導人之所以重視外交議題的理由，亦可能預先決定其行動的方向。其次，若政治領導人擁有豐富的外交訓練或經驗，其政策選擇將更多基於經驗而非天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並能針對特定問題或目標國設計合適的策略，因此此類領導人的政策決策往往更難以預測。最後，若政治領導人對環境具有高度敏感度，他更可能因應新資訊或環境變化而靈活調整政策，從而導致個人特質與政策之間的關係一致性相對降低（1978：57-59）。

荷曼指出「個人特質並非直接決定外交政策」的觀點確實切中要點，但對於「若政治領導人具有豐富的外交訓練經驗，並對環境高度敏感，則其特質的影響反而不易直接展現」這一看法，筆者則存有疑慮。筆者反而認為，政治領導人若具備豐富的外交訓練經驗，並對環境保持高度敏感，就越能在個人特質的基礎上，進一步促成具體的政策形成。確實，當領導人對環境的敏感度較高時，往往會使其信念與動機更具彈性，並更可能形成因應情勢的政策；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像信念此類的個人特質無法得到體現。此外，特別是在外交相關的訓練與經驗方面，若領導人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就意味著其更具將信念與動機轉化為具體戰略的能力。因此，本文反而認為，這些條件應被理解為「媒介要因」，在以個人特質為基礎之上，發揮作用，促進具體外交政策的形成。

荷曼提出的領導人理論，能夠分析決策者的哪些個人特質會、以及如何影響國家的政策決定，但這些特質是如何形成的，仍不夠明確。因此，本研究參考了卡爾納斯（Walter Carlsnaes）的理論。他分析了在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中，以國家元首為主的政策決定者——「行為者」，以及作為「結構」的因素各自所發揮的作用。<sup>5</sup>他指出，外交政策同時受到行為者與結構兩者的影響，若僅將其中一方視為主要因素，便會產生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個將行為者與結構雙方納入考量的

---

<sup>5</sup> 「結構」在廣義上是指國際體系，而更具體而言，則涵蓋國內因素、社會、文化、經濟、物質與意識形態等多種要素。

外交政策分析框架。其分析框架反映出，所有的外交政策行動皆以「意圖」、「認知心理因素」以及表徵社會與其環境的各種「結構」之形式相互連結，並從三個層次加以解釋：即「意圖層次」(intentional dimension)、「傾向層次」(dispositional dimension)與「結構層次」(structural dimension)(見圖 2)。意圖層次，意指採取特定外交政策行動的理由與目標。換言之，即是「為了什麼」採取該政策。然而，僅僅掌握政策的意圖並不足以理解政策，還必須進一步釐清「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意圖的機制。為此，有必要關注意圖層次與傾向層次之間的關聯，並揭示政策決策者在形成特定偏好或意圖時所依據的心理與認知因素。最後，需要探討決策者的心理與認知傾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卡爾納斯認為，國內外的環境、社會、文化、經濟、家庭等結構性因素，正是深刻影響決策者認知、反應與思維方式的關鍵，並構成其價值觀、偏好、情感與態度的基礎。更準確地說，正是行為者對這些結構性因素的認識、反應與考量，最終影響了其認知與心理傾向。總結來說，依據卡爾納斯的觀點，若要對外交政策進行全面性的分析，就必須理解政策決策所包含的意圖、形塑該意圖的心理與認知傾向，以及行為者如何透過對結構的認識而形成這些傾向 (Carlsnaes, W., 2012 : 124-127)，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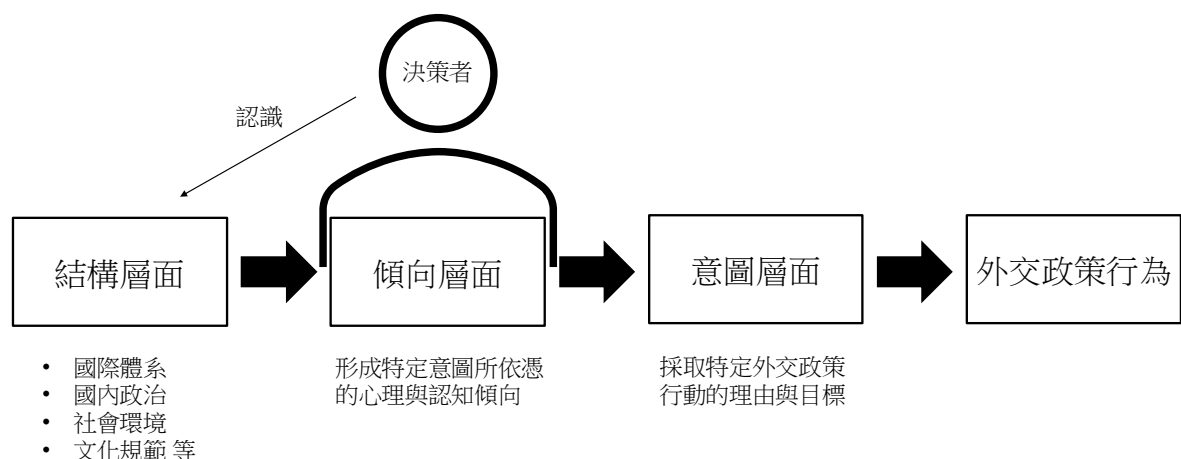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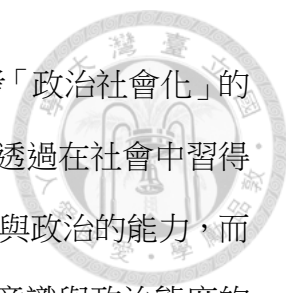


圖 2 解釋外交行為的三個層面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Carlsnaes, W. (2012 : 126) 繪製



為了探討決策者的結構層面如何形塑其傾向層面，吾人參考「政治社會化」的概念。與個人心理、認知傾向及個人特質的形成要素相關，個體透過在社會中習得政治價值觀、規範、知識與行為模式，逐步培養作為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的能力，而這一過程即被稱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意識與政治態度的形成雖持續一生，但其關鍵基礎多在未成年時期即已建立，並被認為在成年後仍具有深遠影響。家庭、朋友、學校、媒體與政府等，皆在個體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海曼 (Herbert Hyman) 在其對政治社會化研究的綜述中，雖然承認其他機構的重要性，仍指出「在所有政治社會化的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家庭」(Hyman, H., 1959; Charlotte N., 2024)。另有研究則指出，不僅家庭本身，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亦對政治社會化過程產生重大影響 (Dowse, R. E. and John, H., 1971)。

本論文將以上述理論整合起來，探討安倍晉三的個人特質是如何形成的，並進一步分析這些特質如何影響對臺政策的制定與推動 (見圖 3)。首先，本文將透過對家庭環境、教育與社會環境，以及早期政治經驗等背景與經驗，以及安倍對其之認知的理解，來探究影響其個人特質的結構層面。關於早期的政治經驗，將聚焦於其於 1993 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之前的經歷，主要探討其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外相秘書官時所獲得的經驗。此一經驗深受其父身為政治家之家庭環境影響，且因其發生於當選議員之前的早期階段，對安倍晉三而言，很可能構成「政治社會化」的一環。因此，本文將其視為結構層面，而非海曼所稱的「外交相關的訓練與經驗」之媒介要因。其次，分析安倍在此等影響下所形成的信念與動機，以及其決策風格與人際關係風格等認知與心理傾向。信念，指安倍所持有的基本價值觀與主義立場、對國家角色的認知，以及對國際秩序理應呈現之樣貌的價值理念，例如對於民主或威權政體的偏好就會在此類顯現。動機，則指驅使其行動的內在動力與政治目標，涵蓋其所追求的國家方向、政策願景與個人政治使命感。例如，是否傾向追隨美國，抑或企圖開創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就會在此類顯現。決策風格，指安倍在決策過



程中的思考模式與行動特徵，包括其在資訊蒐集與處理、風險評估、以及權衡不同政策選項時所展現的方式與傾向。例如，其是否傾向以意識形態為導向進行外交，抑或採取現實主義的外交路線，就會在此類顯現。人際風格，指其與他人互動的特質與模式，包括建立信任關係的方式、對建議與意見的態度，以及運用人脈與組織資源的取向。例如，對於「首腦主導的頂層外交」或「自下而上的官僚型外交」的偏好，就會在此類顯現。

最後則在此類個人特質的基礎上，整理出安倍晉三在外交上的關注程度、其外交訓練與經驗，以及對環境的敏感度，作為促進具體外交政策形成的要素。「對外交的關注度」，指安倍晉三對外交政策的重視程度；而「對環境的敏感度」，則指其對外部情勢的辨識與應對能力，亦即能夠及時察覺國際與區域環境的變化，並將之反映於政策。此處所指的外交訓練與經驗，主要聚焦於安倍自 1993 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之後，作為政治人物在外交實務歷程中所累積的經驗。最後，分析這些特性如何影響對臺政策意圖的形成，並進一步反映在實際的對臺政策行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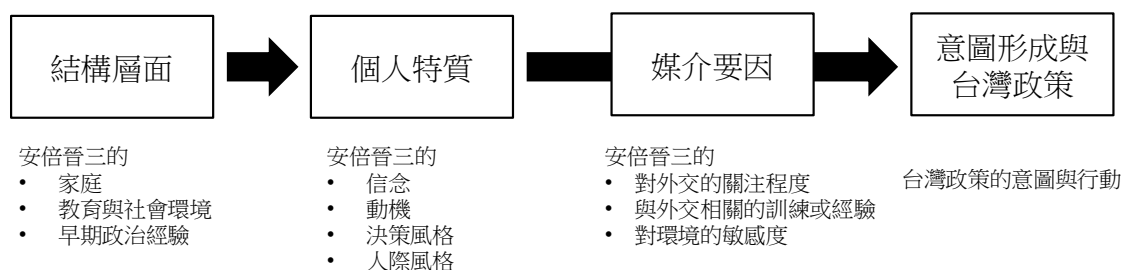



圖 3 個人層次因素與臺灣政策形成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 貳、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論文採用質性研究中文獻分析法，以論述內容分析為主，著重於文本中言語與觀點的脈絡解讀。資料來源的選擇，參考了荷曼（Hermann）




針對政治領導人個人特質之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她指出，研究政治領導人的有效方式之一，是透過分析他們的言論。政治領導人的言論大致可分為兩類：演講與大眾媒體訪談。前者多由幕僚撰寫，內容經過周密設計與審慎考量，因此雖能反映領導人希望傳達的政策方向與價值理念，卻不一定能直接呈現其真實個性。相較之下，媒體訪談具備更高的即興性與自發性。雖然政治領導人可能事先準備，但在面對提問時須即時回應、無法倚賴外部支援，其回答內容與表達方式更容易自然流露其思維與特質。因此，在分析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質與領導風格時，訪談可作為補充演講資料、捕捉其真實特質的關鍵參考來源（Hermann, M. G., 2003: 178-180）。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以三類資料為核心來源。首先，是安倍晉三的各類媒體訪談與相關紀錄，除了傳統的報刊訪談之外，也包含自傳或回憶錄，例如安倍本人闡述其政治理念與施政構想的《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其次，是安倍首相家人或親近官員所撰寫的著作，例如其母親、兄長或養育者的回憶錄與相關出版物。這些文本有助於深入了解安倍的思想基礎與家庭影響。第三，則是更為廣泛的專書，包括安倍歷年演講、官方檔案與出版物，以及學者討論的文章與書籍。透過多元的資料來源，吾人能夠綜合比較不同角度的觀察與解讀，藉以全面梳理與分析安倍晉三的個人特質及其對臺灣政策的影響。

## 參、研究限制

本研究將透過上述研究方法，深入探討日本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決策者因素，並從安倍晉三的內在思維角度，解析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日本對臺政策的重大變化。

然而，基於本研究主題與目的的特性，仍存在若干限制。首先，本文聚焦於安倍晉三作為政策決策者的內在思維，特別關注其個人特質、哲學信念以及執政期間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雖不否定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等結構性因素的重要性，但若全面納入此類因素，將使研究範圍過於擴散，故有意限縮分析焦點，以深化特定面向的探討。其次，在外交政策研究中，決策與執行過程涉及保密義務與眾多人的因



素，致使高可信度、具客觀性的資料取得面臨困難。一方面，多數官方文件尚未公開；另一方面，現有回憶錄與訪談紀錄中亦可能摻雜主觀敘述或自我辯護傾向。為確保研究的學術性與信賴度，本文將嚴格篩選具高度可信性的資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客觀而審慎的分析。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日本的對臺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對於外交政策研究而言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外交政策的變化通常是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等多種變數相互作用的結果。然而，既有研究多從國際體系層次探討其原因，儘管安倍晉三個人的意識形態似乎具有顯著影響，但相關研究仍然相對不足。分析安倍晉三的內在思維與其外交政策之間的關聯，是系統性理解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日本對臺政策變化所不可或缺的一環。本研究透過全面分析作為外交政策決策者的安倍晉三的角色，不僅能深化對日本對臺政策的理解，也有助於進一步預測未來的臺日關係發展。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亦可作為觀察未來政策決策者特質的一項參照，推測若干具特定特質的領導人上臺時，臺日關係可能展現的發展方向。

## 第二章 第二次安倍政權前的日本對臺灣政策

本章旨在整理第二次安倍政權之前的日本對臺政策，藉此釐清第二次安倍政權之對臺政策與以往政策之間的連續性與斷裂，並有助於說明安倍對臺政策的積極性與特殊性。第一節將整理戰後至 1972 年日中建交、臺日斷交之前的日本對臺政策。第二節則聚焦於「1972 年體制」下日本對臺政策的重要變化與主要協定，進行梳理與分析。第三節則透過整理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的日本對臺政策，以釐清其與第二次政權之間的連續性與差異。

### 第一節 戰後至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

戰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建國，日本與中華民國（臺灣）為了重新定位雙方的貿易關係，先行簽署了《臺日通商協定》，並於 1952 年 4 月 28 日，在舊金山和約的基礎上締結《日華和平條約》，正式建立政治與外交關係。之後，直到 1950 年代中期，兩國在通商與文化等領域的關係逐漸恢復正常化（川島真等，2021：69-70）。日本首相岸信介作為日華關係史上首位在任期間訪問臺灣的首相，與蔣介石建立了友好關係，並特別致力於維護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關於他對臺灣的重視，將在後續章節中詳加探討。1960 年 1 月 14 日，日本與美國簽署新的《日美安保條約》。對於其中的「東亞條款」，日本政府明確說明該條約的適用範圍涵蓋臺灣，表達了支持與維護臺灣的立場。在簽署《新安保條約》後辭職的岸信介，仍在自民黨內對臺關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64 年上臺的佐藤榮作，則成為繼岸信介之後，任內訪問臺灣的最後一位日本首相。他於 1969 年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會談後發表了《日美共同聲明》，並在聲明中指出：「維護臺灣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極為重要」。<sup>6</sup>這是戰後日本政府首次明確表態關切

<sup>6</sup> 原文如下：「臺灣の平和と安全の維持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ある。」



臺灣安全保障的時刻（廖克杭，2022）。

一般而言，從戰後初期到 1960 年代後期，日本政府的對臺政策主要受兩項因素影響。其一，是日本自身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追求；其二，則是冷戰架構下美國在東亞的戰略與對臺海峽政策的走向。戰後，日本在國防、安全保障與對外關係上高度依賴美國，對臺政策亦不例外，幾乎未展現出自主性（廖克杭，2022）。事實上，促成日華關係正常化的《日華和平條約》亦是在美國斡旋下簽訂，其達成過程與其說是出於日本政府的自主意願，不如說更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國的冷戰政策（陳冠伶，2016：94）。然而，日本在追隨美國東亞政策的同時，也積極追求經濟成長與外交自主權的強化。戰後，首相吉田茂深知，選擇以中華民國作為「中國」的代表並與之締結條約，將可能成為未來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的障礙。因此，早在舊金山和約談判時期，他便已開始思考，今後應如何在北京與臺北兩個政府並存的情況下，建立並維持雙方關係（陳冠伶，2016：94）。日本以「政經分離」原則為方針，在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政治與外交關係的同時，試圖推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此舉引起中華民國的強烈警覺，頻頻向日本提出抗議，而日本則每次重申堅守雙方的政治與外交關係，這種抗議與重申的互動，逐漸成為臺日關係中的固定模式（川島真等，2021：70）。自《日華和平條約》締結至臺日斷交期間，日本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一貫支持中華民國。然而，日本同時維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態度，使中華民國產生了疑慮與危機感，認為日本可能意在透過與中共建立實質關係，最終達成政治關係正常化的目標（陳冠伶，2016：106-107）。尤其是在岸信介下臺之後成立的池田勇人內閣，其最重要的外交課題是修復與美國的關係，並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推動日本的經濟成長。他一直認為，在維持與美國協調關係的前提下，應以「政經分離」為名，推動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貿易往來。他的這一立場，至少在短期內並未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標；然而從長期構想來看，他抱持著這樣的信念——「說服美國這個最大的反中共國家，當美國的看法出現變化時，日本必須為創造新的國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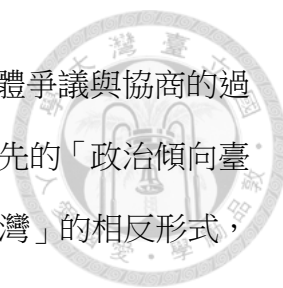
勢而努力，而最後必須承認中共。」正因如此，臺灣方面對此態度的警戒心也日益加深（川島真等，2021：81）。

隨後，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以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一系列事態的發展，1972年田中角榮組成內閣，大平正芳出任外相，新內閣隨即加速推動與中國的邦交正常化進程（川島真等，2021：105）。

總結而言，此一時期的日本對臺政策，始終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支持中華民國，並在冷戰格局下積極配合美國的東亞政策，以此建立並維繫與臺灣的政治與外交關係。然而，重視經濟成長的日本同時也致力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民間」經濟關係，而這種態度引發了中華民國對日本的疑慮與不信任。清水麗將此一時期，特別是1960年代的日華關係，形容為「象徵性友好、實質性脆弱」的時代（川島真等，2021：98）。

## 第二節 1972 體制下：第一次安倍政權之前


自池田勇人內閣以來，日本在中國承認問題上採取「聯合國主義」的立場。隨著1972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本隨即推進與中國的邦交正常化談判，並於同年9月實現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川島真，2024：1）。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充分理解並尊重中國政府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同時重申日本依據《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所堅持的立場」。這一聲明成為其後臺日關係的基本依據（福田円，2014：91）。更具體而言，在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會談中，雖然《共同聲明》未明文提及臺日實務關係的延續，但據稱中方在會談中表達了默許此種安排的意向。日本方面，包括田中首相與大平外相在內的多位政府高層，多次表明「希望維持臺日之間的實務關係」的方針。然而，此一立場僅限於不妨礙日中友好關係、並符合日中建交基本方針的範圍



內。至於臺日實務關係能以何種層級持續，則是在之後一項項具體爭議與協商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川島真等，2021：122-123）。1972年之後，原先的「政治傾向臺灣、經濟傾向中國」方針，轉變為「政治傾向中國、經濟傾向臺灣」的相反形式，亦即出現了新的「政經分離」格局（廖克杭，2022）。

隨著日華斷交之後，為建立後來被稱為「1972年體制」的、以經濟與文化交流為核心的非官方關係，臺日雙方設立了實質性的關係維繫機構。日本方面成立了「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而臺灣方面則設立了「亞東關係協會」。然而，以「不違反日中友好」為前提來維持與臺灣關係的行動原則，實際上也等於將判斷的基準交由中國掌握。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初期的雙邊關係並不穩定，中國對臺日關係的動向往往反應敏感而強烈。由於臺日關係極易在日中關係中被政治化，日本因此常不得不犧牲與臺灣之間實質關係的深化（川島真等，2021：125-126、136）。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自民黨內部對突如其來的日華斷交感到不滿的派系，持續批評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勢力。於此背景下，自民黨內的親臺派議員成立了「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這些議員與國民黨領導層共同承擔起臺日之間非官方的政治聯繫，形成了一種由「政治層的非正式互動」支撐「民間經濟與文化關係」的結構（福田円，2014：92）。

此後，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以及臺灣民主化等東亞國際關係與各國內政的變化，日本的對臺政策也隨之出現了新的轉變。首先，隨著蘇聯解體，中國作為日本在對抗蘇聯方面的戰略價值下降；與此同時，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使日本愈發難以再對臺灣採取忽視態度。第二，以李登輝總統為代表、受日本殖民時期教育的本省人逐漸成為政權主流，這些與日本關係深厚、對日本懷有好感的人士在臺灣政府內部開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第三，隨著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崛起，以及帶有反日色彩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日本國內的反中情緒日益加深。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臺灣的民主化與親日立場使日本社會對其產生了更多的同情與好感（川島真等，2021：160-162）。在此背景下，日本開始以經濟與文化交流為媒



介，推動與臺灣之間「高層接觸」之構築。例如，1990年7月，日本接待了由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率領的「立法院訪日團」。1993年2月，外交部長錢復斷交以來首次訪問日本，並與多位日本政要會面。同年11月，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平岩外四訪問臺灣，與李登輝總統會談，雙方就臺灣重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相關議題進行討論。1994年6月，交通部長劉兆玄訪問日本，並在斷交後首次與對口官員——日本運輸大臣二見申明會談(川島真等, 2021: 167-168)。如此，日本一方面回應李登輝政府加強與日本關係、擴展臺灣外交空間的意圖，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國以「維持日中邦交正常化立場」為由的牽制，而日本當然並無反制的手段。結果，日本陷入李登輝政府的外交攻勢與中國的牽制之間，形成兩難的夾縫處境(福田円, 2014: 93)。

進入1990年代後期後，隨著臺海危機的爆發，日、美、中、臺四方的安全保障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無論是在日美安保體系還是美臺軍事合作框架下，人們普遍認為無需在安全保障層面過度強調臺灣的重要性，只要透過「戰略性模糊」政策，便足以遏制中國對臺動武。然而，隨著臺海危機的爆發，日美於1997年召開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SCC)，共同發表《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不僅表明雙方共同維護東亞和平的決心，並且透過「日本周邊事態」的概念，將臺灣海峽的安全實質納入日美安保體系的涵蓋範圍。儘管如此，日美基本上仍為避免過度刺激中國，將「周邊事態」界定為相當模糊的概念，並刻意迴避明確說明其中是否包含臺灣。然而，此一事件促使臺日雙方在安全保障議題上加強對話與互動(川島真等, 2021: 186、188)。


進入21世紀後，特別是在以日美安保與重視亞洲外交為基調的小泉純一郎政權之下，日本開始主動明確表達立場，認為臺海和平問題攸關日本的重要利益。同時，在民間層面，日本亦積極培養對臺友好情感。另一方面，臺灣議題始終被視為日中關係中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臺日關係在缺乏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其發展仍無可避免地受到日中關係框架之限制，這一結構性制約依然繼續存在(川島真等，

2021：234)。

總結而言，日本在與中華民國斷交、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始終在不損及日中友好的範圍內，與臺灣建立起以「經濟與文化為核心的非官方關係」。然而，隨著臺灣的民主化以及臺海危機的發生，日本開始對「1972年體制」採取更為彈性的態度，並逐漸加深與臺灣之間的交流。儘管如此，臺灣是否被納入日美安保體系的範圍仍然模糊不清，而日本在實際行動上亦多受美國意志的影響。此外，雖然日本對「1972年體制」的態度變得更加彈性，但其結構性限制依然存在。日本始終以「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為定位，在民間層面推動與臺灣的關係發展。

### 第三節 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

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期間，雖然相關作為仍屬有限，但仍可見安倍展現出若干親臺友好的姿態，並試圖推動臺日關係的發展。例如，在2007年1月下旬，安倍首相邀請保守派理論型智庫學者岡崎久彥與櫻井よしこ前往首相官邸座談，同時長期旅居日本的臺灣獨立運動人士金美齡亦在場，引發外界關注。另外，在4月下旬，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並要求在《日中共同新聞稿》中加入「反對臺灣獨立」的表述，但安倍首相堅決拒絕，表示「如果一定要加，那就乾脆不發共同新聞稿也無妨」。李中邦指出，日本在對臺問題上的立場比美國更為堅定。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期間，在華盛頓舉行的美中首腦會談中，布希總統表示「反對任何片面改變臺灣海峽現狀的行動」，此一表態亦包含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然而，安倍在《日中共同公報》中僅再次確認「日方將堅持《日中共同聲明》中所表明立場」，並僅在與溫家寶總理會談時口頭表示「日本不支持臺灣獨立」，態度相對謹慎（李中邦，2007：42）。此外，2007年6月1日，安倍雖未在官方層面予以承認，但作為現任首相，仍與訪日中的李登輝進行了秘密會晤（丹羽文生，2018：152）。此外，2010年東京羽田機場與臺北松山機場之間的航線恢復通航，據稱此




舉是在安倍晉三擔任首相的首年即予以支持，最終得以實現的。傅長壽指出，安倍晉三深知松山機場擴建工程對當時的馬英九總統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馬英九在 1998 年至 2006 年間擔任臺北市長期間，曾以將松山機場轉型為「首都商業機場」，並開通通往上海、首爾及東京的直航航線，作為其主要政見之一（傅長壽，2022）。

此外，安倍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出，以「加強與共享自由、民主、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之國家的合作」、「建構開放且富於創新的亞洲」、以及「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為三大支柱，推動「主張性的外交」，亦即明確強調「價值觀外交」的方針（日本首相官邸，2007）。<sup>7</sup>同日發表的外交演說中，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指出，將其於 2006 年 11 月親自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理念，作為繼日美同盟、國際協調及重視鄰近亞洲諸國之後的第四項外交支柱。此舉旨在使日本的外交路線更加明確，並體現外交本身應有的使命（宇佐美正行等，2007：3）。此種強調「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的外交取向，雖未明確點名臺灣，但與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相互呼應，可視為在民主國家網絡中已隱含將臺灣納入其中。

此外，安倍曾於 1996 年至 1997 年間擔任自民黨青年局局長，負責與臺灣之間的交流窗口。然而，自安倍擔任局長的 1997 年起，延續 25 年的自民黨青年局年度訪臺慣例一度中斷。其原因在於當時黨內由親中派勢力主導，包括出身於經世會的首相橋本龍太郎、宏池會的幹事長加藤紘一，以及同屬宏池會的青年局長岸田文雄等人皆掌握要職。2001 年擔任自民黨青年局長的水野賢一，為紀念臺日民間關係三十週年，強烈希望能親自訪臺。然而，因其當時身兼小泉純一郎內閣的外務政

---

<sup>7</sup> 原文如下：「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權、法の支配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する国々との連携の強化、オープン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に富むアジアの構築、世界の平和と安定への貢献を 3 本の柱とし、真にアジアと世界の平和に貢献する『主張する外交』を更に推し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務官一職，此行遭到外相拒絕。隨後，水野批評政府過度迎合中國的態度，提出辭呈，以自由身赴臺，並與總統陳水扁會面。此一連串行動被媒體視為日本外交步調失衡的象徵性事件。然而，在首相官邸內，唯一支持水野的，是時任內閣官房副長官的安倍晉三。四年後，水野恢復了自民黨青年局的臺灣研修計畫，而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安倍亦任命他出任法務副大臣（平川幸子，2022：84）。

總而言之，安倍個人的親臺傾向已可見端倪。不僅積極與李登輝等人建立關係，其在第一次內閣的人事任命亦可看出對親臺派人士的重用。此外，隨著安倍提出「價值觀外交」等方針，其結果亦間接提升了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能見度與存在感。然而，對臺政策仍屬有限且間接。另一方面，安倍在第一次內閣成立後選擇中國作為首訪對象，並與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達成共識，提出作為新型日中關係定位的「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改善雙邊關係（安倍晉三，2013：249）。綜上所述，安倍作為首相亦重視日中關係的穩定，對臺政策則可視為一種平衡性的取向。

#### 第四節 小結

整體而言，自戰後至第一次安倍政權之前，日本的對臺政策主要在美國東亞戰略與日中關係的制約之下展開，可視為一種「被動性、受限性的外交」。戰後初期至 1960 年代，日本在冷戰結構的框架下，追隨美國的對中與對臺政策，支持中華民國作為「中國的代表」，並維持其政治與外交關係。另一方面，日本在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的背景下，奉行「政經分離」原則，試圖拓展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此舉最終引發臺灣方面的不信任。換言之，該時期的日華關係可被概括為「象徵性友好、實質性脆弱」的結構。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形成所謂的「1972 年體制」，即在切斷政治層面的正式關係之下，持續透過經濟與文化領域維繫非官



方關係。日本在維持對中友好關係的前提下推動對臺交流，但其互動框架的判斷基準實際上多由中方決定，致使臺日關係長期被視為「日中關係的次要組成部分」。自 1980 年代後半以來，隨著冷戰結束與臺灣民主化進程，日本對臺關注日益增強，並透過經濟與文化交流逐步擴展「高層接觸」，惟此一趨勢仍維持在謹慎且有限的範圍內。

自 1990 年代臺海危機以降，臺日關係亦在安全保障層面上開始出現接觸。然而，該互動仍受限於日美安保體制的框架之內，日本並未形成自主性的對臺政策。至小泉政權時期，日本愈加明確地認識到臺海和平與穩定與日本利益息息相關，但「非政府間」「民間層級」的建前並未動搖，結構性制約亦持續存在。

進入第一次安倍政權後，安倍個人對臺灣的親近情感以及其所倡導的「價值觀外交」理念開始顯現。他透過與李登輝的非正式會談及任用親臺派人士等舉措，象徵性地重新活化了臺日關係。然而，當時的安倍仍以維持日中關係的穩定為優先，對臺政策終究僅止於間接性與輔助性的層面。

總的而言，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之前，日本的對臺政策基本上始終受制於美中關係的結構性限制，透過經濟與文化交流維繫有限的互動，可謂是一種「防禦性外交」。

### 第三章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環境因素


本研究以個人層次為分析視角，探討日本對臺政策積極化的成因。然而，國際層次與國家層次的因素亦不容忽視。藉由掌握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之國內外環境變化，得以更整體地理解個人層次影響之意涵。因此，本章首先於第一節整理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國際層次上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美中競爭的激化。其次，在第二節中將分析同一時期日本國內的重要環境變化，主要探討政權更替以及東日本大地震所引發的日本對中、對臺認知轉變。

#### 第一節 國際結構與中美競逐

##### 壹、歐巴馬政府時期之美中關係（2012—2017）

自 1970 年代起，出於對蘇聯進行制衡的安全保障需求，美國對中政策之基本方針為「接觸」(Engagement)，即藉由加強與中國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的關係以追求自身利益。此一政策在對中國寄予經濟與政治期待的背景下，即使冷戰結束後仍持續實施（新垣拓，2023：45）。

2009 年成立的歐巴馬政府在初期展現出重視與中國協調關係的態度。由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史坦柏格 (James Steinberg) 所提出的「戰略性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 一詞所代表的理念，即「只要美國承認並保障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中國便會與美國合作，並在維護世界穩定上扮演負責任的角色」，此一思維引發了所謂「G2 論」，亦即可被稱為「美中戰略共管」(strategic condominium) 的構想（高橋杉雄，2012）。例如，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與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皆主張，在雷曼兄弟危機之後的全球經濟混亂與停滯中，唯有透過 G2 之間的合作，方能挽救世界經濟。曾在卡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在北京人民大學舉行的美中建交三十




週年紀念演講中強調，美中雙方應在中東、北韓以及維和行動（PKO：Peacekeeping Operations）等全球性議題上加強合作，其主張亦被廣泛視為「G2 論」的體現（滝田賢治，2018：124）。當然，也有許多意見認為「G2 論」過於樂觀，對中國未來走向的疑慮仍然強烈。然而，美方之所以期待中國採取合作行動，乃是基於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所展開的反恐戰爭，以及面對北韓與伊朗的核發展問題、氣候變遷等其他全球性議題時，需要中國的支持與配合（新垣拓，2023：47）。

然而，隨後中國對外政策的發展迫使美國不得不修正上述取向。2009 年 3 月發生的「無瑕號事件」（Impeccable Incident）顯示，南海地區已存在一定程度的軍事緊張局勢。此外，同年秋季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COP15）中，中國的行為舉止使國際社會明確意識到，其尚未準備好在全球性議題上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隨後，南海問題的持續升溫，以及因中國漁船在釣魚臺非法作業而引發的中日危機處理，再加上中國在國防政策仍欠透明的情況下，持續發展反衛星武器（ASAT）、匿蹤戰機及反艦彈道飛彈等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皆進一步加深了各國對中國的威脅感與憂慮（高橋杉雄，2012）。

在此背景下，2011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外交專業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之文章，主張世界局勢的走向將在亞太地區決定，並呼籲美國應將外交與戰略焦點自伊拉克與阿富汗轉向亞洲。同月，歐巴馬總統亦在訪問澳洲期間於國會發表演說，表示「美國已作出一項戰略性決定，將在塑造亞太地區的未來中長期承擔更重要的角色」（新垣拓，2023：48）。由此，美國明確展現出重視亞太地區之政策取向，即所謂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或「亞洲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在 2012 年公布的《國防戰略指針》（DSG：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中，也明確闡示了上述方針。

進入歐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 2013 年後，美國在安全保障與經濟領域對中國的不滿與警戒感進一步升高。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於東海與南海地區強硬主張領有



權，並積極採取行動以推動既成事實化，導致局勢日益緊張。在東海方面，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國國防部單方面宣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要求飛經該空域的航空器須遵守其所規定的程序，否則將採取「防禦性緊急措施」。至於南海，翌月美國海軍神盾巡洋艦「考彭斯號」(USS Cowpens) 於該海域航行期間，受到中國海軍艦艇之阻擾行動。2014 年 8 月，美國海軍 P-8A「波塞冬」海上巡邏機於該海域之公海上空執行任務時，發生中國空軍戰機異常接近之事件。關於南海，特別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中國進行大規模「人工島」建設。自 2013 年 12 月前後起，中國於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存在主權爭議之南海多處區域，開始填築於滿潮時即被海水淹沒、依法不構成領土依據之低潮高地。尤其是中國在這些人工島上興建軍事設施並實際部署軍隊的舉動，對美國構成了重大威脅。此外，在經濟領域方面，美國對中國的不滿亦不斷上升。美國對中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與 2009 年相比，2016 年已由 2,268 億美元增加至 3,468 億美元，增幅約為 1.5 倍。同時，關於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所面臨之限制等非關稅壁壘問題遲遲未獲解決，也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挫折感與不滿情緒(新垣拓，2023：48-49)。

隨著中國威脅的增強，美國國防部於《2014 年度四年期國防評估報告》(QDR：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中，首度在安全環境認知部分之開頭強調亞太地區，並將中國明確列為全球安全關切之首要對象。自 2015 年 2 月艾希頓·卡特(Ashton Carter) 就任國防部長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警戒態度更加明顯，相關論述與政策傾向亦日益突出(前田達也，2017：55-56)。

綜上所述，歐巴馬政府雖於任期中後期轉向以「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或「亞洲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為代表的對中政策，但其本質上仍可視為美國一貫對中「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 框架下的延伸與調整。例如，歐巴馬政府將 TPP 視為亞太外交之核心支柱之一，其政策意涵並非採取圍堵或封鎖中國之排他性邏輯，而是在最終願景上表現出對中國加入 TPP 體系之開放與包容態度(舟津奈緒子，2020：36)。然而，隨著支撐美國「接觸政策」之對中期待，與中

國在實力擴張後之行為現實間的落差於 2010 年代日益擴大，對中國之嚴苛觀感遂逐漸蔓延開來。




## 貳、川普政府時期之美中關係（2017—2020）

於 2010 年代逐漸升高的美國對中警戒感，最終在川普政府時期全面浮現。該政府自「接觸政策」轉向，將重點大幅置於與中國之「競爭」與「對立」層面。

川普總統自競選期間起，便始終對中國迅速的經濟崛起採取強硬態度。其關注的核心在於美國龐大的對中貿易逆差所引發之貿易領域衝突，因此，在執政初期，尚未形成涵蓋安全保障與政治影響力等各領域的整體性對中政策基調（舟津奈緒子，2020：35）。

然而，隨著川普政府於 2017 年 12 月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S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其整體性的對中認知與戰略取向遂趨於明確。本報告首度明確將中國（及俄羅斯）界定為「修正主義勢力」（Revisionist Powers），並與伊朗、北韓等「流氓國家」（Rogue States），以及「跨國威脅組織」（Transnational Threat Organizations）並列為美國當前面臨的三大挑戰。此外，報告中指出「中國企圖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擴大其國家主導經濟模式的影響力，並重新塑造有利於自身的區域秩序」，藉此「構建一個與美國價值與利益相悖的世界」，明確展現出美方對中國的高度警戒（The White House，2017：25）。此外，201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國家防衛戰略》（NDS：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1）。此外，該報告強調，美國當前在繁榮與安全保障方面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已不再是恐怖主義，而是來自「修正主義勢力」（Revisionist Powers）之長期且具戰略性的競爭。同時警示，中國的目標在於追求印太地區的霸權，並試圖取代美國的優勢地位（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2）。這些報告清楚表明，川普政府已將中國視為必須警戒的競爭對手。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於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關於川普政府對中政策的演說，此舉進一步凸顯了該政府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該演說內容指出，中國在軍事、經濟與政治等領域的問題日益凸顯，並呼籲美國民眾提高警覺。其中首要被提及的，便是中國在美國國內所進行的影響力運作。麥克·彭斯（Mike Pence）批評指出，中國為了影響美國國內政治與政策，並擴大其在美国社會的影響力以謀取利益，正「動員整個政府體系，運用政治、經濟、軍事手段及宣傳工具」進行滲透。在經濟層面上，彭斯指出，中國為在先進技術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竊取包括尖端軍事技術在內的美國智慧財產，並強迫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交出商業機密。同時，他亦對中國國務院於2015年6月發布的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表達了強烈的警戒。此外，彭斯亦提及，中國運用其近年迅速擴張的軍事力量，積極強化在東海與南海的活動（Hudson Institute，2018）。

如此一來，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對中國透過宣傳與干預活動等所展現之「銳實力」（Sharp Power）的警戒顯著升高，並開始投入更為嚴肅且具體的防制措施。具體而言，2018年8月，美國通過作為2019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一部分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IRRMA：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與《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強化了對美國外資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之制度架構。此外，為防止透過大學進行之技術外流，《國家安全戰略》提出應檢討「針對特定國家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留學生的入境管制」。隨後，美國國務院自同年6月起，縮短了主修機器人學、航空工程等領域的中國留學生簽證有效期限。此外，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的企業陸續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同時，美方亦接連揭露並查處多起技術資訊竊取事件。在此背景下，對中國通訊巨頭華為（Huawei）的制裁亦隨之強化。美國之所以推動排除華為，其背景在於擔憂該公司產品可能被用於資訊竊取，或於緊急情勢時成為攻擊社會基礎設施的工具（梅



本哲也，2020：140-141)。

在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中，最受關注的無疑是雙方之間的貿易競爭。在 2018 年初，美中經濟摩擦尚被視為「尚未進入嚴重階段」，然而自同年 3 月以後，情勢急遽轉變。在美國以「國家安全疑慮」為由宣布對鋼鐵與鋁製品加徵關稅之後，又以中國侵害智慧財產權為理由，明確表態將針對自中國進口之特定產品施制裁性關稅，而後者遂成為美中貿易摩擦的核心焦點。具體而言，美國於 2018 年 7 月首先對約 340 億美元的中國輸入產品加徵 25% 關稅（制裁關稅「第一波」）。隨後在 8 月，又對約 160 億美元的中國製品課以 25% 關稅（「第二波」）；同年 9 月，進一步對約 2,000 億美元的產品加徵 10% 關稅（「第三波」）。其中，第三波關稅於 2019 年 5 月被調升至 25%，而自同年 9 月起，美國又啟動「第四波」制裁，對約 1,100 億美元的中國製品加徵 15% 關稅。此外，美國於 2019 年 8 月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此舉為 1994 年以來首次。其後，自 2019 年 1 月起，美中兩國展開間歇性的貿易協商。然而，由於中國對美國每次加徵關稅均採取報復措施，最終形成了所謂的「貿易戰」局面（梅本哲也，2020：138-140）。

綜上所述，2017 年成立的川普政府，對自尼克森政府以來延續至歐巴馬政府的長期對中「接觸」政策路線產生了重大轉折。該政府認為，接觸政策所倚賴的基本假設——亦即「透過與競爭對手互動，並將其納入國際制度與全球通商秩序，即可促使其轉變為溫和且可信賴的行為體」——最終已被證明並不成立（The White House，2017：3）。如此，美國逐步鮮明地轉向強硬的對中立場，並以貿易摩擦為代表，美中之間的競爭日益升高。

## 第二節 國內氛圍

### 壹、民主黨執政時期日本對中國認知的變化


2009 年 8 月 30 日，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自由民主黨



因而失去政權。日本出現政黨輪替已是時隔約十五年之事，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遂出任首相。然而，一般認為，自民主黨政權上臺後，日中關係惡化，而日本社會的反中情緒亦有所升高。多數論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在於民主黨政權被視為輕忽日美同盟的態度，以及其在外交上的經驗不足。

民主黨在總選舉前即提出其外交政策目標，包括「建立緊密且對等的日美同盟關係」、「形成自主的外交戰略」以及「與亞洲諸國構築互信關係」。該黨將自民黨外交視為過度依賴美國，因而試圖推動更著重亞洲的外交路線。《紐約時報》於 2009 年 8 月 27 日刊載的鳩山由紀夫首相署名評論〈日本的新道路〉中宣示，日本的新國家目標在於構建東亞共同體。文中主張，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已然受挫，民族主義抬頭的風險日增，而為抑制此種混亂，東亞地區的區域整合勢在必行。此外，基於對美元本位體系的疑慮，文章並論述應致力於實現「亞洲共同貨幣」之構想。他也提出一種頗為樂觀的看法，認為若東亞的區域整合得以推進，軍備擴張與領土爭端等問題亦可望獲得解決（信田智人，2011：199）。鳩山在 1990 年代後期曾提出「無常駐美軍的日美安保」構想，主張即便美軍不在日本長期駐紮，只要完善飛彈防禦體系，日本亦能維持其安全。他依照競選承諾，主張重新檢討賦予駐日美軍特別待遇的《日美地位協定》，並推動縮減沖繩美軍基地。簡言之，鳩山路線可被視為一種在促進日中關係和解的同時，減少對日美同盟依賴的外交取向。他所依據的是一種幻想，即認為即便不再大幅依賴美軍的嚇阻力，也能透過對話來維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秋田浩之，2024：27）。

鑑於民主黨政權被外界視為輕視美國之政策取向，美方智庫亦作出反應。位於西雅圖之「全國亞洲研究局」（NBR）邀集前副國防次官理查·洛利斯（Richard Lawless）等多名前政府官員與專家反覆研討，並出版小冊子《如何因應落空的期待》（Managing Unmet Expectations in the U.S.-Japan Alliance），以示警告。其內容指出，日美同盟並不具備其他美國盟國所擁有的制度與機制，因此「不足以稱為真正的同盟」，並進一步批評稱，支撐該同盟的承諾亦付之闕如。報告主張，美國必



須接受日本因「國內政治情勢所限，只能將國際協力維持在最低程度，無法做出具意義的國際貢獻」，並因此有必要為日美同盟可能的功能失靈預作替代方案。此外，《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雜誌上亦刊登了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羅伯特·馬德森 (Robert Madsen) 與理查·薩繆爾斯 (Richard Samuels) 共同撰寫的論文〈Japan, LLP〉。文中指出，日本的角色彷彿「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的企業組織，作為合作夥伴所承擔的責任極為有限。在此類主張的影響下，華盛頓的政策決定者與專家學者之間開始出現「是否應降低對日本的期待」的討論 (信田智人，2011：199-200)。如此，鳩山首相執政期間的日美關係顯著降溫。

在此背景下接掌政權的菅直人首相，於 2010 年 9 月遭遇重大日中危機。事件起因於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臺周邊海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要求其退去之巡邏船相撞，海上保安廳隨後逮捕船長等人，從而引發嚴峻的外交對立。釣魚臺列嶼由日本實施有效控制並置於其治理範圍內，惟中國亦提出主權主張，使該議題成為日中之間持續存在的潛在衝突火種。中國方面強烈反彈，主張「釣魚臺是中國固有領土」，並採取罕見的強硬措施，包括暫停部長級互訪、拘留日本公民，以及中止稀土輸出等行動。此外，中國國內的反日示威迅速蔓延，日系超市等設施遭到襲擊，使得日中關係進一步陷入低迷。表面上看來，此事彷彿是由釣魚臺議題所導致的日中危機，惟一般觀點認為，其癥結實源於日美關係的惡化。中國看準鳩山政權期間日美同盟出現裂痕，因而藉漁船衝突事件之契機，加大對釣魚臺列嶼的施壓力度，進而採取強硬的對日政策。中國並以此事件為契機，開始定期派遣公務船與漁船進入釣魚臺列嶼周邊的領海 (秋田浩之，2024：27-28)。朱建榮亦比較了民主黨與自民黨的外交手腕，指出民主黨首次真正執政，對以往累積的外交經驗之承繼與理解不足，且在處理各類外交問題時欠缺成熟的應對能力，這些因素皆是造成問題的重要原因。民主黨與自民黨皆主張「釣魚臺屬於日本領土」，此一基本立場並無差異。然而，自民黨歷來的外交手法是在國內面對輿論壓力時強調「釣魚臺為日本固有領土，並

不存在主權問題」，但於外交操作上則保留一定程度的彈性與配慮，透過累積默契等方式靈活運用「雙軌話語」。然而，民主黨政權並未能像自民黨般靈活區分對內與對外話語，缺乏運用「雙軌話語」的能力（朱建榮，2010：53-54）。

此事件使日本社會的對中印象顯著惡化。根據日本內閣府於 2010 年所進行的民意調查，回答「不認為日中關係良好」的比例較 2009 年的前次調查大幅上升 33.4 個百分點，達到 88.6%，為 1986 年開始此項提問以來最糟數值。同時，回答「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比例亦上升 19.3 個百分點至 77.8%，創下自 1978 年開始此項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日本內閣府，2010）。此外，言論 NPO 與《中國日報》於 2011 年 8 月 12 日發布之「第七屆中日共同民意調查」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持「較無好感」及「毫無好感」者合計達 78.3%，為歷次調查中之最差水準。同時，調查結果亦指出，日本社會對中國之形象已由過去以「生活感受」為主，逐漸轉為以「釣魚臺議題」為主要認知基礎。在前一年為止，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多半源自歷史問題或「中國政府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應對」等與生活相關的因素；然而，在此次調查中，對中印象惡化的最主要理由則變為「中國政府在釣魚臺漁船衝突事件中的應對」，比例高達 64.6%（言論 NPO，2011）。由此可見，該事件顯然對日本輿論造成了重大影響。

而在承接菅直人內閣的野田佳彥內閣時期，局勢更見緊繃。2012 年 4 月，以右翼政治家著稱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佈擬向釣魚臺的民間地主購買該島，並開始推動實際作業。野田內閣憂慮石原之舉將刺激中國，遂先行將釣魚臺收歸國有。此一決定引發中國強烈反彈，反日示威再度遍及全國，多家日系超市與工廠亦遭受焚毀等攻擊。中國亦向釣魚臺列嶼周邊派遣多艘公務船，致使日中衝突之可能性備受關注（秋田浩之，2024：28）。日本輿論對中國的反感與不信任進一步加深。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民意調查，在釣魚臺國有化之後，因中國公務船多次進入尖閣領海、且中國國內的反日示威持續擴大，認為日本政府「應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受訪者比例達 56%，大幅超過主張「應重視改善日中關係」的 37%（日本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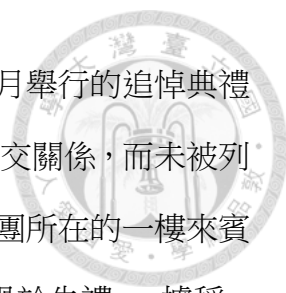
濟新聞，2012)。

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危機意識高漲，成為促使自民黨重掌政權的重要推力。輿論逐漸形成共識，認為唯有讓作為保守勢力的自由民主黨重新執政，以重建日美同盟，方能恢復日中之間的權力平衡，保障日本的安全（秋田浩之，2024：28）。於是，2012年12月，自民黨時隔三年三個月重新奪回政權，安倍晉三內閣由此誕生。事實上，安倍首相在就任後，著手重建日美同盟，並為了改善因中國崛起而傾斜的日中力量對比，加強海上保安廳與自衛隊的體制。例如，在編制2013年度預算時，安倍政府將持續下滑的防衛預算在相隔11年後首次轉為增加。此外，關於決定自衛隊裝備與人員配置的《防衛大綱》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政府亦宣佈中止原有規劃，並在考量中國及北韓軍事局勢後，著手推動全面性改革（秋田浩之，2024：28-29）。

## 貳、東日本大震災援助所引發的日本對臺認知變化

民主黨政權時期日本輿論對中國的不信任日益加深；相較之下，東日本大震災期間臺灣所展現的巨大援助，促使日本社會對臺灣的認知與好感度顯著上升。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於日本東北外海發生，其災害影像亦在臺灣引起強烈震撼。臺灣各地民眾紛紛表達對日本的關切，並踴躍捐款提供義援金。當時，馬英九總統也親自上電視參與日本賑災募款特別節目，呼籲民眾踴躍捐助義援金。各級政府、主要政黨、經濟界、演藝界以及慈善團體等紛紛捐贈救援物資與義援金，臺灣各界所募得的義援金總額超過200億日圓，為全球最高。臺灣政府與民間組織立即派遣緊急救援隊前往災區進行現場救援活動，部分團體並親赴受災地區，參與中長期的重建規劃。

小笠原欣幸指出：「儘管日本媒體當時也曾報導臺灣在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支持，但就筆者的觀察而言，日本社會起初並未立即有所感受。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透過各種管道逐漸擴散後，對臺灣的感謝之情似乎也慢慢在許多日本人的心中傳達



開來」。<sup>8</sup>在東日本大震災滿一周年之際，日本政府於 2012 年 3 月舉行的追悼典禮上，作為臺灣代表出席的駐日副代表羅坤燦，因臺日間不存在外交關係，而未被列入指名獻花名單，並被安排至會場二樓的一般席，而非外交使節團所在的一樓來賓席。此事在日本國內引發批評聲浪，許多人認為此舉「對臺灣過於失禮」。據稱，當時有一名日本政府職員向小笠原表示，「抗議電話多到無法正常工作」(小笠原欣幸，2022：4-5)。在民主黨政權下對臺灣所採取、可謂失禮的這項安排，或許反而具有一種諷刺性的效果，提高了日本輿論對臺灣的關注與認知。

根據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公布的 2011 年日本人對臺灣的意識調查，在「您是否覺得臺灣很親近？」這一問題上，回答「比較覺得親近」者最多(47.6%)，若再加上回答「非常親近」的受訪者(19.3%)，合計達 66.9%，顯示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對臺灣抱有親近感。此外，在「您認為當前的日本與臺灣關係良好嗎？」這一問題上，回答「比較好」的受訪者最多(72.5%)，若加上回答「非常好」者(18.7%)，合計達 91.2%，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當前的臺日關係相當良好。在「您信任臺灣嗎？」這一問題上，回答「多少信任」的受訪者最多(64.0%)，若再加上回答「非常信任」者(20.2%)，合計達 84.2%，顯示多數日本民眾對臺灣抱有高度的信任感。此外，與同代表處於 2009 年以相同問題所進行的前次調查相比，日本民眾對臺灣的印象已有明顯提升。認為「對臺灣感到親近」的受訪者占 66.9%，較 2009 年的 56.1%增加了 10.8 個百分點。認為「臺日關係良好」者達 91.2%，相比 2009 年的 76.0%增加了 15.2 個百分點。至於「信任臺灣」的受訪者則為 84.2%，較 2009 年的 64.7%增加了 19.5 個百分點(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2011)。雖然由於缺乏 2008 年以前的資料，無法與震災前的民意變化進行比較，這點確實構成限制，

---

<sup>8</sup> 原文如下：「臺灣から物心両面のサポートがあったことは当時の日本メディアで報じられたが、筆者の観察では、日本社会はすぐにはピンとこなかった。だが、時間がたつにつれいろいろなルートで広まり、多くの日本人の心の中に臺灣への感謝の気持ちが伝わっていったようだ。」

但震災後日本民眾對臺灣的印象有所提升，已是明顯可見的現象。

此外，許多學者也指出，震災後的臺日關係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例如，楊鈞池指出，2011年9月簽署了《臺日投資協議》，同年11月又簽署了《臺日開放天空協議》，而在2012年7月9日，日本開始施行新的「在留卡」制度，將在臺日灣人的國籍與地區欄改為「臺灣」（楊鈞池，2016：57）。名越健郎從民意調查、城市交流協定以及修學旅行這三個方向分析臺日之間親密度的變化。他指出，例如截至2010年僅有18件的城市間交流協定，自2012年起便大幅增加，而其背後原因之一，正是臺灣的親日態度在日本民眾心中留下了強烈印象（名越健郎，2017：56）。野嶋剛也指出，「自東日本大震災以來，每逢發生大地震，兩國民眾都會展現善意，關心對方的受災情況，並投入募款與各項支援，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野嶋剛，2017）。<sup>9</sup>


###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檢視了第二次安倍政權誕生之際及其執政期間，國際與國內環境的主要樣貌與變化。

首先，在國際層次上，由於中國威脅不斷上升，自安倍於2012年前後重新執政時起，美國歐巴馬政府的對中政策逐漸轉向「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政策；而在川普政府上臺後，美國的對中政策又從以往的「接觸政策」大幅轉向為強硬路線。在堅固的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勢必得與美國的對中政策保持一致的步調。因此，在美國傾向與中國進行協調的階段，日本作為個別行動者在強化對臺關係方面的空間相對受限。然而，隨著美國從對中接觸轉向對中競爭，日本對中國的顧慮相對減弱，也因此產生了更有利的環境，讓日本能以更主動的姿態推動其對臺政策。

---

<sup>9</sup> 原文如下：「東日本大震災以降、大きな地震があるたびに、双方の国民が善意を示し、相手の被災状況を心配し、募金や支援に走り回り、良い循環が生まれた。」



其次，在國內層次上，安倍政權上臺之際，日本社會因民主黨政權時期所發生的一系列與釣魚臺相關的事件，而對中國的印象大幅惡化。另一方面，臺灣在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後所提供的援助，則讓日本民眾對臺灣產生了極為友善的印象。這種反中、親臺輿論的快速上升，可說為安倍政權推動對臺政策創造了更為有利的環境。

政權更替與震災也降低了日本前首相訪臺的難度。2010 年，麻生太郎、安倍晉三及森喜朗三位前首相皆曾訪問臺灣。松田康博指出，日本方面的原因在於，自民黨失去政權、成為在野黨後，使自民黨政治人物前往臺灣的門檻相對降低（川島真等，2021：251）。自 2011 年 5 月起，時任眾議院副議長的衛藤征士郎、前首相森喜朗、安倍晉三、麻生太郎，以及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會長平沼赳夫等人相繼訪臺，並就臺灣在震災時所提供的援助表達感謝之意。2012 年 4 月，前首相森喜朗第三度連續訪臺；2013 年，民主黨籍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與菅直人也先後訪問臺灣。2015 年 4 至 5 月，前首相野田佳彥亦對臺進行訪問。松田康博指出，過去基於日中關係的重要性，曾有一種不成文規範認為前首相應避免訪臺；然而與當時相比，如今不訪臺的前首相反而變得少見。這一變化可視為日本政權更替與東日本大震災所帶來的影響（川島真等，2021：251-252）。

綜上所述，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國際與國內環境皆有利於日本推動對臺政策，可謂形成了相對有利的情勢。

## 第四章 影響安倍決策的個人因素



作為分析個人因素如何影響日本對臺政策的準備階段，本章釐清影響其個人特質的成長歷程與相關經驗等結構性背景。其中，聚焦於被認為對政治社會化具有顯著影響的面向，包括家庭環境、教育經歷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早期政治經驗，進行深入分析。關於早期的政治經驗方面集中於 1993 年其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之前的經歷，尤其是探討其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外相秘書官時所獲得的經驗。

### 第一節 結構層面—家庭環境

許多臺日關係研究指出，安倍重視臺灣的立場，延續自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的價值觀。本節旨在釐清安倍外交與岸外交之間的連續性背景，具體而言，將探討岸信介重視臺灣的歷史背景，以及安倍晉三幼年時期的經驗如何形塑他對岸信介的認知，並進一步理解他日後傾心於岸信介價值觀的原因。

#### 壹、岸信介的價值觀與臺灣重視背景

岸信介在戰後曾被列為甲級戰犯嫌疑人，之後重返政界，擔任日本民主黨幹事長，領導推翻吉田內閣、推動保守勢力整合與新黨組建，最終出任自由民主黨的首任幹事長。他於 1957 年 2 月以外務大臣身分入閣，在石橋內閣因病倒下後（其期間岸信介一度代行首相職務），隨後承接政權，並在兼任外相的情況下出任第 56 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他致力於追求與美國之間更對等的關係，並於 1960 年在國內引發巨大爭議的情況下，完成了《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安倍洋子，2022：78-79）。新安保條約明確規定，美國有義務防衛日本，抵禦來自外部的武力攻擊；同時也規定，若美軍在日本施政權下的領域內遭受武力攻擊，日本亦有義務加以防衛，

因而使其成為一項平等互惠的互助條約。此外，條約亦規定促進經濟合作，推動不僅限於防衛層面的全面合作關係。同時，條約中還設有規定，當日本的安全或遠東的和平與安全遭受威脅時，雙方應進行協商（日本国立公文書館，2007）。

岸信介自其內閣成立以來，曾多次與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會晤，建立起深厚的私人交情，兩人之間亦逐漸形成了密切的關係。1957年3月，即岸內閣成立的次月，臺日雙方設立了民間團體，分別為日本的「日華協力委員會」與臺灣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以期推動「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與共同發展，並成為促進整個亞洲復興的核心機構」。同年5月，岸信介展開首次東南亞巡訪，作為其就任首相後的首次對外出訪，最終一站即為臺灣。此後，岸信介頻繁訪臺，與蔣介石的交往日益密切。即便在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1972年9月日中實現邦交正常化、臺日斷交之後，岸與臺灣之間的交流仍未中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過程中，岸曾是自民黨內主張挺臺的「親臺派」國會議員群體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1973年4月蔣介石逝世時，岸亦率領日本弔問團前往臺灣致哀。此外，在1985年，岸信介為紀念蔣介石百歲誕辰，與身兼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會長的灘尾弘吉一同作為代表，成立了「顯彰蔣介石先生遺德之會」（蔣介石先生の遺徳を顕彰する会）。這是一個民間團體，其宗旨在於一方面讚揚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寬大決斷」，另一方面也將之作為邁向未來飛躍的精神養分。所謂「以德報怨」，是指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臺宣布勝戰的同時，嚴令禁止對戰敗的日本進行報復。岸信介的親信、後來曾任防衛廳長官與農林大臣的松野賴三指出，這一「以德報怨」正是岸重視臺灣的重要原因之一（丹羽文生，2019：2-18）。

作為岸信介重視臺灣立場的背景，學者普遍指出其「反共主義」的立場，並強調他同時懷抱「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志向，追求自主性與更對等的國際地位。平川幸子指出，岸信介在就任後最初訪問的地區之所以包含臺灣，其背景在於他抱持著「日本才是亞洲反共盟主」的理念，並試圖將亞洲外交視為日本自身的國家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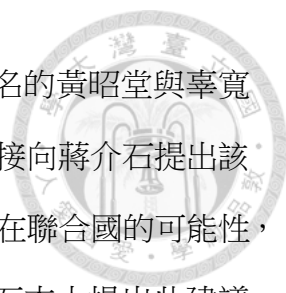
任來推動，而非僅僅依循美國的要求行事（平川幸子，2022：69）。邁克·格林（Michael Green）也指出：岸信介是徹底的反共主義者，對左派懷有強烈的警戒心。對他而言，日本的安全保障並非僅是亞洲層面的課題，而是與整個西方陣營的命運密不可分。因此，他一方面認為日本應作為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成員承擔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亦期望在該秩序中將日本定位為與美國對等的合作夥伴。此外，他深信，適度的民族主義復甦對日本而言屬於健康現象（Green, M. J., 2022：34-35）。

特別是丹羽文生，對岸信介的反共立場與其親臺態度之間的關聯進行了詳細分析。岸信介明確表達了自身的「反共」立場，強調他堅決拒絕共產主義對日本造成的體制變質。對他而言，政治的根本在於「排除一切威脅自由的因素，並守護自由」，而共產主義則是一種不承認自由的思想。儘管這番言論並未直接針對特定國家，但足以顯示岸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丹羽文生，2019：4）。<sup>10</sup>丹羽文生指出：「對以『反共』為宗旨的岸信介而言，可以想見，一個由共產政權主導的中國，其存在本身對他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他對於與共產主義對立的蔣介石懷有同情之情，亦屬自然」（丹羽文生，2018：147-148）。<sup>11</sup>由此可見，岸信介相當重視「作為反共陣營的臺灣所具有的重要性」。作為其立場的根據事實之一，1969年岸信介以極機密方式訪問臺灣，並曾建議當時堅持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國際事務的蔣介石總統，考慮以臺灣獨立作為選項，以設法留在聯合國。他強烈期望作為反共陣營支柱的臺灣能夠繼續留在聯合國。至於此建議是否由岸信介向蔣介石直接提出，

---

<sup>10</sup> 原文如下：「岸は自らの『反共』というスタンスについて『日本を共産主義化するというような場合には、われわれがそれを認めない』と強調し、続けて『自由を脅かすあらゆるものを排撃して、自由を防衛していくことが結局は政治の基礎だと思うんだよ。その点共産主義は人間の自由を認めないからね』と述べている。」

<sup>11</sup> 原文如下：「『反共』を旨とする岸にとって共産主義政権が君臨する中国という存在はこのまじからざ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したがって、共産主義と対峙する蔣介石にシンパシーを抱くのは自然であろう。」



相關證言尚有歧異。相關證言包括以臺灣獨立運動重要人物聞名的黃昭堂與辜寬敏。黃昭堂證言指出，他曾從岸信介口中得知，岸本人確實曾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該項建議；然而辜寬敏則表示，雖然岸信介確實曾思索臺灣繼續留在聯合國的可能性，也曾向他表達過這樣的想法，但他並沒有聽說岸曾直接向蔣介石本人提出此建議的具體事蹟。而且，辜寬敏指出，岸信介對蔣介石的讚譽只是一種姿態，因為不論是對美國，還是對日本而言，為了守護作為「反共堡壘」的臺灣，有必要對蔣介石表現出阿諛奉承的態度（丹羽文生，2019：19-20）。

此外，黃自進強調指出，岸信介的反共姿態，源於在中國共產黨崛起與北韓成立等局勢變化之下，他重視與美國建立關係，而美國當時將反共勢力的重建視為亞洲政策中最重要課題。他進一步指出，岸信介在就任首相後立即訪問臺灣，其目的不僅在於向美國展示日本能夠在亞洲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更在於透過表達對臺灣的支持、明確宣示對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毫無興趣，以此展現對美國的忠誠（黃自進，2008：5-8）。

綜上所述，岸信介的價值觀可歸納如下：他認為，為了維護日本的安全保障，堅守自由陣營並加強日美同盟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對優先輕武裝與經濟復興的吉田路線持批判立場，並以日本作為支撐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一環，以承擔更大的國家責任為目標。在此過程中，他明確提出反共立場，不僅對與共產主義對立的臺灣抱有同情，更將臺灣視為反共陣營的重要支柱，並積極推動雙邊關係之建構。邁克·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岸信介的理念，包括反共主義、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維持、更大國家責任的承擔，以及民族主義的復甦，皆成為後來安倍晉三的重要理念基礎（Green, M. J., 2022：34-35）。以下將檢視安倍為何承繼了岸信介這些理念的背景。

## 貳、安倍晉三的童年時期與對岸信介的認知建構

平川幸子指出，安倍首相十分仰慕其母系祖父岸信介前首相，並將其視為政治

家的典範，懷有深深敬意（平川幸子，2022：69）。安倍晉三出生於政治世家，除了岸信介之外，其父系祖父安倍寬也是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因反對東條英機的戰爭方針，在戰爭期間的總選舉中以「非大政翼贊會推薦」的身份當選，展現出其反骨精神；其父安倍晉太郎亦曾擔任眾議院議員。在眾多政治家親屬之中，為何普遍認為安倍晉三繼承的是岸信介的價值觀？

根據安倍晉三本人以及其親屬與相關人士所述，自從父親安倍晉太郎成為國會議員後，父母為了選舉活動經常長時間待在山口，安倍兄弟大多是由保母或外祖父母照顧長大的（野上忠興，2015；安倍寬信，2020；安倍洋子，2022）。曾擔任安倍晉三保母的久保梅表示，在安倍開始懂事的年紀，正值選舉期間，他的母親即使想多照顧孩子，也分身乏術。她指出，安倍晉三那時似乎試著讓自己接受一個現實，即使渴望父母的關愛，也無法如願，於是學會了放棄對某些事物的執著（野上忠興，2015：22）。安倍晉三的哥哥安倍寬信也回憶說，兄弟倆幾乎沒有什麼機會與父親相處或交談，父親來參加學校的家長參觀日，也頂多只有寥寥數次。他說，當時他們非常羨慕那些能經常和父親互動的同學（安倍寬信，2020：29）。安倍晉三本人也在訪談中提到「我確實曾嚮往過一般的家庭，...我們家裡幾乎看不到父親，母親也常常回選區。所以父親偶爾回到家時，反而會讓人覺得有些生疏和不自在」（野上忠興，2015：22）。<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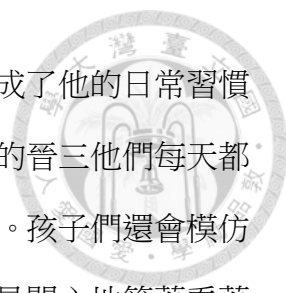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相較於父親，對安倍兄弟傾注更多關愛的人是岸信介」（野上忠興，2015：37）。<sup>13</sup>岸信介住在與安倍家所在的世田谷區代澤不遠的澀谷區南平臺，對安倍晉三而言他是一位非常親近的存在（安倍寬信，2020：110）。<sup>14</sup>根據久保梅的說法，當時由於安保運動期間岸宅存在安全風險，安倍一家已搬離岸家，然而年僅五

---

<sup>12</sup> 原文如下：「やっぱり普通の家庭への憧れはあった、...うちの家には父は全然いないし、母も選挙区へ帰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だから父がたまに家にいたりすると、何かギクシャクした感じがしたほどだった。」

<sup>13</sup> 原文如下：「安倍兄弟に父と対照的な愛情の注ぎ方をしたのが岸だった。」

<sup>14</sup> 岸信介先搬到富谷，之後又遷至御殿場。



歲的安倍晉三因父母常常不在家，便經常到岸宅用晚餐，這幾乎成了他的日常習慣（野上忠興，2015：24）。母親洋子回憶道，當時還在上幼稚園的晉三他們每天都吵著要去岸宅，一到那裡，岸信介就立刻和孫子們開始玩捉迷藏。孩子們還會模仿遊行隊伍，一邊跑來跑去一邊喊著「反對安保！」，而岸信介只是開心地笑著看著他們。洋子表示，對當時的岸來說，和孫子們一起玩耍的時光，也許是他少有的內心能夠真正放鬆的時刻（安倍洋子，2022：39、108）。岸信介還曾悄悄現身安倍晉三的小學運動會，為孫子加油助陣。哥哥安倍寬信回憶，在晉三的弟弟岸信夫出生之前，最受岸信介疼愛的就是晉三。<sup>15</sup>晉三非常喜歡外祖父，經常對親近的朋友說「爺爺真的很厲害」，甚至還曾表示「外祖父堅守了日美安保條約，這件事會在 50 年後受到肯定」（安倍寬信，2020：58-59）。<sup>16</sup>安倍晉三本人也曾表示：「從小到大，在我眼中，外祖父一直是個總是思考著國家未來該何去何從的、誠懇認真的政治家」（安倍晉三，2013：28）。<sup>17</sup>

安倍寬信表示，對他們而言，岸信介確實是一位非常親近的存在。「我們也從外祖父那裡學到了很多事，實際上也曾親眼見過政治現場。外祖父的影響力非常大，而我可以感受到，弟弟晉三對外祖父非常敬仰，他的政治態度也深受外祖父的影響」（安倍寬信，2020：110）。<sup>18</sup>另一方面，作為安倍晉三另一位祖父的反戰政治家安倍寬，安倍晉三幾乎未曾提及他的事蹟與貢獻。事實上，安倍寬在安倍晉三出生之前便已於 51 歲過世，兩人並無任何互動的機會，因此可以想見他對安倍寬無法產生如同對岸信介那樣的親近感（野上忠興，201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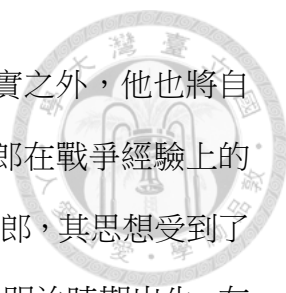
---

<sup>15</sup> 岸信夫在出生約半年後被過繼至岸家。

<sup>16</sup> 原文如下：「祖父が日米安保条約を守り切ったことは 50 年後に評価される。」

<sup>17</sup> 原文如下：「祖父は、幼いころからわたしの目には、国の将来をどうすべきか、そればかり考えていた真摯な政治家としか映っていない。」

<sup>18</sup> 原文如下：「祖父を通じて、教えられたこともありました。実際に、政治の現場を見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それだけ大きな存在で、弟の晋三は、祖父のことを尊敬し、その政治姿勢にも大きな影響をおよぼしていることを感じます。」




除了安倍晉三對這位給予他滿滿愛的外祖父特別親近的事實之外，他也將自身保守主義思想的根源，歸因於外祖父岸信介與父親安倍晉太郎在戰爭經驗上的差異。他表示：自大學以後成長於戰後教育體系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其思想受到了對戰爭的悲劇經驗及其世代的反省所影響；而外祖父岸信介則是明治時期出生，在戰前環境中成長。他的青春時代正值戰前日本高速發展、充滿榮光的年代，對那個時代抱有極大的自信。安倍晉三坦言：「對於那個大家都認為是『非常負面的歷史時期』，外祖父卻懷有強烈自信，我也很好奇，究竟這樣的自信背後有什麼樣的背景？」他回憶說，外祖父是個在跟我完全不同世界中度過少年與青年期的人，年輕時聽他講述那些往昔的故事，對自己來說既新鮮又深具啟發性，自認也多少受到了影響（野上忠興，2015：151-152）。

顯而易見，安倍晉三自幼便尊敬其外祖父岸信介，並肯定其價值觀。他對外祖父的強烈敬愛，以及對其經歷與歷史認識的高度好奇心，足以使安倍晉三深受岸信介政治觀的影響。然而，僅憑此一家庭環境，尚不足以構成安倍承繼岸信介各種理念的充分依據。以下將論述強化安倍此一認知的重要因素，亦即其所經歷的教育與社會環境；並指出其與家庭環境之間的矛盾，進而分析安倍晉三如何看待這些矛盾，並在其中逐步形成自身的歷史觀與世界觀。

## 第二節 結構層面—教育與社會環境

1954 年出生的安倍晉三，其幼年到青年時期，正值圍繞《日美安保條約》修訂而掀起激烈反對運動的時代。他所處的社會普遍籠罩在反對安保的氛圍之中，而他的家族卻是推動安保條約的一方。這種社會氛圍與家庭立場之間的巨大落差，可以想見對他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1960 年初，日本發生了為了阻止首相岸信介訪美而爆發的「羽田騷亂」，揭開了動盪一年的序幕。在《日美安保條約》即將依據眾議院優越原則、在參議院未進



行表決的情況下自然成立之際，國會與首相官邸被多達 33 萬名示威者層層包圍，而位於南平臺的岸信介私邸亦多次成為示威者包圍的對象。<sup>19</sup>抗議群眾不僅高喊「反對安保！」的口號，還向宅邸內投擲石塊、木板、垃圾，甚至是點燃的報紙等物品。當時擔任眾議院議員的安倍晉太郎也駐守在現場，而無法離家的岸信介則常在感到無聊時，叫來安倍兄弟陪伴自己（安倍晉三，2013：26-27；安倍洋子，2022：107-108）。安倍晉三在年幼時，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外祖父被示威人群包圍的情景。對於當時的記憶，安倍晉三回憶道「我曾問外祖父，『安保是什麼？』外祖父回答說『安保條約是讓美國來保護日本的條約。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大家要反對。』我對外祖父這樣回答的情景，至今還有一點模糊的印象」（安倍晉三，2013：27）。<sup>20</sup>對此，野上忠興指出「對當時年幼的他來說，高喊『反對安保！』的示威群眾被視為『外祖父的敵人』，這樣的印象若深深烙印在心中，也不是難以理解的」（野上忠興，2016：24）。<sup>21</sup>


此外，安倍晉三升上高中的 1970 年，正值學生運動因越戰背景而達到高峰。1960 年由岸信介內閣修訂的《日美安保條約》，也正好進入簽署 10 年後的自動延長期。1960 年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規定，條約的有效期限為十年，但若在期滿前一年，雙方當中沒有任何一方表明希望「終止條約」的意圖，條約將會自動延續。在這一年前後，日本社會處於極度動盪的狀態。除了有學生要求廢除安保條約所發起的「反對 1970 年安保鬥爭」之外，還發生了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佔領事件、國際反戰日的新宿街頭衝突、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Enterprise）進港所

---

<sup>19</sup> 「自然成立」是日本國會中指在眾議院通過後，若參議院在法定期間內未作出決議，該法案將自動生效的狀態，通常適用於眾議院具優越權的案件。

<sup>20</sup> 原文如下：「わたしは、祖父に「アンポって、なあに」と聞いた。すると祖父が、「安保条約というのは、日本をアメリカに守ってもらうための条約だ。なんでみんな反対す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よ」そう答えたのをかすかに覚えている。」

<sup>21</sup> 原文如下：「『安保反対！』と叫ぶデモ隊が「祖父の敵」として幼心に刻まれたとしても解せなくはない。」



引發的激烈抗議，以及「淀號」劫機事件等一連串動盪事件（安倍晉三，2013：23-24；野上忠興，2015：51）。當時，社會黨、共產黨等在野黨，以及多數媒體皆主張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堅持維護安保體制的保守派自民黨被描繪成「反派」，而主張廢除安保的革新勢力則被視為「正義的一方」。換句話說，當時革新勢力所要打倒的對象，正是自民黨的政治人物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以及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尤其是岸信介，作為將國內輿論一分为二的 1960 年安保騷亂時的首相、也是推動安保條約修訂的關鍵人物，對革新陣營而言，他不只是反派，而是極惡之徒（安倍晉三，2013：23-24）。然而，對安倍晉三而言，岸信介是他深愛的外祖父，同時也是一位「總是思考著國家未來該何去何從的、誠懇認真的政治家」（安倍晉三，2013：28）。

此外，安倍晉三也提到了一段讓他對反對安保的人們產生更大懷疑的經歷。這段經歷發生在他高中時期，他在倫理與社會課堂上的一場與老師的對話中深有感觸。當時的老師在課堂上表示，日美安保條約對日本的安全與和平毫無助益，反而會把日本捲入戰爭，因此應該趁著 1970 年這個節點予以廢除。班上的整體氛圍也大致相同。雖然老師並未指名道姓，但安倍感受到，批評的矛頭似乎正指向自己。於是他心想，能夠提出反駁的，也只有自己了，便開口說道：「新條約中也有經濟條款。那裡寫著要推動日美間的經濟合作，您對此有什麼看法呢？」<sup>22</sup>安倍晉三雖然不太清楚安保條約的具體條文內容，但據說他曾聽外祖父岸信介說過：「安保條約中有一項推動日美之間經濟合作的條款，這對日本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然而，當他向老師提出這樣的問題時，老師可能是被安倍的氣勢壓住了，或是不願與「岸信介的孫子」展開爭論，最終並未正面回應安倍的發言，只是露出不悅的神情，便轉換了話題。針對這段經歷，安倍晉三表示：「那些不經仔細審視內容，就動不動高喊『革新』『反權力』的人，讓我總覺得哪裡怪怪的。這位老師當時的慌

---

<sup>22</sup> 原文如下：「新条約には経済条項もあります。そこには日米間の経済協力が謳われていますが、どう思いますか。」

張反應，更讓我確信這種感覺是對的，成了我定下這個看法的關鍵一刻」。<sup>23</sup>他還說，進入大學後，他將《安保條約》完整讀了一遍，並「確信這是一份對日本未來至關重要的條約」（安倍晉三，2013：23-25；野上忠興，2015：51-53）。

正因如此，安倍夾在將安保修訂視為正義、並大力推動該政策的外祖父岸信介所帶來的家庭環境，與將安保視為邪惡的社會氛圍之間。面對社會上的種種批判，岸信介始終沉著冷靜、毫不動搖，這讓安倍感到驕傲，也逐漸認為那些高喊反對安保的人才是錯的（安倍晉三，2013：28）。哥哥安倍寬信指出：

*在晉三的心中，有一種想法是「為什麼外祖父明明是懷著自己的信念，為了國家與國民推動安保修訂，卻被罵得像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晉三認為，外祖父所推動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是『將片面性的條約改為更接近對等的條約，目的是為了滿足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他評價這項改定為『在強化日美關係的同時，也朝向日本自立邁出重要一步』。儘管這在當時是政治家所能做出的極為現實的因應措施，但媒體和整個社會卻未能理解這一點。對此，晉三內心有著強烈的反感（安倍寬信，2020：83-84）。<sup>24</sup>*

安倍晉三表示，雖然自己確實對當時左派的氛圍感到反感，但同時也曾想過：「是不是因為政治人物沒有向國民做出充分的說明？如果是我，我應該能解釋得更清楚。當時正值七〇年安保運動期間，即使在班上進行安保議題的討論，我也從未在

---

<sup>23</sup> 原文如下：「中身も吟味せずに、何かというと、革新とか反権力を叫ぶ人たちを、どこか胡散臭いなあと感じていたから、この先生の狼狽ぶりは、私にとって決定的だった。」

<sup>24</sup> 原文如下：「...晋三の中には、...『なぜあれだけ自分の信念で、国家・国民のために（安保改定を）やったのに、極悪非道な悪人呼ばわりされるのか』晋三は、祖父が政治生命を賭けた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の改定を『片務的な条約を対等にちかい条約にして、まず独立国家の要件を満たそう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と評価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れは、『日米関係を強化しながら、日本の自立を実現する』ものだった。政治家として当時考えられる、きわめて現実的な対応だ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マスコミをはじめ、社会はそれを理解していない。そのことへの反発がありました。」

辯論中輸給過任何人」。<sup>25</sup>透過這些經歷，安倍自國中高年級至高中時期，便開始明確意識到成為專職政治家的道路（野上忠興，2015：61-62）。由此可見，安倍晉三之所以開始意識到從政這條路，根本上是源於他對岸信介的敬仰，以及對當時社會氛圍的反感。

此外，安倍在大學畢業後曾赴美留學，隨後進入神戶製鋼所工作，並在入社後前往紐約辦事處接受培訓。他曾提及，正是透過這段經歷，他學習到在與美國人進行談判時特別需要掌握的要點。具體而言，他學習到「與美國人交涉時，既不可傲慢，亦不可卑屈；即便對方年長或職位較高，亦應視為同等地位，平等相待」，並認為「無論地位或年齡，只要是正確的觀點，皆應立即採納」。他深受此種個人主義理念之影響。（安倍晉三，2013：34；Zhang, Y., 201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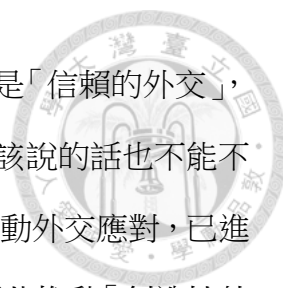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安倍在親身經歷一方面由主張反共與日美合作的政治家外祖父所代表的家庭環境，另一方面由社會上反對聲浪所構成的矛盾時，逐漸形成「外祖父岸信介的思想是正確的，而社會是錯誤的」之認知，並在此基礎上建構自身的價值體系。此外，其赴美留學期間所學得的若干價值觀，亦可能對其外交風格產生影響。

### 第三節 結構層面—早期政治經驗

安倍晉三正式以職業身份涉足政治是在 1982 年，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被任命為中曾根內閣的外務大臣時，晉太郎任命安倍晉三為自己的秘書官。從 1982 年 11 月到 1986 年 7 月，晉太郎擔任外務大臣長達 3 年 8 個月，期間共出訪 39 次、在海外停留 266 天，造訪了 81 個國家與地區（安倍寬信，2020：90-91）。安倍寬信談到父親安倍晉太郎的政治風格時表示：「在內政上是鴿派，在外交上則是鷹派」，

---

<sup>25</sup> 原文如下：「しかし、それは政治家がうまく国民に説明していないからじゃないか、自分ならもつとうまく説明できるのに、とも思っていた。ちょうど 70 年安保の頃で、私はクラスで安保の議論をしても誰にも負けなかった。」



而父親本人也有這樣的自我認知。在外交方面，他常掛在嘴邊的是「信賴的外交」，他認為，為了實現這樣的外交方針，該堅持的原則就必須堅持，該說的話也不能不說，特別重視與不同體制國家的對話。他認為日本已無法再以被動外交應對，已進入必須積極營造有利於日本及全球和平與繁榮之環境的階段，因此推動「創造性外交」（安倍寬信，2020：88-91）。

安倍晉三在父親安倍晉太郎 39 次的出訪行程中，隨行了大約 20 次（安倍晉三，2013：37）。安倍晉三在回顧當時的經歷時表示，「擔任外相秘書官的期間，對於建立作為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不動的信念與原則』具有重要意義」（安倍寬信，2020：91）。<sup>26</sup>安倍特別提到，他從那段經歷中具體學到的一點是：「在加強與同盟國之間的信賴關係時，政治人物之間的私人信賴關係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當時，美國總統雷根與日本首相中曾根之間的「Ron-Yasu 關係」相當知名，而安倍晉太郎也與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建立了深厚的信賴關係。這些人際間的信賴，對當時的日美友好關係有著極大的貢獻。

具體而言，1980 年爆發兩伊戰爭後，中曾根曾邀請伊朗與伊拉克兩國來日，呼籲停戰，日本也同時對兩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安倍晉太郎也在同一時期出訪兩國。然而，當時美國與伊朗革命後的新政權處於敵對狀態，並支持伊拉克，因此理應對日本訪問伊朗感到不滿。但最終，在舒茲國務卿的支持下，美方還是同意了這項訪問（安倍晉三，2013：37-38）。此外，安倍晉太郎「創造性外交」的一項重大成果，是自民黨與前蘇聯共產黨之間的政黨交流。1990 年 1 月，安倍晉太郎以自民黨訪蘇團團長的身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與戈巴契夫會談，安倍晉三亦隨同出席。「日蘇兩國正處於克服雙邊棘手問題的關鍵時刻。盼能在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期間，以智慧加以解決。」安倍晉太郎此一呼籲，引出總書記回應，稱日本對領土歸還的主張屬於「固有權利」。（安倍晉

<sup>26</sup> 原文如下：「晉三自身、『政治家が行動するうえで欠かせない“ぶれない軸”というものをつくるのに、外相秘書官の経験は役立ちました』と語っています。」

三，2013：39-40)。安倍晉三親眼目睹晉太郎那種積極且重視個人信任的外交姿態，如何在關鍵時刻展現並引導出日本在外交上所追求的有利方向。

根據安倍的說法，在擔任父親秘書之前，他與父親之間幾乎沒有太多交流；但自從成為秘書之後，兩人開始有了密切相處的機會。他因此得以近距離觀察父親與中曾根康弘的外交風格，特別是在與美國及蘇聯等大國的外交往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Zhang, Y., 2017：17）。相較於晉太郎所主張的「創造性外交」，即強調日本已無法再以被動外交應對，而必須積極營造日本與世界和平與繁榮的環境，安倍晉三則在 2018 年聯合國大會上表示：「日本外交的目的，在於確保世界與地區的未來更為穩固。在此基礎上，我所期盼的，是日本未來的青年能夠堅毅地面對挑戰。我們這一代的使命，就是要創造出讓他們更容易實現這一點的環境」（日本外務省，2018b）。<sup>27</sup>由此可見，晉太郎「創造性外交」的信念，已明顯被安倍晉三所承繼。

另外，安倍表示：「能在擔任秘書期間接觸到眾多優秀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理論，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據說他特別深受日本保守思想代表人物岡崎久彥與中西輝政的影響。關於岡崎，當時父親晉太郎擔任外務大臣，而岡崎則是外務省情報調查局長，安倍曾研讀其著作，如《戰略性思考是什麼》（戰略的思考とは何か）等（Zhang, Y., 2017：19）。岡崎始終堅持這樣的觀點：「自明治開國以來，日本的安全仰賴於與掌控七大洋的英美世界之間的友好與同盟關係」（岡崎久彥，2012：105）。他後來作為外交與安全保障的智囊支持安倍首相，並且是首相安倍晉三就日本集體自衛權行使可能性所設立的私人諮詢機構「有關再構築安全保障法制基本的懇談會」的專家委員。<sup>28</sup>晚年的岡崎強調在對中外交戰略中「維持臺灣海峽現狀」的重要性，

<sup>27</sup> 原文如下：「日本外交の目的とは、世界と地域の未来を、確実なものとする事です。さらにその上で、私が願いますのは、日本の未来を生きる若人たちが、たくましくも、チャレンジに立ち向かってくれることです。それをやりやすい環境を生み出すことが、私たち世代の務めです。」

<sup>28</sup> 其日文名稱為「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懇談会」。該懇談會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提交最終報告後即告解散，但在 2013 年第二次安倍內閣時重新設立，他也再次受任為委員。

據說他對臺灣的前途最為憂心（長島昭久，2022）。中西輝政也在第一屆安倍內閣成立後，被報導為五位具有政策影響力的智囊之一。此外，他還擔任日本保守派政治團體「日本會議」旗下四個相關組織的幹部，並參與日本會議的各項活動，被視為在第一、第二屆安倍內閣中均發揮支持作用（竹內洋一、山川剛史，2006）。

母親安倍洋子表示：「現在回想起來，晉三在政策風格上像外祖父，在政治手腕上則比較像父親吧」（安倍洋子，2022：16）。<sup>29</sup>安倍透過擔任其父安倍晉太郎時任外相之秘書官的經驗，習得其父在建立信任關係與展現積極姿態等方面的外交手腕，並據此奠定其作為政治家行動之基礎。同時期與知識分子的交流，以及對以保守主義為核心之理論的吸收，亦對其思想與政治風格產生影響。

## 第四節 安倍的個人特質

承接前章所揭示的家庭環境、社會情勢與政治經驗等結構性因素，此節進一步探討安倍晉三的個人特質，從「信念」、「動機」、「決策風格」與「人際風格」四個面向進行分析，以探究其外交判斷與對臺政策背後的思維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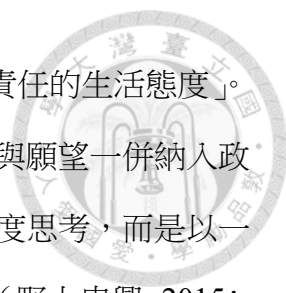
### 壹、信念

依據荷曼的定義，「信念」為「作為行動準則的哲學性信仰，即對世界的基本假設」，並據此探討安倍所持有的基本信念與主義立場、對國家角色的認知，以及其對國際秩序應有樣貌的價值理念（Hermann, M. G., 1978）。

安倍在其著作《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中，以第一章〈我的原點〉為題，闡述其政治信條與思想。他主張自己的立場屬於「保守主義」，更進一步而言，乃「開放的保守主義」（安倍晉三，2013：22）。他在闡述自己對「保守」的理解時指

---

<sup>29</sup> 原文如下：「今から思えば、晋三は『政策は祖父似、政局は父似』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か。」




出，所謂的保守，是一種「不僅對現在與未來，也同時對過去負有責任的生活態度」。也就是說，「將那些曾活在過去、如今已無法發聲的人們的聲音與願望一併納入政治考量」。他進一步說明，這種態度並非以五年、十年的時間尺度思考，而是以一百年、兩百年的尺度，從過去與未來兩個方向來看待與思考問題。(野上忠興，2015：150)。<sup>30</sup>安倍在說明其形成保守主義立場的背景時，提及了童年時期的經驗。他曾回憶自幼便知外祖父被稱作「保守反動的化身」或「政界的黑幕」，亦曾有人說過「你外祖父不是 A 級戰犯的嫌疑犯嗎？」然而，對他而言，其外祖父是一位真誠思考國家未來的政治家。面對外界的批評，岸信介總以從容與穩重的態度應對，這也讓安倍深感自豪。安倍並進一步指出，隨著年歲漸長，他才逐漸意識到錯的其實是那些高喊安保反對的人。換言之，起初安倍之所以對「保守主義」產生親近感，與其說是被「保守主義」本身所吸引，不如說是出於對那些被稱為「進步派」「革新派」之人的懷疑與反感，反而對「保守」一詞萌生了某種親近之情(安倍晉三，2013：22、28；野上忠興，2015：151)。此類言論清楚地顯示，安倍所經歷之家庭與社會環境矛盾的結構層面，對其保守主義政治信條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這樣的保守主義立場，直接關聯到其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對日本人安全保障觀的問題意識。安倍認為，人無法脫離家庭、土地與社區，也無法與其所承載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相分離。對他而言，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這片土地本身即是「國家」，守護國家亦意味著守護家庭與地方的歷史記憶。他主張，愛國與護國的根本在於維護國家的獨立與主權，並保衛國民的生命、自由與人權，以及日本人所延續的文化與傳統；同時，在國際社會中，應以相互尊重與信任為基礎，與不同歷史背景的國家共存(安倍晉三，2013：100、133-134)。

---

<sup>30</sup> 原文如下：「...保守というのは現在・未来と同時に、過去に対しても責任をもつような生き方ではないか、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います。つまり、過去に生きていた人達の声なき声や願いをも含めて政治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例えば、五年や十年という尺度ではなくて、百年、二百年という尺度で、過去側にも未来側にも立って、ものを考える姿勢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安倍進一步批評指出，那些本應由日本人親手守護的價值與事物，過去的日本卻缺乏以自身政府之力量加以維護的明確意識，長期以來選擇迴避問題，而只是一味追求經濟上的富裕。他具體指出，相較於西德國在戰後成功實現重整軍備與經濟成長的雙重目標，日本則將安全保障託付於美國、優先追求經濟發展。雖然因此獲得了物質上的繁榮，卻也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只要談及國家與安全保障，就會被貼上「軍國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標籤——導致日本逐漸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安倍晉三，2013：132）。安倍指出，自由民主黨的結黨理念在於「完成戰後復興」與「制定自主憲法以終結戰後體制」。然而，他批評歷屆政府雖以經濟成長為首要目標並確實達成高度成長，但也在經濟至上主義下形成了以損益為價值標準的社會風氣。更嚴重的是，《日本國憲法》前言中「信賴熱愛和平之諸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以維持我國安全與生存」的表述，等同於將國民安全託付於他國。他強調：「世界上不存在會替不願為自身國家而戰的人民作戰的國家」。<sup>31</sup>他指出，包括綁架問題、領土問題、日美關係以及經濟問題在內的各項課題，其根源皆在於日本缺乏「以自身之力守護國民生命與財產、以及國土」的明確意識（安倍晉三，2013：250-251、253-254）。<sup>3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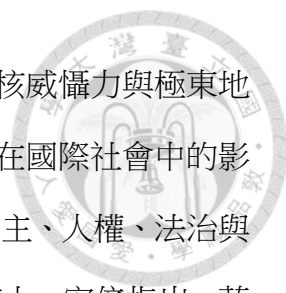
在安全保障觀的論述中，安倍認為，為維護本國安全，固然必須盡最大限度的

---

<sup>31</sup> 原文如下：「日本国憲法の前文にはこうあります。『平和を愛する諸国民の公正と信義に信賴して、我らの安全と生存を保持しよう」と決意した』実に奇妙な一文です。国民の安全を守るといふ国家として最も重要な使命を、何と『平和を愛する』諸外国の国民を信賴するという形で丸投げしてしまっている。」

「自分の国を守るために戦わない国民のために、代わりに戦ってくれる国は世界中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

<sup>32</sup> 原文如下：「こうして日本が抱える課題を列挙してみると、拉致問題のみならず、領土問題、日米関係、あるいは TPP のような経済問題でさえ、その根っこは一つのように思えます。すなわち日本国民の生命と財産および日本の領土は、日本国政府が自らの手で守るといふ明確な意識のないまま、問題を先送りにし、経済的豊かさを享受してきたツケ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自助努力，並具備「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的氣魄；然而，若從核威懾力與極東地區穩定的角度觀之，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則屬不可或缺。考量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經濟與軍事實力，以及其所共享之基本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與市場經濟——安倍認為，日美同盟乃最為理想之選擇。在此基礎上，安倍指出，若日本能承擔更大之責，以提升同盟之雙務性，將有助於強化互信之紐帶，構築更為對等之關係，並最終促進日本自身之安全（安倍晉三，2013：133、135）。此外，安倍強烈意識到日本作為海洋國家的特質，並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自由且開放的海洋」之維持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小野寺五典等，2022；Green, M. J., 2022：11；安倍晉三等，2023：314）。日本是四面環海的島國，資源與糧食多仰賴進口，海上航線（Sea Lane）就是國家的生命線。

總結而言，安倍晉三持有以下信念。日本的魅力在於其自由與民主的社會體制，尊重基本人權，並建立在健全的法治之上，同時與各國共享市場經濟的共通理念。然而，今日日本的富足與繁榮，是建立在過去世代為國家奉獻的寶貴生命之上。過去，由於戰爭記憶的影響，對於安全保障及國家定位的思考，常被負面地視為軍國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表現。然而，若要守護這些價值與國家本身，便需有「由日本人親手守護自身國家」的決心與氣魄。為此，日本不應被動地適應國際秩序，而應與各國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積極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實際上，安倍也明確表示，安全保障正是其作為政治家之核心課題之一（安倍晉三，2013：45）。

## 貳、動機

「動機」為「採取特定行動的理由，即驅使其行動的渴望」，並據此探討其行動背後的內在動力與政治目標，進而涵蓋其所追求的國家方向、政策願景與個人政治使命感（Hermann, M. G.,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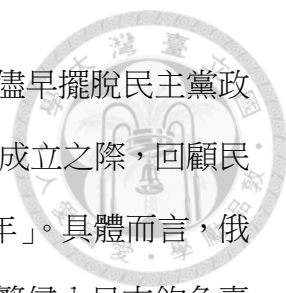
安倍基於「日本人必須親手守護日本」的信念，主張若要在結構上改變國民對安全保障與國家觀的意識，就必須「擺脫戰後體制」。也就是說，他主張「恢復自



太平洋戰爭以來被否定的日本自豪感，向國際社會傳達日本的普世價值，並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安倍在第一任內閣時期便已提出「擺脫戰後體制」的主張；即使在第一次內閣辭職後，自 2009 年起，他仍擔任由跨黨派、具有共同保守信條的國會議員於 2007 年所組成的議員聯盟「創生『日本』」會長，而該組織的活動方針之一，正是明確提出「擺脫戰後體制」(大川千寿，2019：6)。到了 2012 年眾議院大選時，他更強調，「擺脫戰後體制」依然是五年來日本所面臨的最重要課題沒有改變。自民黨當時提出的競選口號「奪回日本」，其背後的含義並非僅是從民主黨政權手中奪回政權，而是「從戰後的歷史中，將日本這個國家重新交還到日本國民手中的戰鬥」(安倍晉三，2013：254)。<sup>33</sup>為了「擺脫戰後體制」，他試圖廢棄內化對美從屬意識的「吉田路線」，並以實現「對等的日美同盟」及解除「和平憲法的制約」為目標(黃洗姬，2021：300-301)。安倍於 2013 年 2 月 22 日，在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題為「Japan is Back」的政策演說，並在開場明確指出：「日本現在與未來都不會成為二級國家」，以及「在亞太地區與印太地區，日本應作為規則的推動者，居於主導性的地位」(日本外務省，2013b)。Christopher Hughes 指出，從安倍此一立場觀之，其目標包括，將日本定位於資本主義強國的第一梯隊，恢復作為國際行為者之自主性，成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夥伴與領導角色，並對抗中國與北韓等敵對的威權主義大國。他進一步強調，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立場與目標，在許多方面與其外祖父岸信介的理念多所重疊(Hughes, C. W., 2015：11)。黃洗姬進一步分析指出，安倍晉三勢必意識到其外祖父岸信介藉由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及其叔父一岸信介之弟一佐藤榮作透過推動沖繩返還而實現對美自主性之歷史成就。此一家族傳承意識，或許也促使安倍在剩餘任期內完成「擺脫戰後體制」目標之強烈決心(黃洗姬，2021：298)。

---

<sup>33</sup> 原文如下：「今回の総選挙で自民党は『日本を、取り戻す。』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掲げています。これは単に民主党政権から日本を取り戻すという意味ではありません。敢えて言うなら、これは戦後の歴史から、日本という国を日本国民の手に取り戻す戦いでもあります。」




此外，被認為促使第二次安倍政權上臺的一大動機，是希望儘早擺脫民主黨政權所帶來的「外交挫敗」困境。安倍晉三在第二次安倍政權即將成立之際，回顧民主黨執政的三年間，曾表示此段時期可謂是「『外交挫敗』的三年」。具體而言，俄羅斯領導人登上北方四島，韓國總統登上竹島；中國公務船則頻繁侵入日本釣魚臺周邊領海。此外，中國政府高層甚至聲稱「釣魚臺屬於核心利益」。安倍指出，此類情況在自民黨執政時期幾乎不可能發生，其原因簡言之，正是民主黨政權損害了日美關係之互信所致。具有象徵意義的例子是，在民主黨政權初上臺之際，首相鳩山由紀夫於中日韓領袖會談中表示：「日本過去過於依賴美國，雖然日美同盟仍具重要性，但作為亞洲的一員，日本希望制定更加重視亞洲的政策」。<sup>34</sup>對此，美國國防部高層批評鳩山未能理解日美同盟的本質，認為此番言論不僅令中國感到高興，也引發輕蔑，並指出中國極可能於民主黨執政期間試圖從日本奪取其所能奪得之利益（安倍晉三，2013：247、248）。以民主黨政權三年執政期間的外交挫敗為背景，安倍試圖扭轉其外交路線，明確展現出絕不屈服於中國改變現狀企圖的強烈意志。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他不僅向國內外宣示日本捍衛主權的決心，也著重於強化對中嚇阻。張勇指出，為了扭轉此類外交挫敗，日本有必要建立三項新的支柱，即強化日美同盟、構築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及推進經濟外交。安倍則將其父安倍晉太郎所倡導的「創造性外交」視為推動該方針之重要原動力之一（Zhang, Y., 2017：40-41）。

綜合而言，安倍晉三以「日本人應親手守護日本」為信念，致力於擺脫戰後體制，期望在此基礎上強化日本於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並作出更大的貢獻。其追求提升日本國際地位、建立與美國之對等關係，以及以領導者之姿捍衛自由與民主秩序的態度，皆可見其與外祖父岸信介之間的連續性。此外，對重視安全保障的安倍而言，民主黨政權時期的「外交挫敗」是嚴峻的挑戰，亦成為他更加堅定重建日美

---

<sup>34</sup> 原文如下：「今まで日本はややもすると米国に依存し過ぎていた。日米同盟は重要だが、アジアの一国としてアジアをもっと重視する政策を作り上げていきたい。」



信任與強化對中嚇阻決心的重要契機。總而言之，安倍晉三的政治動機根植於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與強烈使命感，並體現在以自身信念與行動回應「戰後體制」所遺留結構性課題的姿態之中。正是這種以信念為核心的內在驅力，構成了支撐其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心理基礎。


## 參、決策風格

在本論文中「決策風格」界定為「對決策方式的偏好」，據此探討安倍在決策過程中的思考模式與行動特徵，特別是在其在資訊蒐集與處理、風險評估以及權衡不同政策選項時所展現的特有方式與傾向（Hermann, M. G., 1978：60）。

安倍就自身的外交觀曾如此表示：「外交的基本就是現實主義。若是進行基於意識形態的外交，沒有人會願意跟隨。世界各國其實都是在圍繞如何確保本國利益而進行角力。如果被僵化的思維所束縛，國家最終只會走向衰退」（安倍晉三等，2023：324）。<sup>35</sup>這樣的安倍思想，早在第一任內閣時期便已經有所體現。在對中政策上，安倍無論是在第一次執政前的選舉期間，抑或是就任之後，都始終堅持「在尖閣問題上絕不向中國退讓一步」的立場；關於靖國神社，他也一貫主張自己是出於思想與信念而定期前往參拜。此外，由於安倍被視為「日美同盟優先主義者」，因此在其內閣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認為他將採取「即使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破裂也在所不惜」的方針。然而，第一任安倍內閣上臺後最初訪問的國家卻是中國。安倍指出，過去的日中關係以「友好第一」為原則，也就是說，只要被認為「有損友好」，日本便傾向於即使犧牲自身國益，也要優先維持雙邊關係。他強調，友好應僅是實現國益的手段，若手段本身成為目的，便是本末倒置。因此，安倍主張應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切割開來，並認為日中兩國應在追求各自國益的同時尋求平衡。由於

---

<sup>35</sup> 原文如下：「外交の基本はリアリズムです。イデオロギーに基づく外交をやっても、誰も付いてきてくれません。世界の国々は、いかに国益を確保するかを巡ってつばぜり合いをしているわけでしょう。硬直的な考え方にとらわれていたら、結局、国は衰退しちゃいます。」




日中經濟關係密不可分，即使國益發生衝突，也應在不破壞關係的共識下，透過經濟合作促進政治問題的解決。最終，安倍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達成共識，決定以「戰略互惠關係」作為新型日中關係的基礎（安倍晉三，2013：249-250）。其結果，使得在小泉內閣時期長達五年近乎外交中斷的日中關係，得以大幅改善（松本健一，2013）。

安倍的這一系列言行，可以說體現了他認為外交應當遵循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原則，而非僅依循自身的主義與理念行事。實際上，有許多學者在分析安倍的外交姿態時，都指出其具有現實主義的特徵。例如，被譽為「日本研究專家」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理乍得·J·塞繆爾斯（Richard J. Samuels）便曾評價，安倍首相同時具備「現實主義者」與「保守政治家」這兩種面向（陳育晟，2022）。另外，張勇則分析指出，安倍的外交展現出「在具有國家外溢效應的重大政策議題上，安倍在戰略層面堅守核心立場，在戰術層面則相對務實，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外交政策取向」。

除了被視為現實主義者之外，也有觀點指出，安倍同時是一位重視實利與實際作為的實用主義者。曾於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擔任日本政府駐日內瓦裁軍會議代表部大使的高見澤將林指出：「安倍首相在關鍵時刻展現出令人驚訝的決斷力，徹底貫徹『為了成果而不惜妥協』的實用主義，這或許也是他從第一次內閣失敗中汲取的教訓」（小野寺五典等：2022）。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級研究員約翰·尼爾森-賴特（John Nilsson-Wright）也指出，安倍在外交上，無論是安全保障政策還是經濟政策，都始終貫徹了典型的實用主義立場。他一方面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另一方面則不拘泥於對方是否為民主國家或威權政權，而是以務實態度推動與各地區及全球行為者建立新的夥伴關係（Nilsson-Wright, J., 2020）。

此外，郭育仁進一步分析了安倍決策風格的具體特徵，指出安倍的外交以兩項主要原則為基礎，即「先內而外」與「先易後難」。舉例來說，安倍在其執政初期



積極推動「安倍經濟學」中的「三箭政策」，並在 2013 年 7 月的參議院改選中獲勝為基礎後，全面推進國防改革與外交戰略。至於「先易後難」，其具體作法是，安倍政府首先對親日國家推動三大主軸（戰略、經濟、能源）的「地球儀外交」，藉此打造有利於日本的國際環境；在此基礎上，再逐步推進與中國、韓國等關係較為複雜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改善（郭育仁，2014：45-46）。李易璵也指出，第二次安倍內閣的特點為「積極、務實、有計劃性」（李易璵，2016：149）。由此可見，安倍在政策運作上展現出極為現實且具計算性的判斷，重視政策的實效性，並傾向於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而靈活調整戰略，採取以目的合理性為導向的外交方針。

另一方面，也有觀點指出，安倍在戰略層面上傾向於堅持核心立場，同時具備貫徹信念的固執性格。這種性格似乎自幼便已顯現。安倍的養育者久保梅回憶道，晉三小時候曾與父親晉太郎爭執，始終不肯讓步，甚至讓晉太郎直言「你真頑強！」。她因此認為，若他成為政治家，必定會展現出不逃避自己想做之事，對於不認同或認為不對的事情絕不妥協的特質（野上忠興，2015：46）。安倍的前家庭教師、同時也是自民黨眾議員的平澤勝榮回憶說，安倍雖然是個非常乖巧的孩子，但對自己說過的話絕不退讓，對自身的想法十分執著，凡是有一點無法認同的地方，便會直接提出質疑（野上忠興，2015：49）。安倍的母親洋子也指出，安倍晉三一旦決定了某件事，就很少聽取他人的意見，性格相當固執（安倍洋子，2022：16）。

除了這種與生俱來的性格外，安倍本人似乎也非常重視「不背離信念」，他多次提及自己尊敬的幾位人物，以此闡述自身的志向。安倍提及其故鄉長州所孕育的傑出人物吉田松陰，引用了他常愛引用的孟子名言：「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並說明此語意指「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只要確信自己沒有錯誤，就應堅定不移地向前邁進」。此外，他還將英國政治家邱吉爾視為最具決斷力的領導者，十分敬佩其在歷經多次挫折後仍不屈服，能以遠見為依據作出決策，並最終帶領國家走向勝利。安倍表示，他之所以立志從政，是「為了建立我所嚮往的國家」。他強調，政治家的核心在於「能否將想實現的政策付諸行動」，因此必須懷抱堅定的信念，並在信

念支撐下無所畏懼，即使面對批評也要勇於迎接挑戰（安倍晉三，2013：44-45）。基於這樣的背景，安倍將自己定位為「奮戰的政治家」，並表示希望成為那種「在關鍵時刻，若是為了國家與國民，即使面對批評也毫不畏懼地採取行動」的政治人物（安倍晉三，2020：7-8）。<sup>36</sup>

另外，張勇分析了安倍的領導風格，指出他是一位改革型且目標導向的領導人，展現出積極進取的領導特質。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指出，領導者可依「其對職務的投入程度與是否從中獲得滿足感」（*job commitment an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sidency*），分為四種類型。根據此分類，安倍晉三被視為「積極正向型領導人」（*active positive type of leader*），他相信透過努力工作不僅能改變政策方向，甚至能左右國家與個人的命運。他展現出強烈的目標導向思維，善於將戰略目標分解並逐步推進。第二次執政以後，他逐漸從領導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展現更大的自信心。在政權穩定與高民意支持的基礎上，他打破了小泉政權以降首相更迭頻繁的局面，建立起長期政權（Zhang, Y., 2017：20-21）。由此可見，安倍亦具備理想主義的一面，而這種由信念驅動的理想主義，正是促使他在政策推動上展現強烈目標導向與行動力的原動力。

由此可見，安倍同時具備現實主義與堅守信念的理想主義兩種面向，而張勇則指出，這樣的特質與其家庭環境密切相關。安倍晉三自幼成長於政治世家，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有意識地培養；隨著社會經驗的累積，他逐漸兼具了外祖父岸信介般的強硬性格——亦即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式的特質——以及父親安倍晉太郎所展現的內斂務實的特質，後者體現出極為現實主義的性格傾向（Zhang, Y., 2017：9、25）。吾人認為，這種雙重性格並非單純的矛盾，而是安倍政治風格中極具特色的平衡點。一方面，他繼承了岸信介的堅定與理想性，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展現出維護國家主權與價值的強烈信念；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安倍晉太郎的務實與審慎，懂得在複

<sup>36</sup> 原文如下：「『闘う政治家』とは、ここ一番、国家のため、国民のためとあれば、批判を恐れず行動する政治家のことである。」

雜的國際環境中以現實主義手法調整策略。因此，安倍的外交風格可被視為「以理想為目標、以現實為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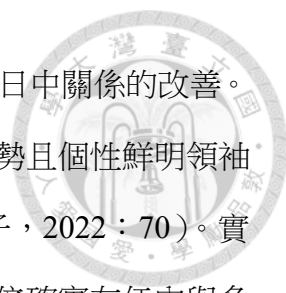


## 肆、人際風格

而「人際互動風格」則為「與其他政策決策者互動時所偏好的溝通方式」，主要出現在其與他人互動的特質與模式，如建立信任關係的方式、對建議與意見的態度，以及運用人脈與組織資源的取向（Hermann, M. G., 1978: 60）。

作為安倍的人際關係風格，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徵之一，便是他擅長由首相親自與他國領袖進行直接交涉與對話的「元首外交」或「個人外交」。曾在安倍政權時期擔任防衛大臣的小野寺五典指出，安倍外交風格的一大特徵在於「個人外交」，他與各國領袖建立了多層次的個人信任關係。小野寺表示，促成此類首腦外交的關鍵，在於安倍具備的人格魅力與對人際互動的重視。他並非僅將外交視為與國家元首的正式會談，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具體而言，小野寺回憶道，安倍分享的內容多為他親自接觸、直接感受到的第一手經驗，例如「某國首相的個性如何、發生過哪些趣事、談話中透露出哪些想法」等，這些細節讓人深刻感受到他在外交上對人際理解的重視。另外，曾在安倍政權時期擔任日本政府駐日內瓦裁軍會議代表部大使的高見澤將林也指出，安倍首相在與各國領袖會談時，總能針對對方關心的議題展開對話；他善於傾聽，並能引出對方的想法，而在被詢問意見時，會就對方感興趣的主題清楚表達自己的看法，展現出極高的對話能力。此外，小野寺與高見澤皆指出，安倍此種特質不僅體現在一對一的雙邊會談中，在 G7、G8 等多邊場合亦發揮得淋漓盡致，擅長扮演協調與統合的角色（小野寺五典等，2022）。

平川亦指出，安倍主動走向對方的「元首外交」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舉出多個與各國領袖建立關係的具體例子。例如在美國方面，安倍在川普當選後不久便率先前往拜會這位飽受爭議的新總統，成功贏得其信任，並透過兩人共同的興趣——高爾夫——培養出私交，甚至成為在外交議題上能提供建議的存在。此外，對於在中國



成為獨裁者的習近平，安倍也始終保持尊重，以靈活的方式推動日中關係的改善。同樣地，面對俄羅斯總統普丁，安倍亦展現出能巧妙走入這類強勢且個性鮮明領袖內心的膽識與手腕，成功建立起個人層面的互信關係（平川幸子，2022：70）。實際上，安倍晉三逝世後，各國領袖紛紛發表追悼訊息，這顯示安倍確實在任內與多國領袖建立了深厚的個人信任關係。即便是中國與俄羅斯，也對安倍在推動雙邊關係發展方面的貢獻表達了肯定與讚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安倍在擔任首相期間，為促進中日關係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貢獻。俄羅斯總統普丁亦曾讚揚安倍晉三是「在推動俄羅斯與日本睦鄰關係方面成就卓著的傑出政治家」，並表示：「我與晉三長期保持定期聯繫，他始終展現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與專業素養」(Marsh, J., 2022)。根據結構層面的分析，安倍從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外相的秘書官經驗中，深刻體會到「政治人物之間的信任關係」在強化同盟國互信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認為這段經驗為他奠定了作為政治家的核心信念與不動搖的軸心。可以說，這段秘書官時期的經歷，對安倍的人際互動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平川幸子指出，支撐安倍「元首外交」的特質之一，在於他「個性比較坦率，能夠自然地表達情感，即使身處重大國際舞臺亦毫不畏懼」(平川幸子，2022：70)。

<sup>37</sup>安倍認為「無論地位或年齡，都應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正確的想法應立即採納」。他表示，這樣的價值觀源自於他在美國長期留學期間所受到的個人主義思想影響（安倍晉三，2013：34；Zhang, Y., 2017：24）。

安倍擅長主導「元首外交」，親自走入各國領袖的核心圈以建立關係。然而，平川幸子也指出，安倍同時擅於運用多元的政治行動者。他透過設立「內閣人事局」實現了所謂的「官邸官僚」體制，亦即由各府省派駐至首相官邸的官僚，或自原屬省廳退官後在官邸擔任幹部職務的官僚出身者等，這些作為首相親信直接參與政策形成與執行的職員，皆被安倍充分加以運用。平川指出，這些「官邸官僚」在對

---


<sup>37</sup> 原文如下：「安倍は自分の感情をわりと素直に出す性格であり、大きな国際舞臺でも物おじすることがない。」



中關係中扮演傳達首相意向的角色，而在對東協（ASEAN）外交上，則積極行動以奪回基礎設施開發的主導權，使日本重新取得主導地位（平川幸子，2022：90）。從中可以看出，安倍透過國內制度的改革，營造出能將自身特質反映於政策運作的環境，而這也進一步形塑了他的人際互動與外交風格。

在人事任用方面，張勇進一步指出，在人事任用上，安倍政權在核心人際關係中仍展現出強烈的派閥主義色彩，傾向於任用親屬或友人等親近之人。實際上，安倍就任首相後，特別是在第一次政權期間，許多舊識被任命為政府要職，甚至擔任內閣大臣，因此安倍內閣也被稱為「朋友內閣」（Zhang, Y., 2017：1、24）。然而，面對「朋友內閣」的批評，安倍表示，雖然像鹽崎恭久與根本匠確實是自己的朋友，但松岡利勝、久間章生、柳澤伯夫及伊吹文明等人並非如此。換言之，這只是被冠上名稱後的標籤化而已。他進一步指出，歷屆內閣首相將知己任命為內閣官房長官的情況並不罕見，例如大平正芳也曾任用摯友伊東正義擔任官房長官。安倍強調，關鍵並不在於對方是否是「朋友」，而在於這位朋友是好是壞，這才是最重要的（安倍晋三等，2023：85-86）。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期間，安倍雖同樣大量啟用持有相同方針或屬於自己人脈圈的人士，不過，邁克·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或許是汲取了過去的教訓，安倍在第二任的時候不再僅以親信與理念相近者組成班底，同時也任用具有豐富經驗與影響力的官僚與政治人物擔任關鍵職位，這種平衡的人事布局也成為日本版 NSC 得以順利運作並發揮實效的重要支撐力量（Green, M. J., 2022：198）。平川幸子則是指出，在對臺關係方面，安倍善於運用身邊的親信及黨內的親臺派勢力，透過既有的網絡，在蔡英文政府執政期間仍成功推動了臺日關係的深化。他所重用的多位政治人物，包括他本人在內，皆出身於長期負責維繫自民黨與臺灣關係的自民黨青年局。另外，安倍的母親洋子擔任臺日民間團體「櫻花返鄉會」的日本名譽會長，蔡英文就任總統時，她曾訪問臺灣，並與蔡英文一同觀賞演出。其弟岸信夫則在蔡英文訪日時隨行接待（平川幸子，2022：82-83、90）。

最後，就安倍對待他人建議的態度而言，張勇指出，在某些特定議題上，安倍




展現出願意接受意見與建議的姿態。例如，對安倍極為敬重並深受其影響的岡崎久彥曾建議，安倍所倡導的「擺脫戰後體制」可分為「歷史問題」與「安全保障」兩大支柱，但若兩者同時推進，將面臨過度的反彈，甚至可能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因此應優先處理能帶來直接利益的部分。從安倍之後三年的政策行動觀察，可見他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了岡崎的建議，將安全保障置於歷史問題之上(Zhang, Y., 2017: 24、27-28)。張勇指出，安倍對於以支持基盤為核心的人際關係特別敏感，而這種處世之道也可視為他在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秘書期間所習得的經驗。透過多年的秘書歷練，安倍深刻理解人際關係在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堅持自身信念的同時，亦致力於與周圍保持良好互動，以鞏固並擴大其支持基盤(Zhang, Y., 2017: 24)。

總結而言，安倍擅長「個人外交」，並從擔任父親秘書的經驗中體認到，與各國政治領袖建立個人層面的信任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他也善於靈活運用多元的政治行動者，以推動自身理念與政策，並傾向任用同一派閥的人才或親近人士擔任要職。此外，只要不涉及其核心信念，安倍通常能夠靈活傾聽他人建議，並重視與周圍保持良好的關係。

##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作為理解安倍晉三政治特質的前提，先分析影響其特質形成的結構層面——亦即家庭環境、教育與社會環境，以及早期政治經驗。此三個層面皆作為形塑安倍世界觀與政治意識的基礎條件而發揮關鍵作用。

首先，在家庭環境方面，安倍深受外祖父岸信介的影響。岸信介是一位以反共主義與追求自主獨立為核心理念、並致力於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的政治家。安倍自幼近距離接觸並觀察其思想與行動風格而成長。此種家庭內部的「價值傳承結構」，成為促使其自少年時期便萌生政治關懷與使命感的重要因素。在教育階段的社會



環境中，正值安保鬥爭與學生運動高漲的年代，社會上瀰漫著批判岸內閣的輿論氛圍。安倍在如此強烈的反保守思潮中成長，深刻體驗到家庭所灌輸的價值觀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鮮明對比與張力。可以說，這種矛盾構成了一種逆境環境，對其日後政治信念的鍛鍊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外相秘書官的經驗，成為安倍直接學習外交實務與培養國際政治現場感的重要契機。特別是，他在此期間深刻體認到國際關係中「信任建構」與「戰略性談判」的重要性，並透過與岡崎久彥、中西輝政等保守思想家的交流，奠定了其現實主義外交觀與國家觀的理論基礎。

總的而言，這三個層面的結構性背景，構成了安倍日後政策判斷與政治理念的出發點，並可謂形成了理解其個人特質所不可或缺的社會與經驗基礎。

與此同時，安倍晉三所展現的「信念」、「動機」、「決策風格」與「人際風格」等個人特質，亦在上述結構基礎之上發展而成，並相互作用，形塑其外交姿態與對外政策，進而影響其對臺政策的思維與行動模式。

在「信念」層面，安倍以「開放的保守主義」為核心，重視自由、民主、基本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同時也堅信，這些價值以及國家本身，應由日本人民親手加以守護。對他而言，真正的和平與繁榮並非依賴於經濟的富足，而是唯有國民懷抱自豪與責任共同支撐國家，方能實現。這種信念構成了其後 FOIP 構想及「價值觀外交」的理念基礎。其次，在「動機」層面，安倍將「擺脫戰後體制」視為日本再生的象徵，強烈追求從被動的戰後外交轉向主動的外交方針。他在意識到外祖父岸信介「自主路線」的同時，主張日本不應僅作為美國的從屬同盟國，而應成為維護國際秩序的積極行動者。此外，對民主黨執政時期所出現的「外交挫敗」的反感，亦激發了安倍強烈的危機意識與行動動力。由此可見，安倍的外交展現出一個明確方向，即「讓日本重新站上國際社會的中心舞臺」。在「決策風格」層面，可以說安倍同時兼具現實主義、實務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特質。他重視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為了達成政策成果不惜進行務實的妥協，並注重政策的階段性與計畫性推進；但在涉及國家根本信念的問題上，則展現出即使面臨批評也絕不退讓的堅定態度。這種

在「戰略層面上堅定」與「戰術層面上靈活」的雙重特質，正是支撐其政治穩定性與政策執行力的關鍵所在。

最後，在「人際風格」層面，安倍擅長透過領袖之間直接對話建立互信，展現出高超的「個人外交」能力。他能根據對方的關切與文化背景靈活應對，並善於將信任關係轉化為外交影響力。此外，他善於動員官邸官僚、黨內網絡及親族等多元人脈，任用與自己理念相近的人士擔任要職，藉此形成政策推行上的整合力。可以說，安倍的人際風格不僅體現在外交實踐上，更反映出他將「信任」視為政治資源的戰略思維。透過個人層面的互動與制度化的人脈運用，安倍得以將情感連結轉化為政治與外交上的持續影響力。

關於安倍所展現的這些個人特質，其母安倍洋子曾指出：「安倍晉三在政策上像外祖父，在政局上像父親」（安倍洋子，2022：16）。此一觀點亦為許多觀察者所認同。可以認為，安倍在保守主義等信念層面深受外祖父岸信介的影響，而在政局上的應對與處事方式，則更多承襲了父親安倍晉太郎的特質。

## 第五章 影響安倍決策的媒介要因




源自上述結構層面的安倍個人特質，透過若干媒介要因影響其實際外交政策的形成，這些媒介要因包括：安倍對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認知、其在外交相關領域的訓練與經驗程度，以及他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敏感度。理論上，當決策者對外交具有高度關注時，其個人特質的影響力將更為顯著。此外，若其具備豐富的外交相關訓練與經驗，且對外部環境變化具有高度敏感度，則更有可能將自身的特質具體化，並轉化為可執行且符合情勢的政策。因此，本章將檢視安倍對外交的關注程度、其外交相關經驗的豐富性，以及對環境變化的敏感度，旨在深化對安倍個人特質如何影響對臺政策形成之理解。

### 第一節 對外交的關注程度

決策者對外交的關注程度，指的是該決策者對外交政策「投入多少注意力」以及「認為其重要性的程度」。總體來說，安倍對外交的關注程度極高。雖然他在執政期間將推動憲法修正作為主要目標之一，但在 2012 年的調查中，他表示自己比起「憲法」，更熟悉的領域是「外交與安全保障」（大川千寿，2019：13）。此外，安倍在其著作《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中指出，作為政治家，他的核心主題在於「安全保障（與社會保障）」（安倍晋三，2013：45）。結合安倍對戰後日本安全保障觀所抱持的問題意識，以及他堅信「日本應由日本人親手守護」的信念來看，展示出他對安全保障與外交的高度關注。此外，擔任父親安倍晋太郎外相秘書官的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對外交事務的興趣與重視。

在「動機」一章中曾提到，安倍在第二次執政之初，特別重視儘早擺脫民主黨時期的「外交挫敗」。邁克·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正是這種態度，成為安倍得以重返自民黨總裁位置的原因之一。安倍於 2009 年在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演講時指出，日本有必要進一步投資於「擁有悠久歷



史、以共同價值相連結的日美同盟」。他強調，特別是在「我國這位偉大的鄰國——中國——於成長過程中正經歷如此不穩定的轉變時期」，更應加強這一關係。此外，安倍在 2010 年於華盛頓的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說時，批評中國正企圖擴張其「生存空間」（Lebensraum），並警告稱中國的目標是讓日本與韓國「芬蘭化」。正是安倍對中國在安全保障領域所構成威脅的強烈警示，以及他誓言恢復日美同盟的立場，引起了自民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共鳴，而正是這股保守派力量促使安倍得以重返自民黨總裁之位（Green, M. J., 2022: 55）。

第二次安倍內閣在誕生後，提出了以「地球儀俯瞰外交」及「積極和平主義」為核心的外交方針，展開積極且具戰略性的外交行動。同時，為了建立能由首相親自掌握外交主導權的體制，安倍在第二次政權初期便推動了多項安全保障政策體系改革，包括設立 NSC、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以及設立「內閣人事局」等措施。

綜上所述，可以明確看出安倍晉三對外交懷有極高的關注與重視。無論是在其自身的發言、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的立場，還是重返政權後的各項行動中，都清楚體現出他以外交為核心的施政姿態。因此，可以認為安倍的個人特質對日本政策決策所產生的影響力更為顯著。此外，這種重視外交的姿態，也與他曾擔任外相安倍晉太郎秘書官的經歷，以及其強化日本安全保障的信念與動機相互契合。

## 第二節 與外交相關的訓練或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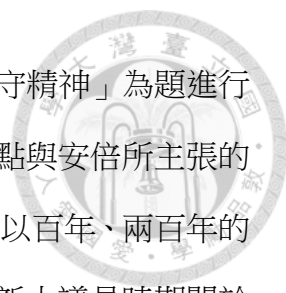
所謂與外交相關的訓練與經驗，指的是安倍自成為政治家以來，如何處理外交事務，以及在此過程中累積了哪些外交經驗。在這部分本文將此與其早期影響個人特質的政治經驗區分開來，重點探討自 1993 年首次當選以後的外交歷程。之所以做此區分，是因為早期政治經驗主要形塑安倍的基本信念、價值觀與政治取向等個人特質本身；相較之下，作為政治家實際處理外交事務的歷程，則更能顯現這些個



人特質如何在政策決定中被反映、轉化與運用，並在實際外交操作中進一步受到強化。因此，本節特別聚焦於安倍從 1993 年起累積的外交實務經驗，以分析其個人特質與外交行動之間的互動關係。

自從當選國會議員以來，安倍最傾注心力的事務之一，便是營救遭北韓綁架的日本人。1988 年，安倍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的秘書官期間，遭北韓綁架的日本人有本惠子的父母前往拜訪安倍晉太郎的辦公室，從那時起，安倍晉三開始正視綁架問題。安倍表示，促使他全力推動解決綁架問題的最大原因，是「日本的主權遭到侵犯，以及日本國民的人生被奪走的這一事實，其嚴重性不容忽視」。即使在首次當選為國會議員之後，他仍持續致力於這項議題。2002 年 9 月，小泉純一郎首相訪問北韓，舉行日朝首腦會談，北韓首次正式承認綁架日本人，並讓 5 名受害者暫時返國。雖然一開始曾有協議要將他們送回北韓，但安倍堅決主張「不應讓這 5 人返回北韓」，最終政府也決定讓受害者永久留在日本（安倍晉三，2013：48-59）。當媒體與政界傾向順應北韓的要求時，安倍以強硬態度主張「不應讓已返國的五名被綁架者回到北韓！」。他這種「毫不妥協的應對」獲得了國民的高度讚譽。野上忠興指出，這次經驗成為安倍的 success 體驗，不僅進一步提升了他對安全保障議題的關注，也成為他確立在安全保障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的重要契機（野上忠興，2015：219-220）。

此外，安倍在當選國會議員後，開始積極閱讀有關憲法、安全保障與保守主義的書籍。成為國會議員第一年的安倍，隸屬於自民黨的外交部會以及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雖然曾擔任外務大臣父親的秘書官長達三年八個月，使他對外交領域相當熟悉，這點毋庸置疑；然而，一旦成為外交委員會的成員，就必須在國會中進行質詢與發言，因此仍需要進一步加強學習。在此期間，安倍閱讀了被譽為保守派論客的西部邁的著作，如《邁向幻象的保守》（幻像の保守へ）《我的憲法論》（私の憲法論）《批判的精神》（批判する精神）等，據說這些作品對他思考「何謂保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安倍在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期間成立了「黨基本理念委員



會」，並邀請西部邁擔任講師，後者以「自由民主黨應守護的保守精神」為題進行演講。西部將「保守」定義為「維護歷史、習慣與傳統」，這一點與安倍所主張的「保守是一種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皆負有責任的態度，是一種能以百年、兩百年的尺度來思考萬事的政治理念」相互契合。野上忠興指出，安倍在新人議員時期關於憲法、安全保障與保守主義的學習與經驗，構成了「鷹派安倍」的思想基礎（野上忠興，2015：148-150）。此外，即便在第一次安倍內閣辭職之後，安倍仍持續研習與安全保障及保守主義相關的議題。例如，他參加了由安全保障問題專家岡崎久彥以及東海旅客鐵道（JR 東海）社長、保守派經濟界領袖葛西敬之等人共同舉辦的非公開學習會，在會中深化了對日本戰略環境及集體自衛權相關歷史辯論的理解。這些經驗亦影響了他重視日美關係建構的外交取向（Green, M. J., 2022：91）。

此外，作為安倍對中國認知以及對美傳達「外交經驗」的象徵性案例，可舉 2005 年訪美一事。當時正值日中關係惡化之際，安倍晉三以自民黨幹事長代行身分訪問美國，並在會談中針對中國境內爆發的反日示威以及日中關係現狀，向美方作出說明。安倍向美方表示，小泉內閣希望設法改善日中關係，同時強調日本已多次就過去的歷史錯誤表達道歉。他進一步說明，反日示威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反日愛國教育，以及導致此現象的結構性問題。當時美方的反應相當坦率，表示「這樣的說法是第一次聽到，而且說得非常清楚易懂」。看到這樣的反應後，安倍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日本在戰後是否曾經向歐美、乃至向世界，妥善說明過自身民主主義的歷程（安倍晉三，2013：153-154）。這段經驗使安倍體會到，主動向國際社會說明日本立場的重要性，並進一步形塑其積極發信的外交風格。

至於安倍與臺灣關係的具體發展上：首先，安倍在 1993 年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後，隸屬於清和政策研究會，該派系繼承自以親臺立場聞名的福田赳夫系統，而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也曾擔任該派系的會長。該派系傳統上是自民黨內反共傾向最為強烈的派閥，即使在與臺灣斷交之後，仍與臺灣保持著深厚的關係。安倍也可說是在這樣的親臺環境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生涯（平川幸子，2022：83）。另


外，自民黨內設有由 45 歲以下年輕議員組成的組織——「自民黨青年局」。1967 年，臺灣國防部長蔣經國訪日時，時任青年局長的海部俊樹與青年部長小淵惠三共同與蔣經國會談，雙方達成共識，將兩國之間的聯絡窗口分別定為自由民主黨青年局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其後，隨著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臺灣與日本的正式外交關係雖中斷，但自民黨方面的聯繫管道仍持續延續。基於此一背景，青年局遂成為自民黨內唯一負責對臺聯絡的窗口機構（時事ドットコム，2022）。1994 年，安倍於首次當選後的翌年，以自民黨青年局次長的身分訪問臺灣，並與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會面。關於當時的印象，安倍回憶道：「第一次聽李總統談話時，我深受震撼。他以強烈的信念與意志思考著如何守護超過兩千萬臺灣人民的安全，這深深觸動了我的心。李總統是一位充滿人格魅力的人，彷彿擁有一種能吸引他人的磁場」（安倍晋三等，2023：205）。<sup>38</sup>

由於安倍在當選後不久便訪問臺灣，因此強調其重視臺灣的分析相當多見。例如，陳育晟指出：「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崛起，同時帶給日本安全上的威脅和經濟上的誘因，安倍自 1993 年首度當選國會議員以來，並未隨著象徵進步、經濟利益的親中派起舞。重視地緣政治、現實主義下權力消長的安倍，反倒看見中國不斷擴張的野心，始終是旗幟鮮明的挺臺派」（陳育晟，2022）。安倍曾表示：「自從當選日本國會議員以來，我就一直認為有必要強化日本與臺灣的關係。」對此，Eleanor Shiori Hughes 與 Riley Walters 指出，雖然安倍在數年前才正式提出其「印太願景」，但他對臺灣的關注並非新近之事。自 1993 年成為國會議員以來，他已持續 28 年致力於深化臺日關係，使雙方關係更加穩固（Hughes, E. S. and Riley, W., 2022）。1994 年安倍訪臺並與李登輝會面時，李總統向他表達了希望出席翌月在日本舉辦、

---

<sup>38</sup> 原文如下：「初めて李總統の話聞いた時、私は圧倒されました。2000 万人を超える臺灣の民をいかに守り抜くか、その強い信念と意志に、心を揺さぶられたのです。李總統は、人間的な魅力にあふれる人。人を惹きつける磁場のような人です。」




由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主辦的廣島亞運會的意願。安倍表示，日本作為主辦國「有接待的義務」，因此歡迎李登輝訪日，並在立法院舉行的座談會上呼籲應歡迎李登輝訪日。然而，最終由於中國的阻撓，日本政府拒絕向李登輝發放簽證（丹羽文生，2018：151-152）。平川幸子指出，這一事件成為安倍感到痛苦的原初經驗，促使他此後更加重視並投入於臺日關係的推進（平川幸子，2022：84）。

此外，至 1996 年，安倍出任自民黨青年局局長。關於擔任青年局長一職的重要性，平川幸子指出：當青年局長訪問臺灣時，會晤的對象往往是總統或行政院長等最高層級領袖。在此過程中，不僅可能受託傳達具有外交意涵的重要訊息，亦因涉及對中關係，青年局長自然會在應對兩岸議題時培養出敏銳的外交感覺（平川幸子，2022：83-84）。青年局長的經歷對安倍在處理日中臺關係時所展現的外交敏銳度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難想見。

關於李登輝未能訪日一事，後來在其卸任總統後的 2001 年，在森喜朗政權時期終於實現了李登輝訪日。當時，正是擔任內閣官房副長官的安倍晉三向森首相建議，應將此舉視為「森政權的成果」，並促成對李登輝的簽證核發（丹羽文生，2018：152）。此後，李登輝多次訪日，並與安倍晉三逐漸深化彼此之間的關係。廖克杭指出，安倍曾讚賞李登輝引領臺灣走向民主化，並克服第三次臺海危機等艱難挑戰。同時，李登輝也曾強烈建議安倍修正自 1947 年施行以來從未改動過、已顯過時的日本憲法。在此基礎上，廖克杭進一步指出，安倍晉三將李登輝視為其政治導師，而李登輝的存在亦促使安倍形成「使日本恢復正常國家地位」以及「找回日本」等政治目標（Liao, K., 2022）。

而當安倍在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內閣辭職後，至再次上任前經歷了約五年的潛伏期。其間，他擔任致力於推動對臺友好與親善交流的「東亞親善協會」會長，並兩度訪問臺灣。2010 年 10 月，值此臺北松山機場與東京羽田機場之間的定期航班啟航之際，安倍搭乘首班直航班機訪問臺灣，並先後與馬英九總統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會談。訪臺期間，他亦受邀前往李登輝的寓所，雙方就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及《奧



之細道》等「日本的重要文化」進行了交流與討論。2011年9月，安倍偕同後來成為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一同訪臺，並以「特別來賓」身分出席由臺灣安保協會在臺北國賓大飯店舉辦的以「亞太地區安全與臺海和平」為主題的研討會。安倍在開場致詞中表示，他有一種「彷彿回到故鄉的感覺」，並說「除了祖國日本之外，能讓我由衷產生這樣情感的地方，唯有臺灣」。他甚至坦言自己「熱愛臺灣」，引起現場熱烈回響。<sup>39</sup>此外，2011年12月，為悼念於同年11月逝世的臺灣獨立運動人士黃昭堂，東京舉行了「黃昭堂先生追思會」。安倍在致悼詞時表示：「作為黃先生的朋友、也是作為臺灣的朋友，我在此誓言，今後將全力以赴，使臺灣人民不再成為世界的孤兒，而能在國際社會中正當地贏得自身的權利。」他並讚揚黃昭堂一生致力於「讓臺灣成為獲得國際承認的正常獨立國家」的理想（丹羽文生，2018：153-154）。這一連長期以來與臺灣互動並致力於關係建構的言行，明顯展現出安倍對臺灣的高度重視。

綜上所述，安倍透過致力於解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以及向美方說明中國反日示威成因等經驗，進一步強化了其對安全保障議題的關注，同時也養成了積極主動對外發表自身見解的外交風格。可以認為，安倍在當選初期針對安全保障與保守思想所進行的學習，也進一步鞏固了他此類價值觀。此外，從安倍自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以來，乃至第一次內閣辭職之後，始終如一地重視臺灣並致力於強化雙邊關係的態度，可從其所建立的人脈網絡與歷任職務中清楚看出。可以認為，這些長期以來與臺灣的交流經驗，促進了安倍在中臺關係方面的外交敏銳度與人脈網絡的形成，並對其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期間的政策推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

<sup>39</sup> 原文如下：「安倍はキーノートスピーチの冒頭で『まるで故郷に帰ってきた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る』と語り、続けて『祖国である日本以外で心の底から、そう感じることでできる場所は臺灣をおいて他にはない』とし『熱愛』しているとまで言い切り会場を沸かせ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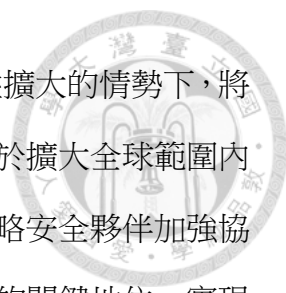
### 第三節 對環境的敏感度



所謂對環境的敏感度，指的是決策者對外部情勢的認知與應對能力，也就是能否迅速察覺國際與區域環境的變化，並將其反映於政策中的敏銳性。總結而言，可以認為安倍對環境變化具有高度的敏感度。本文將主要透過觀察其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期間所推動的對美、中國及印太戰略等非臺灣相關政策，來說明其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敏銳性。


首先，顯示安倍對環境變化具有高度敏感度的案例之一，是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初期即著手推動的日美關係強化。擔任安倍首相演講稿撰寫人兼智囊的谷口智彥指出，安倍認為，透過讓美國「更容易維持其在日本的存在」，並在國際外交與區域危機發生時能夠依賴日美同盟，他有責任確保美國持續參與印太地區事務。安倍並未因日美同盟的存在而自滿或被動依賴，他深知，若日本政府要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中國的行為方式，首先必須主動影響並引導美國政府的政策選項。事實上，安倍於 2013 年 2 月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首次會談時，提出了一份大膽的議程，其中包括檢討 1997 年版《防衛指針》、修正日美軍事力量之間的角色與任務分工，並同時宣示日本已準備好加入由美國主導的 TPP，此舉令白宮深感震驚。此外，安倍與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承諾，將推動在民主黨執政期間陷入停滯的普天間基地問題取得進展（Green, M. J., 2022：91-92）。鳩山內閣曾在處理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時承諾，將尋找沖繩縣以外的遷移地點，但最終未能實現；而與早已決定將基地遷至名護市的美方之間的談判，也未取得任何進展（NHK，2010）。

安倍在第二次內閣成立後不久，即明確表達與民主黨政權劃清界線的立場，同時積極展現出解決妨礙日美同盟之問題的決心。在此基礎上，安倍隨後積極配合歐巴馬總統於亞洲推行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當時，美國正因伊拉克戰爭的結束與自阿富汗開始撤軍，而逐步從中東地區撤出軍事力量，並推動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的方針（閔野博，2017：34）。這一方針顯示，美國自 2010 年以後，



特別是在以南海問題為背景、區域內對中國進行制衡的動向日益擴大的情勢下，將在其中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高橋杉雄，2012）。安倍晉三致力於擴大全球範圍內的日美同盟，並與韓國、澳大利亞及印度等亞太地區中美國的戰略安全夥伴加強協作，同時透過維持日本在美國「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中的關鍵地位，實現「戰後國家」的重建目標。2015年4月，安倍晉三在華盛頓與歐巴馬總統舉行首腦會談，雙方發表了三項共同聲明。他們在聲明中詳細說明了日美夥伴關係轉型的意義，並承諾構築能夠共同因應全球性課題的夥伴關係，將日美同盟從區域層次提升為「面向全球的同盟」（日本外務省，2015a；何思慎、楊雯婷，2020：83、91）。由此可見，安倍晉三在第二次內閣成立後迅速著手強化日美同盟，並對歐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轉向做出敏銳回應，積極展開合作。


之後至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意外勝出，震驚全球。自競選期間至當選後，川普一再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並對日本承擔駐日美軍經費表達不滿，甚至提及可能撤回駐日美軍，使日美同盟關係一度籠罩在不確定與不安之中（渡部恒雄，2017）。此外，專家間亦出現憂慮，認為身為商人的川普可能在與中國的談判中，將臺灣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甚至可能放棄美國長期以來對臺安全承諾，出現所謂的「棄臺論」（石原忠浩，2017a：29）。為了應對日美同盟的不安並推動其強化，安倍晉三在美國大選結束兩天後即致電川普表示祝賀，並藉此機會促成於紐約舉行會談。這場會談於選後第九天、即11月17日實現，其實現速度之快——尚不足選後十日——可謂極為罕見。由於此次為非正式會談，具體內容並未公開。然而，安倍首相表示雙方「坦誠地敞開胸懷進行了交流」，一般認為他在會中闡述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及強化之必要性，並說明TPP對美國所帶來的利益等議題（美根慶樹，2016）。此後，安倍多次利用首腦會談及高爾夫等非正式場合，向川普總統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並說明中國相關問題，同時要求美方對北韓採取堅定立場。此外，為了保留未來美國重返TPP的可能性，安倍亦迅速推動並達成了日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Green, M. J., 2022：



101)。在此次美國總統選舉中，日本外務省原本預期由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當選，川普的勝選則是出乎意料的結果（佐藤優，2016）。誠然針對此次會談，日本國內出現許多審慎的聲音。由於川普在總統選舉期間多次發表激進言論，其未來動向難以預測，因此首相是否應與其會面一事，引發了討論。然而，安倍首相認為，兩國領袖之間有必要及早建立互信，因此決定主動向川普方面提議舉行會談（日本經濟新聞，2016）。這一連串由安倍主導的決策與對美關係的建立，充分體現出他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高度敏銳性。

2017年1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 TPP，但安倍仍以推動「無美版 TPP」（TPP11）的成立為目標，積極扮演協調與推進的角色。自5月起的部長級會議之後，安倍主持了三次高級官員層級會議，主導談判進程。最終於同年11月在越南峴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中達成大致共識，並於2018年3月在智利聖地亞哥，由11個成員國正式簽署 TPP 協定文本（信田智人，2018：75-76）。日本之所以積極擔任 TPP 的推動角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藉由掌握 TPP 的主導權，日本希望在亞太地區貿易規則的制定過程中，取得更大的影響力與話語權（人民網，2017）。事實上，日本並非一味追隨美國，而是展開了具有自主性的外交，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展現了推動自由貿易的積極姿態。這些都可視為其在外交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塚崎公義，2017）。安倍在面對美國退出 TPP 的局勢時，亦迅速作出因應，將此視為展現日本存在感的契機，並積極擔任推動 TPP 的主導角色。

此外，隨著中國威脅日益增強，如何加以應對成為第二次安倍內閣的主要課題之一。根據曾於第一次安倍內閣擔任外務事務次官、並於2013年在第二次安倍內閣出任內閣特別顧問的谷內正太郎所言，安倍自重返首相之初，便抱持著「先向中國政府展現不畏懼的態度，之後再著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想法。為了維持日中之間的政治對話，並為最終實現兩國關係的穩定奠定基礎，安倍以「非正式、個人性質的外交」形式，委託前首相福田康夫前往中國訪問。此外，安倍本人則將重點放在透過加強與美國政府、澳大利亞政府、印度政府，以及東南亞、歐洲與中東各




地的聯繫，以鞏固對中包圍網。在第二次安倍內閣的首個年度內，他所舉行的高峰會次數，已超過歷任戰後首相在整個任期內所達成的總數(Green, M. J., 2022: 63)。安倍並未將中國在東海的獨占性使用問題局限為日中之間的雙邊爭端，而是意圖喚起國際社會的危機意識，使各國都能認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小野寺五典等，2022)。因此，安倍於2012年提出「安全保障鑽石構想」(Security Diamond)，主張以「從印度洋地區延伸至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財」以及「民主主義、法治與人權尊重」這一共同信念為核心，將澳大利亞、印度、日本與位於夏威夷的美國連結起來。之後，在2016年非洲領袖齊聚東京參加非洲開發會議(TICAD)之際，安倍正式發表了FOIP。相對地，美國在川普政府下的建制派完全承接了日本的戰略構想，並於2017年11月整理出一份關於美國版「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戰略」的詳細概要文件。考量到過去多半是日本外務省對美國的亞洲政策倡議作出回應，這次的情況可說幾乎是前所未有的角色逆轉(Green, M. J., 2022: 129-131)。綜上所述，安倍在因應中國威脅時，展現出積極且迅速的行動力，主動提出構想並藉由與他國合作將其推向國際舞臺。

總結而言，安倍對於中國威脅的上升以及美國政策轉向等日本周邊環境變化具有高度敏感度。他不僅能迅速回應這些變化，亦傾向將其視為契機，積極提出有利於日本的政策構想。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整理了影響安倍晉三外交政策決策的三項中介要素——對外交的關注程度、外交相關的訓練與經驗，以及對環境變化的敏感度。

首先，在外交關注程度方面，安倍作為政治家展現出極強的外交導向，並將外交與安全保障視為自身的核心政策領域。他在就任首相之前，即將日美同盟的重建與應對中國崛起視為日本最重要的課題，並強烈意識到必須擺脫民主黨政權時期



的「外交挫敗」。這一姿態明確體現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所推動的「地球儀俯瞰外交」與「積極和平主義」之發展，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內閣人事局等安全保障相關制度的建構上。對外交的高度關注，成為安倍個人特質——特別是其對安全保障的強烈信念——得以轉化為具體政策的重要基礎。

其次，在外交相關訓練與經驗方面，安倍以擔任外相秘書官的實務經驗為起點，透過投入北韓綁架問題的處理、參與國會外交委員會活動，以及對保守思想、憲法與安全保障議題的系統性學習，逐步強化了兼具實務性與理念性的外交觀。此外，安倍以自民黨青年局次長及局長身分訪臺並與李登輝會談的經驗，以及透過訪美學習到「以自身言語闡述日本立場」的外交風格，直接促成了其後在對臺政策上的積極作為，並體現在他主動向國際社會說明日本立場與構想的外交姿態之中。即使在第一次內閣辭職之後，安倍仍透過各類研究會與非公開的政策研討會持續深化外交知識，並將其運用於重返政壇後的戰略構想之中，這一點也值得關注。

第三，在對環境變化的敏感度方面，安倍展現出能夠準確察覺國際情勢變化並迅速將其反映於政策中的高度感受力。在歐巴馬政府時期，他透過配合「再平衡」戰略強化日美同盟；而在川普政府誕生之際，則率先主動接觸並建立起互信關係。此外，面對中國的崛起，安倍亦以前瞻性的戰略思維展開應對，透過推動對中包圍的形成及提出 FOIP 構想，以主動因應並引領國際環境的變化。此種靈活且迅速的判斷力，顯示安倍並非僅對環境變化作出反應，而是善於利用外部變局以提升日本的國際存在感，這一點尤為值得關注。

綜上所述，安倍晉三兼具對外交的高度關注、豐富的相關經驗，以及優異的環境認知能力。這三項媒介要因不僅強化了其個人特質在政策上的反映力，也提升了將個人特質轉化為具體、可執行且契合情勢之政策行動的可能性。下一章將在前述媒介要因的基礎上，檢視安倍的個人特質如何在具體的對臺政策中發揮作用。

## 第六章 安倍日本對臺政策與行動



本章重點在探討與分析前述安倍晉三的个人特質與媒介要因如何反映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的實際對臺政策之具體執行。第一節將首先以《外交青書》中對臺灣的論述為核心，分析日本對臺政策的整體方向與基本理念。其次，探討高層互訪與協議簽署等實務層面的具體政策發展。最後，分析日本在各類典禮中對臺灣待遇的變化，以及透過社群媒體向臺灣發出的訊息等人際互動與象徵性外交的表現。此外，在第二節中將比較安倍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政權，並分析為何在第二次政權期間得以推動對臺政策。最後，首相作為國家代表，其行動必須兼顧多方考量，受到的限制也遠多於一般政治人物。因此，第三節將透過分析安倍在卸任首相後與臺灣的交流及相關言論，進一步深化對安倍個人臺灣觀的理解。

### 第一節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臺灣政策之形成

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期間，有不少對臺灣友善或支持的言論或行動，以及明示或默許官方之間某種程度的交流，可以明顯觀察到安倍對臺政策的積極，下表整理了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對臺政策或發言中較為明顯的發展。

表 1 第二次安倍政權對臺政策主要動向年表

年	月	政策
2013		在《外交青書》中，將對臺灣的描述由「重要地區」改為「重要夥伴」
	3	在「東日本大震災二週年追悼儀式」中，將臺灣列入獻花唱名名單；安倍首相並在其臉書上親自向臺灣表達感謝與歉意
	4	締結《臺日漁業協議》
	4	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率領「日本臺灣經濟文化交流促進青年議員之會」訪臺

2015		在《外交青書》中，強調日本與臺灣共享基本價值，並將臺灣描述為「珍貴的朋友」
	7	有媒體報導安倍晉三與訪日中的李登輝進行秘密會談
	7	安倍晉三在參議院特別委員會上表示「臺灣是珍貴的朋友」
	8	在紀念戰後七十週年的《安倍內閣總理大臣談話》中，安倍將臺灣列為「反省」與「道歉」的對象
	10	禮遇訪日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2016	1	蔡英文當選總統之際，安倍首相、岸田外相及菅官房長官皆對其表示祝賀
	2	臺灣高雄市發生地震之際，向臺灣發出慰問並提供支援
	4	對臺灣在日本熊本縣地震時所表達的支持表示感謝
2017	1	作為日本對臺窗口的「交流協會」正式更名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3	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臺
2018		在《外交青書》中，關於 1972 年《日中共同聲明》的說明被往後移置
	2	臺灣花蓮市發生地震之際，向臺灣表達關懷與聲援
2019	3	在東日本大震災八週年之際，向臺灣表達感謝
2020		在《外交青書》中，將對臺灣的描述由「重要夥伴」提升為「極其重要的夥伴」
	7	李登輝前總統逝世之際，致送慰問訊息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其中，最具代表性與成果顯著的政策依其性質，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對臺政策的整體方向與基本理念；第二，協定締結等實務層面的具體發展；第三，對臺訊息發佈等象徵性外交行動。本論文接著據此分類分析安倍的個人特質如何

影響各面向政策的形成與推動。



## 壹、對臺政策的總體方向與基本理念

首先，為了掌握日本對臺政策的整體方向與基本理念，本文將以《外交青書》為主要分析對象，觀察其中對臺灣的定位及其變化。《外交青書》是日本政府就國際情勢之變化及其外交活動進行綜合整理的官方文件，內容主要敘述出版前一年度所發生的國際事件與日本的外交作為。關於臺灣，《外交青書》每年通常於第二章「亞太地區」一節中的「中國、蒙古等」項目下進行說明。該部分依序記述中國、臺灣與蒙古的相關內容。在安倍政權時期，《外交青書》整體架構中對臺灣的定位並無變化，且日本政府所表明立場——「日本與臺灣的關係係依據 1972 年的《日中共同聲明》，以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形式維持」——亦在歷年版本中均被明確記載。然而，在安倍政權期間，《外交青書》中對臺灣的描述出現了變化：一方面，臺灣作為日本重要夥伴的定位逐漸被提升；另一方面，日本與臺灣「共享基本價值觀」的論述也被更為強調。具體而言，《外交青書》中有關臺灣的記述自第二次安倍內閣上任後的 2013 年版起，於 2015 年、2018 年及 2020 年版本中陸續出現了修改與調整。

在 2012 年版《外交青書》中指出：「臺灣對我國而言，是具有緊密經濟關係的重要地區，並為第四大貿易對象」（日本外務省，2012：52）。<sup>40</sup>平川幸子對 2012 年版的表述作出如下分析。「地域」與「貿易對象」等名詞屬於不帶價值判斷的中性用語。對於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時臺灣提供約 200 億日圓破格援助的事實，《外交青書》僅以簡要方式記載；至於 2012 年 1 月馬英九總統成功連任一事，也僅以「選舉得以順利舉行，顯示民主主義已在臺灣深根」等保持距離的表述作結（平川

<sup>40</sup> 原文如下：「日本にとって臺灣は緊密な経済関係を有する重要な地域であり、第4位の貿易相手である。」



幸子，2022：86）。<sup>41</sup>

然而，在安倍政權下首次發行的 2013 年版《外交青書》中，記載為：「臺灣對我國而言，是具有緊密經濟關係的重要夥伴，並為第五大貿易對象」（日本外務省，2013a：31）。<sup>42</sup>其表述由「地區」改為「夥伴」。「夥伴」一詞意指能共同從事某種行動的對象，帶有明確的肯定意味，因此，此一變化可視為具有重要意涵的轉折（平川幸子，2022：86）。進入 2015 年版後，《外交青書》記載：「臺灣對我國而言，是共有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律支配等基本價值觀，並有著緊密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重要夥伴，以及珍貴的朋友」（日本外務省，2015b：41）。<sup>43</sup>此處明顯強調了日本與臺灣「共享基本價值」的事實，並且加入了「朋友」一詞，增添了情感層面的意涵。丹羽文生進一步比較分析《外交青書》中對臺灣以外各國的描述指出，澳洲被稱為「共享基本價值與戰略利益」；印度為「共享民主與法治等普世價值及戰略利益」；歐洲為「共享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與原則」；即便是美國，也僅被表述為「共享基本價值及戰略利益的同盟國」。在所有於《外交青書》中出現的國家之中，被稱為「珍貴的朋友」的只有臺灣。由此可見，在安倍外交的範疇中，臺灣的地位份量明顯突出（丹羽文生，2018：159-160）。此外，不僅在《外交青書》中有所體現，2015 年 7 月 29 日於日本參議院「關於我國及國際社會和平安全法制的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安倍首相在答辯中亦明確表示：「臺灣是與我國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也是珍貴的朋友」。至於臺日之間的安全保障合作，他則堂堂地指出：「關於應推進何種合作與對話，將在兼顧我國基本立場的前提下

---

<sup>41</sup> 原文如下：「選挙が円滑に実施されたことは、臺灣において民主主義が深く根付い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もの」

<sup>42</sup> 原文如下：「日本にとって臺灣は緊密な経済関係を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第5位の貿易相手である。」

<sup>43</sup> 原文如下：「日本にとって臺灣は、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法の支配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日本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る。」

進行檢討」(安倍晋三, 2015)。<sup>44</sup>另外, 2016年1月16日民進黨蔡英文在總統選舉中勝出後, 安倍內閣與外相岸田文雄隨即發表「外相談話」, 除祝賀蔡英文當選外, 並明確指出:「臺灣是我國的重要夥伴與珍貴的朋友, 雙方共享基本價值觀, 且擁有緊密的經濟關係與密切的人員往來」(日本外務省, 2016a)。<sup>45</sup>同時, 安倍晋三首相與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也於18日分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及記者會上, 對蔡英文總統的當選表達祝賀, 並表明期待未來能進一步深化臺日交流(日本李登輝友の会, 2016a)。安倍首相、岸田外相及菅官房長官等政府高層不再迴避針對臺灣發表談話或進行答辯, 這在1972年臺日斷交以來尚屬首次(平川幸子, 2022: 87)。

在2018年版, 不是文章的內容, 而是內容的順序有了變化。從來一直開頭表示的於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的說明被放在後面了, 然後與2015年版一樣的「臺灣對我國而言是, ...」這個句子被放在文章開頭了(日本外務省, 2018a: 39)。平川評價這個變化是「臺日關係從屬於日中關係的印象淡化了」(平川幸子, 2022: 88)。<sup>46</sup>更進一步的是, 在2020年版中, 不僅將「重要夥伴」提升為「極其重要的夥伴」, 顯示其重要程度再度提高, 同時也明確記載日本一貫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日本外務省, 2020: 47-48)。此外, 在蔡英文總統連任之際, 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發表談話指出:「臺灣對我國而言, 是共享基本價值觀、擁有緊密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重要夥伴, 也是珍貴的朋友。」他並表示, 將致力於「進一步深化臺日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產經新聞, 2020)。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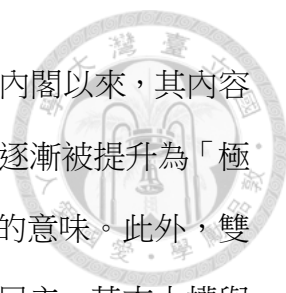
---

<sup>44</sup> 原文如下:「どのような協力や対話を進めていくかは、我が国の基本的立場を踏まえつつ検討してまいりたい。」

<sup>45</sup> 原文如下:「臺灣は我が国にとって、基本的な価値観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す。」

<sup>46</sup> 原文如下:「日臺関係が日中関係に従属している印象が薄らいだ。」

<sup>47</sup> 原文如下:「茂木氏は談話で『臺灣はわが国にとって基本的な価値観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だ』とし、『日臺間の協力と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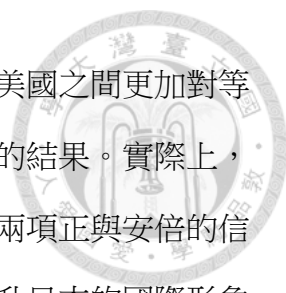


綜觀《外交青書》中對臺灣的描述，可以發現自第二次安倍內閣以來，其內容持續呈現重視臺灣的傾向。原先被定位為「重要地區」的臺灣，逐漸被提升為「極其重要的夥伴及珍貴的朋友」，這種表述更帶有「夥伴／同志」的意味。此外，雙方關係也從「具有緊密經濟關係」的層次，發展為「共享自由、民主、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並維持緊密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關係，顯示出「基本價值的共享」成為變化的主要特徵。從「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的強調可明顯看出，這種對臺灣的定位與 FOIP 及「價值觀外交」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所謂 FOIP，是指透過連結亞洲與非洲兩大洲，以及太平洋與印度洋兩大洋，以強化區域間的連結性，將根植於亞洲的民主主義、法治與市場經濟型發展模式推展至非洲，同時維持自由且開放的海洋秩序，藉此激發區域活力，實現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之構想。顯而易見，這裡強調了以「民主主義」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為基礎之發展的重要性（大庭三枝，2018：21）。此外，「價值觀外交」是指以自由、民主、基本人權、法治及市場經濟等普世價值為基礎，追求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外交理念。此一理念的背景在於，日本透過與世界上多數國家共享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共同價值，已取得相應的國際地位，因此有必要積極履行與此地位相符的責任。同時，在冷戰結束後，面對恐怖主義、核擴散及區域衝突等新興挑戰，日本也必須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承擔責任，並在此過程中發展出新的外交與安全保障思維（宇佐美正行等，2007：3）。

在此回到安倍的信念與動機來看，他認為日本的魅力在於「是一個尊重自由、民主與基本人權的社會，並建立在健全的法治之下，同時與各國共享市場經濟的共通認知」。他堅信，這些價值觀以及日本這個國家本身，都應由日本人民親手加以守護。此外，他認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必須在國際社會中強化自身的存在感，並作出更大的貢獻。為此，日本不應被動地適應國際秩序，而應主動與各國建

---

のさらなる深化を図っていく』との考えを示した。」



立合作關係，積極履行自身責任，藉此提升國際地位，並推動與美國之間更加對等的關係。FOIP 與「價值觀外交」正是這種思維反映於政策層面的結果。實際上，星山隆指出，對日本而言，價值觀外交具有兩項戰略意涵，而這兩項正與安倍的信念與動機相一致。所謂價值觀外交的兩項戰略意涵，第一，是提升日本的國際形象與存在感；第二，則是強化多層面的戰略平衡，包括積極承擔全球性角色、加強與美國的關係、推進「擴大亞洲」的制度化，以及強化自主外交（星山隆，2007：4-12）。


也就是說，在推動 FOIP 與「價值觀外交」、以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的過程中，臺灣被視為共享「基本價值」的強而有力夥伴，正是這一構想中的關鍵節點。同時，臺日之間或許也因共同感受到與「基本價值」相對立的中國威脅，而產生某種程度的共鳴。基於上述背景，第二次安倍內閣將臺灣定位為「與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並擁有緊密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重要夥伴及珍貴朋友」，大幅提升了對臺灣的定位與表述層級。第二次安倍內閣的對臺政策基本理念，可視為與安倍「由日本人民親手守護日本」以及「提升國際地位」等信念與動機相互連動。

## 貳、實務層面的推進

接下來探討重要人士互訪與協定締結等實務層面的具體政策發展。

### 一、政府之間的交流與派遣

首先，就要人互訪而言，在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前，基於對中國的顧慮，臺日兩政府自斷交以來一直抑制官方層級的往來。然而，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期間，這類交流相對有所擴大。2013年4月29日至5月2日，安倍首相的弟弟、擔任「日本臺灣經濟文化交流促進青年議員之會」會長的岸信夫率團訪問臺灣。此行的主要目的包括：「拜會馬英九總統」、「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與國民黨及民進黨立法委員



交流」、「拜會前總統李登輝」、「與外交部長林永樂會面」，以及「透過交流協會與日本人會所屬日本企業代表進行意見交換」。針對臺灣媒體關於「今後希望建立何種臺日關係」的提問，岸表示，在中國海洋擴張及北韓導彈試射等因素使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等價值的臺灣，對區域穩定而言極為重要；因此，臺日應加強溝通，持續推進雙方關係的建構(臺灣新聞,2013b)。

值得注意的是，岸信夫是安倍晉三的親弟弟，而他所領導的「日本臺灣經濟文化交流促進青年議員之會」則提出，目標是制定日本版的《臺灣關係法》，意在明確日本對臺灣安全的支持與承諾。美國的《臺灣關係法》一般被解釋為，美國承諾在中國對臺動武時保護臺灣的法律(李易璵,2016:166)。在閣僚或首相層級的訪臺仍受限制的情況下，岸信夫此行可視為安倍運用與自己共享信念與動機的人脈網絡，透過岸作為渠道向臺灣傳遞訊息，藉此在不觸及體制性限制的前提下，實質強化雙邊關係的舉措。

並且根據報導，2015年7月23日，正在訪日的李登輝前總統與安倍「偶然」在同一家飯店相遇並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雙方就日本與臺灣在促進東亞穩定與繁榮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對隨著經濟實力同步增強軍事力量的中國等議題進行了討論。李登輝對安倍政府所推行的「積極和平主義」及允許有限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給予肯定評價。雙方也被認為確認了法治、自由與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重要性(產經新聞,2015a)。關於這場極機密會談，雖然在官方層面予以否認，但李登輝在當日晚間與國會議員會面後，面對記者提問時所作的發言，被解讀為承認會談的存在。若此事屬實，這將是日本現任首相首次與臺灣的前總統會面。

此外，2015年10月6日至9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訪日。由於在民意調查中大幅領先其他候選人，此次訪日被視為準總統之行。值得注意的是，她不僅進行了與「日華議員懇談會」成員的會晤、與政黨及旅臺日僑的交流等慣例活動，還以安倍首相胞弟、國會議員岸信夫的邀請之名義，造訪了安倍的故鄉山口縣。此外，媒體亦報導她與安倍首相進行了秘密會談。山口縣是日本歷史上明治維新的發祥地，



同時也是日本近代政治的起點。自佐藤榮作、岸信介等人以來，出身於山口縣的首相多達八位，而安倍晉三的本籍亦位於山口縣。岸信夫全程陪同蔡英文在山口縣的行程，期間參觀了歷任首相的題字作品，並拜會了山口縣知事村岡嗣政等人（中央社，2015；產經新聞，2015b）。又據報導，蔡英文於 8 日疑似在首相官邸附近的飯店與安倍首相短暫接觸。9 日上午，她又前往內閣府，與日本政府高層進行非正式會談，就區域經濟整合與安全保障等議題交換意見。隨後，她造訪自民黨總部，並與幹事長代行細田博之等人會面（田中靖人，2015；石原忠浩，2016：102）。安倍晉三與蔡英文之間的密會並未在官方層面上獲得承認，而關於 9 日於內閣府的會談，蔡英文雖承認曾與相關人士會面，但表示無法透露會談對象（田中靖人，2015）。若此事屬實，則臺灣總統選舉候選人在日本政府機構內與現任高層官員或首相會面，實屬極為罕見之舉（川島真等，2021：253）。

2017 年 3 月，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為出席由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主辦、在臺北市舉行的地方宣傳活動「多彩日本」開幕典禮而訪臺（田中靖人，2017）。過去在臺日之間的政務交流中，臺灣方面的部長級訪日原則上僅限於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以外的官員；相較之下，日本方面對訪臺的限制更為嚴格。正如以往曾有經產省局長為見證重要協定簽署而訪臺的案例所示，一般而言，日本官員能以本省局長層級訪臺，已屬最高層級（門間理良，2017：47-48）。自 1972 年臺日斷交以來，這是首次有副大臣級的日本高層官員以公務名義訪問臺灣。對於日本現任副大臣訪臺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於 27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並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明確表達了對日本的不滿與抗議（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7）。對此，菅義偉官房長官於 3 月 28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基於我國政府一貫立場，即與臺灣維持非政府層級的實務關係，今後仍希望推動臺日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他同時強調：「日本與臺灣擁有緊密的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是重要的夥伴」並針對赤間副大臣的訪臺說明道：「能夠大力宣傳日本地方的魅力，並加深廣泛臺灣民眾的理解，從深化臺日經濟關係與人員交流的角度來看，這次訪問具有重要意



義」(石田仁志, 2017)。<sup>48</sup>

總而言之,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儘管官方層面上仍否認部分互動的存在,但臺日高層人士之間的交流次數顯然有所增加。其中,安倍首相親自與李登輝及蔡英文進行極機密會談的作法,正體現了他重視與對方國家領導人建立個人信賴關係的外交風格,也充分展現了他所擅長的「個人外交」特質。此外,無論是其親弟岸信夫的訪臺,或是為蔡英文安排的山口縣參訪行程,都可看出安倍晉三善於任用與自己理念相近、出身同一派閥或親近的核心人脈,以此推廣自身理念的用人手法。


## 二、協議締結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日本與臺灣共簽署了 38 項合作協定,其中在馬英九政府任內簽署 15 項,在蔡英文政府任內簽署 23 項(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2024)。例如,2013 年 11 月,臺日雙方簽署了包括《臺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在內的五項協議與備忘錄;而在 2015 年 11 月,雙方又簽訂了企業與個人長期期盼的《臺日租稅協定》,為在兩地經營事業的相關人士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這些經濟相關協議可視為源自於所謂《臺日自由貿易協定》(FTA) 研議過程的延伸成果,亦即是在實際需求之下所達成的具體協議(川島真等, 2021: 249)。

在眾多協議之中,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此協議自談判開始以來,歷經長達 17 年的時間,方才得以締結。東海是豐富的漁業資源所在地,對臺灣和日本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漁場。臺灣和日本地理

---

<sup>48</sup> 原文如下:「菅義偉官房長官は 28 日の閣議後会見で、赤間二郎総務副大臣が前週末に臺灣を訪問したことに関連して、『政府としては臺灣との関係を非政府間の実務関係として維持していくとの立場を踏まえ、日臺間の協力と交流を進めていきたい』と述べた。...菅官房長官は『日本と臺灣は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だ』としたうえで、赤間副大臣の訪問について『日本の地域の魅力を強く訴え、幅広い臺灣の方々の理解が深まることは日本と臺灣の経済関係、人的往来をさらに深めていく観点から意義あると思っている』と説明した。」




位置非常靠近，臺灣的東北海岸與日本沖西南海岸大約相距 340 海浬，而日本最西端的領土與臺灣僅約 60 海浬，因此導致專屬經濟區的主張重疊(Yeh et al., 2015: 295)。因此，日本自 1996 年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以來，與其他鄰近國家相同，也多次與臺灣就漁業問題進行協商。

由於臺日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臺日漁業協議》是在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協會的框架下進行的；第一回會議於 1996 年 8 月舉行，直到 2001 年 11 月的第十一回會議為止，平均每年舉行約兩次；然而，自從 2005 年 7 月舉行第十五回會議後，直到 2009 年 2 月舉行第十六回會議的三年間完全沒有召開過會議(石原忠浩, 2017b: 30)。<sup>49</sup>2008 年 6 月，隨著聯合號海釣船事件的發生，臺日之間的緊張局勢暫時升高；這一事件成為釣魚臺主權問題談判和重啟漁業協商的契機，特別是臺灣方面對解決漁業問題的需求日益迫切；同年 9 月，馬英九總統將臺日關係定位為特別夥伴關係，並將其作為具體的優先課題，提出「擱置主權問題，解決漁業問題」的建議；雖然日本方面尚未對此提議直接回應，但上述的第十六次會議於 2009 年舉行(石原忠浩, 2017b: 31)。2012 年 4 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購買釣魚臺列嶼的構想；隨後在同年 9 月，野田政府實施了將釣魚臺列嶼收歸國有的措施，完成了所有權的轉移。對此，臺灣外交部以表達抗議為由，命令召回駐日代表。9 月下旬，臺灣的抗議漁船及以「護航」為目的的海巡署艦艇進入日本領海，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進行了互相噴水的對峙行動。此外，臺灣國內也出現了小規模的抗議活動(石原忠浩, 2023: 163-164)。為了平息事態，日本政府於 10 月 5 日由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破例向臺灣民眾發表訊息，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隨後，11 月亦在東京舉行了為第 17 輪會談所作的預備會議。然而，當時的日本正值野田內閣於 11 月 15 日解散眾議院、政權更替已成定局之際，實際上並無

---

<sup>49</sup> 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已分別更名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與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能力作出具體的對外政策決定（石原忠浩，2017b：32）。在這樣的情勢下，2012 年 12 月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後，《臺日漁業協議》的談判出現了進展。安倍首相在就任後不久，即「指示相關部會加快達成漁業協定的共識」（丹羽文生，2018：157-158）。外務省試圖推動談判時，主張維護漁業權益的水產廳強烈反對，地方漁業團體與沖繩縣方面亦多次表達不滿。最終在首相官邸的主導下，仍強勢推動協議的締結（川島真，2013）。

因此，隨著《臺日漁業協議》的締結，臺日雙方同意將釣魚臺列嶼周邊 12 海里內的海域爭議擱置，並將協商焦點集中於北緯 27 度以南、日本八重山群島與宮古群島以北的海域。在這一雙方主張的專屬經濟區重疊水域中，協議明確劃定了漁業作業範圍，保障了臺灣漁船在該海域的作業權益。由此，臺灣漁船可作業的海域較以往擴大了 4,530 平方公里（臺灣光華雜誌，2013）。此一海域的劃定，可被視為日本對臺灣所作出的讓步（池上寬，2014：192-193）。對於因此導致日本漁船作業環境惡化的情況，日本政府亦採取了補償措施。例如，作為水產廳外國漁船綜合對策的一環，編列了 100 億日圓投入「沖繩漁業基金事業」，以作為減輕損失的對應措施（佐々木貴文，2016：54）。此外，在協定內容中最重要之制度設計之一，即為將釣魚臺主權問題予以擱置，也就是所謂的「保留條款」。臺日雙方在第四條規定：「本協議之所有事項或為實施而採取之措施，均不得認為影響雙方具權限之主管機關有關海洋法諸問題之相關立場。」藉此將談判範圍限定於漁業資源的管理與作業權益。透過此一制度性安排，日本一方面得以迴避觸及敏感的領土問題，另一方面降低國內的政治阻力，並將其安全保障層面的政策目標從漁業協商中切割處理。換言之，正是透過這種「主權問題擱置—漁業問題處理」的制度框架，臺日雙方在不改變各自法律立場的前提下得以達成協議，確保了談判的可行性。


對日本而言，《臺日漁業協議》因缺乏可預期利益而遲遲未能達成，歷經長達 17 年之久。學界普遍認為該協議遲遲未能簽署的主因，正是日本方面長期以來的消極態度。那麼，為何到了 2013 年卻能順利締結？在僅涉及臺灣和日本的雙邊關



係中，通常是日本處於優勢地位（川島真等，2021：258）。由於日本認為《臺日漁業協議》提供的利益不足以克服所面臨的障礙，因此該協議進展不順利（童倩，2012；林賢參，2013：20；Fukuda, M., 2013：2）。

大多數學者指出，日本積極推動簽訂《臺日漁業協議》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本希望阻止臺灣與中國聯合起來，在釣魚臺的主權問題上對抗日本。自 2010 年 9 月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在釣魚臺相撞事件後，日本對中國海洋擴張的警惕日益增加。此外，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後，中日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何思慎，2010：1-3；小笠原欣幸，2014：75）。中國基於「一個中國」的立場，呼籲「應一致對外」，意指臺灣在釣魚臺問題上應與中國合作抗日（川島真等，2021：250-251）。馬英九確實提出了《東海和平倡議》，並推動擱置領土爭議進行談判。然而，自從馬總統上任後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以及綠營對馬政府貼上「離美、親中、反日」的標籤，再加上馬總統身為「老保釣」的身份，使得日本質疑馬政府的「親中、反日」姿態，並更擔心馬政府在釣魚臺議題上可能與中國聯手共同施壓日本（林正義，2010：4；林賢參，2013：20）。馬英九政府對於日本釣魚臺國有化一事，容忍社會運動團體舉行示威，這種態度常讓日本認為臺灣和中國可能會合作。如果在釣魚臺的主權問題上，臺灣和中國聯手對抗，形成 2 對 1 的局面，對日本外交來說非常不利。在此情勢下，2013 年 2 月，馬英九政府公開表明「在釣魚臺列嶼爭端上，我國不與中國大陸合作」的立場。此舉被視為促使日本為防止臺灣與中國形成協作關係，而選擇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協，也要與臺灣簽訂漁業協議的重要推力。實際上，安倍晉三首相在協議締結後的 4 月 23 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也曾表示，此次簽署「將成為亞太地區安全保障環境的一大進展」，並就締結的背景說明道：「考量到臺灣於今年 2 月已表明在釣魚臺問題上不與中國合作的立場，因此促成了此次協議的達成」（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2013）。<sup>50</sup>

<sup>50</sup> 原文如下：「...傳統的に日本と友好な関係にある臺灣との言わばとげとなっているこの漁業協定をしっかりと妥結させていくことにおいては、この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安全保障環境にお



關於安倍晉三對釣魚臺列嶼問題的看法，據報導，他在 2012 年 10 月以自民黨總裁的身分與來日的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會面時，對伯恩斯所言「中國近來的行動對我們而言是一項重大課題」作出回應，安倍明確表示：「在釣魚臺問題上，我沒有任何妥協的打算，也不打算進行談判。當前需要做的，是即便僅限於海上保安廳層級，也必須加強日本在該海域的實質力量。」他再次明確傳達了立場——釣魚臺列嶼是日本固有領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領土爭議」（自民黨，2012）。對於將日本安全保障視為首要任務的安倍而言，中國試圖單方面改變釣魚臺列嶼現狀的行為構成了嚴重威脅。在此情勢下，中臺合作是他無論如何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為了防止此一結果，安倍寧可接受日本漁船作業環境惡化的代價，也選擇作出妥協。此一判斷明確體現出安倍的決策風格——以現實主義為外交基本原則，為了實現成果可不惜妥協，但在核心信念上則堅決貫徹，毫不动摇。

此外，安倍在推動《臺日漁業協議》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外交手法亦極具特色，充分體現出他重視人際互動與信任建立的外交風格。安倍在就任後不久，便祕密派遣情報官北村滋前往臺北，探尋馬英九總統的意向（小笠原欣幸，2022）。馬英九總統在領土問題上明確表態不與中國合作，正是在北村滋訪臺之後的事。北村滋於 2023 年 12 月接受蔡英文總統頒授「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其對臺日關係的貢獻時，在致詞中表示：「他與臺灣的緣分始於 1995 年，當時任職於日本警察廳警備局外事課，此後歷任情報及國家安全保障等相關職務。任職期間，多次獲得駐日代表處的信任，並與臺灣在日本外交與安全保障領域建立交流管道，深化雙邊情誼。他也談及過去參與《臺日漁業協議》談判的經驗，讓他深刻體會到內政與外交之間的緊密聯繫...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時任首相的安倍晉三非常敬重李登輝前總統，對李前總統及蔡總統亦懷有深厚情感，雙方並持續努力深化臺日關係...」（中華民國

---

いても大きなこれは前進になるわけでごさいますて、...臺灣は本取決めの署名に先立つ本年二月に尖閣諸島をめぐり中国と連携しないとの立場を表明したのでごさいます。このことも踏まえながら、今回この妥結に至ったということは申し上げておきたいと思ひます。」


國總統府，2023)。除了北村滋之外，也有觀點指出，在《臺日漁業協議》締結的過程中，作為自民黨與臺灣之間溝通管道的自民黨青年局，當時的歷任局長也曾在幕後與臺灣政府高層進行接觸（平川幸子，2022：85）。



綜上所述，第二次安倍政權的一項重大成果，便是《臺日漁業協議》的締結。此協議之所以得以達成，乃因安倍在就任後隨即指示相關部會「加快漁業協定達成共識」，並派遣北村滋及出身自民黨青年局的相關人士與臺灣政府高層接觸。最終，即便面對水產省與沖繩縣的反對，仍在首相官邸的主導下推動協議順利締結。在這種可謂強行推進的締結過程中，充分展現出安倍運用與自身理念相近的多元人脈，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動政策決策的特徵；同時，也清楚反映出他對安全保障議題的高度敏感性及將其置於極高優先順位的個人特質。

### 三、交流協會的改名

此外，2017年1月1日，日本作為對臺窗口機構的「交流協會」正式更名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由於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與臺灣結束了外交關係，因此為了維持經濟、貿易、技術與文化等層面的實務往來，雙方有必要新設作為聯繫窗口的實務機構。當時，日本方面成立了以民間團體形式運作的「交流協會」，而臺灣方面則設立了「亞東關係協會」作為對應機構。當時，設立該機構時最大的爭議焦點在於名稱問題。日本方面主張不得使用「華」或「中」等字樣，傾向命名為「財團法人臺日交流協會」；然而，臺灣方面則認為不應使用「臺」字，主張應採用「日華」或「日中」等名稱，雙方因此出現意見分歧（川島真等，2021：124）。由於日本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無法接受臺灣方面的命名要求，雙方的協商因此陷入僵局。最終，日本方面將機構命名為單純的「交流協會」，而臺灣方面則以象徵「亞洲之東」之意的「亞東」命名為「亞東關係協會」（丹羽文生，2018：161）。此一名稱問題在於，其表述過於模糊，導致外界難以一眼辨識交流對象為何，也使該機構的知名度相對偏低（平川幸子，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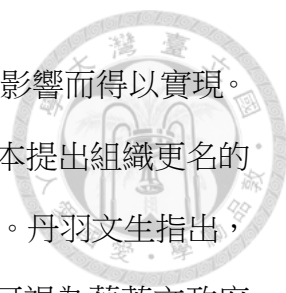
88)。尤其是日本方面的「交流協會」，由於未明確指出交流對象，因此顯得難以理解且辨識度不高。基於上述背景，自 2006 年前後起便有意見指出有必要進行更名。然而，由於交流協會是經日本外務省與通產省（現為經濟產業省）認可成立的財團法人，更名需修改其章程，相關手續極為繁複，因此該議題一直被延後處理。此外，當然也考量到中國方面的反對，這同樣是延遲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6c）。

然而，到了 2017 年，日本終於決定進行更名。其背後的主要原因在於，自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以來，臺日交流已出現顯著的深化與擴展。2017 年就任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理事長的谷崎泰明如此說明。臺日之間的人員往來連年刷新歷史新高，至 2016 年雙向交流人次終於突破 600 萬，較 2012 年增加了多達 380 萬人，僅五年間即實現了大幅成長。此外，為深化臺日之間的各項實務交流與合作，臺日雙方的交流協會在 2012 年至 2016 年短短五年間共簽署了 21 項協議與備忘錄，內容涵蓋產業合作、漁業、藥品管理、鐵道、金融、觀光、出入境管理、核能、防災、避免雙重課稅、產品安全、語言教育等多個領域，使實務交流與合作的架構得以迅速完善。<sup>51</sup>在臺日關係中，兩國民眾之間情感的緊密化推動了實務合作的深化，而這些合作又進一步促進民間交流的擴大，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鑑於如今前所未有的眾多人開始關注臺日關係，並積極參與兩地之間的往來與交流，日本遂決定更改名稱，旨在更積極地宣傳日本對臺窗口機構的存在與角色（谷崎泰明，2017：1）。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代表沼田幹夫亦就協會更名的目的表示，希望藉由明確化交流對象，進一步發展臺日關係，使雙方關係邁向「最佳狀態」（TAIWAN TODAY，2017）。此外，同年 5 月，臺灣方面的對日窗口機構「亞東關係協會」亦更名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雖然並無證據顯示更名係由安倍首相直接下達指示，但顯而易見的是，此舉乃

---

<sup>51</sup> 這 21 項文件中，有部分是在 2012 年 12 月安倍政權成立前簽署，而在安倍政權期間則共簽署了 18 項。



第二次安倍政權強化對臺關係的一環，或至少受到其政策導向的影響而得以實現。實際上，有觀點指出，早在馬英九政權時期，臺灣方面便曾向日本提出組織更名的建議，但實現是在蔡英文政權上臺之後（石原忠浩，2017a：29）。丹羽文生指出，交流協會的更名不僅是為了提升認知度等業務層面的考量，也可視為蔡英文政府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措施之一。他進一步評價此事為「斷交以來臺日關係的最大突破」，可謂一項壯舉（丹羽文生，2018：162）。林賢參亦指出，此舉不僅開啟了日本對臺關係的新時代，同時也可視為安倍內閣展現出強化與蔡英文政府關係的堅定決心之具體表現（林賢參，2017：52）。可以認為，安倍政權藉由在親日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期間推動對臺窗口機構更名，意在強化臺日關係，使臺灣更傾向日本，其可能性相當高。

### 參、人際互動與象徵外交

最後，在安倍個人甚至私人的場合中，安倍也表示出對臺灣的親近。

#### 一、在公開場合對臺灣表現出禮遇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過去一向被刻意迴避的在典禮或談話中提及臺灣的做法，開始被公開且理直氣壯地採用。首先，可舉 2013 年 3 月 11 日舉行的「東日本大震災二週年追悼儀式」為例，當時邀請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沈斯淳參加指名獻花。針對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臺灣捐贈了超過 200 億日圓的破格性義援金。然而，2012 年 3 月 11 日舉行的「東日本大震災一週年追悼儀式」中，當時的民主黨野田政權安排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羅坤燦出席，但未將其列入一樓貴賓席，而是安排在二樓一般席；在指名獻花環節中，也未宣讀臺灣的名稱，將其排除在外。此舉乃依循「1972 年體制」下日本與臺灣無外交關係的原則所作出的事務性安排，同時也是出於對中國的顧慮而採取的結果（丹羽文生，2018：156；小笠原欣幸，2022）。對此舉，臺日兩方皆出現批評聲浪。特別是

在日本國內，對於捐贈高達 250 億日圓震災義援金の臺灣未被列入指名獻花對象，而需與一般參加者一同獻花一事，自民黨等政黨對政府提出了強烈批評（臺灣新聞，2013a）。此事亦在日本國會中被提出質詢，時任首相野田佳彥表示：「若有任何行為傷害到臺灣民眾的感受，我深感抱歉，並願意深刻反省」（小笠原欣幸，2022）。

52

基於對前次事件的反省，安倍政權在 2013 年 3 月 11 日舉行的「東日本大震災二週年追悼儀式」上，特別為出席的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沈斯淳安排了「外交使節暨國際機構」來賓席，並將臺灣納入指名獻花名單。另一方面，中國對此舉表示強烈反對。中國駐日臨時代辦韓志強拒絕出席該追悼儀式；中國外交部亦發表聲明指出：「日本方面的行為違背了《中日聯合聲明》的原則與精神，以及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所作的承諾。」並強調：「中方堅決反對日本的做法，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與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館，2013；小笠原欣幸，2022）。<sup>53</sup>然而，安倍並未因此有所顧慮。於追悼儀式結束後的兩天，他在臉書上發文，稱臺灣是「捐贈超過二百億日圓義援金、世界上最珍貴的日本朋友」，並坦率地就 2012 年追悼儀式未將臺灣列入指名獻花一事致歉，表示那是「傷害了臺灣人民感情的失禮之舉」。此外，安倍並在文中暗諷中國因日本對臺灣的禮遇而臨時取消出席追悼儀式，表示：「中國未派代表出席，實在令人遺憾。然而，我們仍希望今後能繼續保持禮貌與尊重的態度」。<sup>54</sup>自 2014 年以後，日本基本上持

---

<sup>52</sup> 原文如下：「臺灣のみなさんのお気持ち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ら本当に申し訳ない、深く反省したい。」

<sup>53</sup> 原文如下：「日本側は今年の追悼式に、臺灣側関係者と外国の外交使節団、国際機関の関係者と同列に扱った。日本側の行為は中日共同声明の原則と精神、日本側が臺灣問題について行った約束に背くものだ。中国側は日本側の行為に断固として反対するとの姿勢を貫き、日本側に厳重な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い不満を表明し、抗議を行った。」

<sup>54</sup> 原文如下：「3月11日の東日本大震災慰霊式典に『臺灣の代表の取り扱い』を理由に中国が欠席しました。昨年行われた慰霊式典では、臺灣の代表は招待され出席していたにも関わらず名前すら読み上げられませんでした。震災発生時、臺灣は世界のどの国よりも多額の200億円



續採取相同做法，追悼儀式中對臺灣代表的安排與待遇，已達到與與日本有外交關係國家相當的水準。李易璵認為，安倍在面對中國方面的抗議與壓力時，仍公開邀請臺灣並表達感謝，此舉清楚展現了他對臺灣的政治立場，可視為其態度的具體體現（李易璵，2016：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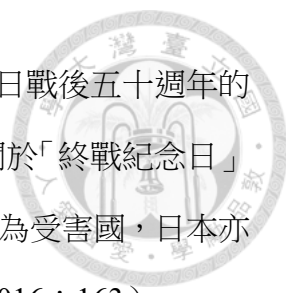
此類行動可說是象徵性地體現了安倍的信念與其決策風格。安倍在臉書上稱臺灣為「日本珍貴的朋友」，此一表述亦與自 2015 年起《外交青書》中對臺灣的描述相呼應——「臺灣對我國而言，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與法治等基本價值，並擁有緊密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重要夥伴，也是珍貴的朋友。」在此強調的背後，體現出安倍所重視的信念——即強調與共享「自由、民主主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國家建立連帶關係。此外，安倍在面對中國壓力時仍堅定邀請臺灣，並於臉書上表達對臺灣的感謝及對中國抵制行為的遺憾，這一點清楚展現出他的決策風格——在涉及信念的議題上絕不妥協，堅持貫徹自身主張的性格。因此，此一事件可被視為安倍將臺灣定位為「價值觀外交」夥伴的信念，以及其將該理念付諸實踐的強烈政治自信之具體體現。

2015 年 8 月 14 日，為紀念戰後七十週年，安倍首相發表了《安倍內閣總理大臣談話》。在談話中，安倍表示：「我國對於先前大戰中的行為，已多次表達深切的反省與誠摯的歉意。為了以實際行動展現這份心意，我們銘記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國，以及臺灣、韓國與中國等鄰國人民所經歷的苦難歷史，並在戰後始終致力於他們的和平與繁榮。歷代內閣一貫秉持的立場，今後亦將堅定不移」（安倍晋三，2015）。<sup>55</sup>值得注目的是，安倍在談話中先於「中國」提及「臺灣」，作為「反省」

---

を超える義援金を贈ってくれた大切な日本の友人です。台湾の人々の気持ちを傷つける非礼な対応でした。今年はこの対応を改め、台湾に対し感謝の意を込めて『指名献花』を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ことに対して中国が代表を送らなかったことは大変残念なことであります。しかし私達はこれからも礼儀正しくあ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して多くの支援をいただいた台湾をはじめ全ての国に対して、感謝の思いでいっぱいあります。」

<sup>55</sup> 原文如下：「我が国は、先の大戦における行いについて、繰り返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




與「道歉」的對象（丹羽文生，2018：158）。在1995年8月15日戰後五十週年的《村山談話》以及十年後戰後六十週年的《小泉談話》等歷代內閣於「終戰紀念日」發表的談話中，皆未提及臺灣。臺灣在《安倍談話》中首次被列為受害國，日本亦首次就過去戰爭中臺灣所遭受的損害正式表達歉意（李易璦，2016：163）。

櫻井よしこ指出，安倍首相在談話中，為顧及與臺灣之間無正式邦交的現實，特意以「鄰人」而非「鄰國」稱呼受害對象，並將臺灣置於韓國與中國之前，與亞洲列強並列。此舉無論從民間層面或國家層面來看，都顯示出安倍首相對臺灣關係的高度重視（櫻井よしこ，2015：75-76）。此外，藤井巖喜表示，他對於談話中「臺灣」與「中國」並列一事感到驚訝，並指出，這意味著安倍政權已承認臺灣作為「非中國一部分」的政治實體，此舉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記強烈的衝擊（夕刊フジ，2015）。實際上，在談話發表前夕，時任外務事務次官的齋木昭隆曾召見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至外務省，說明《安倍談話》的內容。程永華對於談話中「臺灣」先於「中國」被提及一事，顯露出明顯的不悅。齋木則解釋指出，此一安排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臺灣比中國更早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此番說明最終使程永華接受了這一理由（丹羽文生，2018：158-159）。有幾家中國媒體強烈批評安倍的舉動，指責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破壞中日外交準則；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正面批評，而僅依慣例對談話作出形式性評論（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5b）。

從整體觀之，《戰後七十週年談話》的撰寫方式清楚展現出安倍的動機，尤以其所強調的「脫離戰後體制」意圖最為顯著。安倍坦言，他之所以在談話中採用「我國對於先前大戰中的行為，已多次表達深切的反省與誠摯的歉意...歷代內閣一貫秉持的立場，今後亦將堅定不移」等表述，是因日本過去已多次就大戰行為致歉，

---

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してきました。その思いを実際の行動で示すため、インドネシア、フィリピンはじめ東南アジアの国々、台湾、韓国、中国など、隣人であるアジアの人々が歩んできた苦難の歴史を胸に刻み、戦後一貫して、そ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してきました。こうした歴代内閣の立場は、今後も、揺るぎ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心中難免產生「究竟要道歉多少次才足夠」之念，故未以「我向各國致歉」之方式表達。此外，安倍指出，戰後五十週年的《村山談話》之所以存在問題，在於其內容彷彿將殖民統治的責任全盤歸咎於日本，也即是在善惡價值判斷的基礎上，以「日本犯下罪行」為前提進行道歉，而忽略了當時殖民統治與種族歧視在全球普遍存在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安倍回顧指出，《七十週年談話》的撰寫，是以「日本誤判國際社會潮流」這一政策層面的現狀認識錯誤為基礎所形成的（安倍晋三等，2023：161-162）。

《安倍談話》可說是反映了安倍「脫離戰後體制」的動機，亦即擺脫長期受制於過去的姿態，推動自主外交的意圖。實際上，安倍在談話的最後部分表示：「我們將銘記日本曾作為挑戰國際秩序者的那段歷史。正因如此，我國將堅定不移地奉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基本價值，並與共享這些價值的國家攜手合作，在『積極和平主義』的旗幟下，更加致力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安倍晋三，2015）。<sup>56</sup>綜合上述，可以認為，安倍在談話中將臺灣置於中國之前，顯示出日本重視與「自由、民主主義、法治」等價值相共享國家的立場。此舉體現了安倍的信念與動機——意在使日本外交從戰後長期處於被動的姿態，轉向以價值為核心、主動明確發聲的外交方針。

## 二、社群媒體上的對臺訊息

正如前文所述，2013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二週年追悼儀式」結束後兩天，安倍首相在其臉書上親自向臺灣表達感謝與歉意。而在安倍政權期間，除此之外，亦多次透過社群媒體向臺灣發佈訊息。小笠原欣幸指出，自1972年臺日斷交

---

<sup>56</sup> 原文如下：「私たちは、国際秩序への挑戦者となってしまった過去を、この胸に刻み続けます。だからこそ、我が国は、自由、民主主義、人権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揺るぎないものとして堅持し、その価値を共有する国々と手を携えて、『積極的平和主義』の旗を高く掲げ、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にこれまで以上に貢献してまいります。」

以來，安倍政權可謂對臺灣最為友好的日本政權，而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正是安倍首相面向臺灣所發佈的社群媒體訊息。在災害發生等情況下，安倍首相與蔡英文總統之間多次透過社群媒體互致鼓勵，這些互動不僅在網路上獲得大量「讚」，亦被媒體廣泛報導，進而強化了臺日之間的正面印象。他並指出，臺日之間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互動，是自安倍政權以來才出現的新型態交流。儘管雙方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這種由領導人主動與對方民眾溝通的做法，值得肯定與評價（小笠原欣幸，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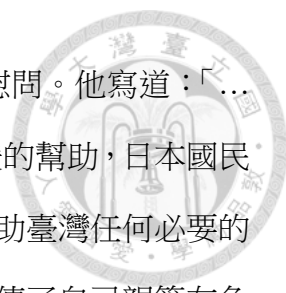
例如，2016年2月6日臺灣高雄市發生地震時，日本政府除由安倍首相向馬英九總統、岸田外務大臣向林永樂外交部長發出慰問訊息外，亦提供價值約12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等多項支援措施（日本外務省，2016b；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6）。此外，安倍首相也在自己的臉書上公開發佈了鼓勵的言詞。2016年4月14日，日本熊本縣發生地震後，臺灣方面隨即致送慰問訊息。對此，安倍首相於4月18日在臉書上更新貼文表示：

…來自海外的溫暖支援與慰問訊息不斷送達。美國立即派遣魚鷹運輸機，將食物等救援物資送往道路中斷的南阿蘇村。來自俄羅斯總統普丁、英國首相卡麥隆、印度總理莫迪等多國領袖也傳達了哀悼與慰問之意。「熊本加油，日本加油。」其中，來自日本老朋友——臺灣的訊息，更令我深受鼓舞（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6b）。<sup>57</sup>

此處亦使用了「老朋友」與「更令我深受鼓舞」等帶有情感色彩之表述，顯示安倍對臺灣之情感格外深厚。2018年2月6日臺灣花蓮市發生地震後，安倍首相於2

---

<sup>57</sup> 原文如下：「…海外から、温かい支援やメッセージが寄せられています。米国には、早速、道路が寸断された南阿蘇村に、オスプレイで食料など支援物資を届け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ブーチン露大統領、キャメロン英首相、モディ印首相など、海外の多くの首脳からは、お悔やみ、お見舞いのメッセージをいただきました。『熊本頑張れ。日本頑張れ。』日本の古い友人である台湾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には、とりわけ励まされました。」



月 8 日在臉書上發佈訊息，向罹難者表達哀悼，並向災民致以慰問。他寫道：「...東日本大地震時，日本受到長年以來的朋友——臺灣的各位溫暖的幫助，日本國民直到現在仍記憶鮮明。在重要的友人面臨困難的時刻，日本願協助臺灣任何必要的支援...」。他不僅以日文發佈訊息，亦以中文書寫內容，同時上傳了自己親筆在色紙上寫下「臺灣加油」的照片。此外，在東日本大地震屆滿八週年的 2019 年 3 月 11 日，蔡英文總統於推特以日文發文表示：「藉此機會，再次為罹難者祈求冥福，並向受災民眾致上誠摯的慰問。臺灣關懷日本的心，沒有時差」。<sup>58</sup>對此，安倍首相於 3 月 12 日回覆該訊息，在推特上用中文表示：「臺灣的支援帶給我們無比的勇氣。震災已經過去 8 年了，災區的復興工作正在切實地進行。謹藉此機會再次向臺灣許多老朋友表達誠摯的謝意」。2020 年 7 月 30 日，前臺灣總統李登輝逝世。翌日（7 月 31 日），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舉行記者會，並透過首相官邸的臉書發佈相關影片與訊息。他表示：

*得知李登輝前總統辭世，深感哀痛與惋惜。李登輝總統為促進日本與臺灣的友好與親善關係作出了極大貢獻。李登輝總統同時也是一位始終對日本懷有特別情感的人物；他不僅在臺灣推動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同時亦奠定了臺日關係的基礎，因此深受日本國民的格外敬愛與親近之情。對於李登輝總統的辭世，雖深感遺憾，但我謹再次誠摯祈願其靈安息（日本首相官邸，2020）。<sup>59</sup>*

---

<sup>58</sup> 原文如下：「これを機に再び、犠牲者のご冥福を祈るとともに、被災された方々に心から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臺灣が日本を思う気持ちに時差はありません。」

<sup>59</sup> 原文如下：「李登輝元總統の御逝去の報に接し、誠に痛惜の念に堪えません。李登輝總統は、日本と臺灣の親善関係、友好増進のために多大な御貢献をされた方であります。そしてまた、同時に、李登輝總統は常に日本に対して特別な思い出接してこられた方でもあり、また、臺灣に自由と民主主義、人權、そして普遍的な価値を、また、同時に、日臺関係の礎を築かれた方として、多くの日本国民は格別の親しみを持っています。李登輝總統の御逝去、誠に残念ではありますが、改めて心から御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此外，安倍亦在其個人臉書帳號上轉發了此訊息。


安倍將「自由、民主主義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置於外交核心位置，並著重強化與共享這些價值之國家的關係。安倍多次在社群媒體上提及臺灣，此舉象徵性地傳達了「共享價值觀」的訊息，明確展現出其將臺灣定位為「共享價值的夥伴」之立場。特別是在災害時的互動中，安倍多次使用「長久以來的老朋友」一詞，強調超越國家關係的「價值與友情的連結」，此一特點可視為其理念層面的具體體現。此外，安倍極為重視建立個人層面的信任關係，展現出明顯的「個人外交」傾向。透過社群媒體直接向臺灣民眾與領導人傳遞訊息，可視為其意圖拉近與無正式外交關係的臺灣之間心理距離的具體作法。藉由在社群媒體上將與蔡英文、李登輝等臺灣領導人的互信關係具體化，安倍試圖在政治限制之下，建立以共感與信任為基礎的雙邊關係。

#### 肆、小結

綜上所述，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日本對臺政策，是戰後以來最為積極且持續發展的階段。其變化具體體現在多個層面——包括《外交青書》中臺灣地位的提升、政治人物之間的互訪增加、《臺日漁業協議》的簽訂、交流協會的更名，以及在社群媒體與官方談話中多次提及臺灣等多面向的表現。

這些現象並非單純的外交調整或偶發事件，而是與安倍晉三個人的信念、動機、決策風格與人際風格密切相關的結果。安倍將「自由、民主主義、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置於外交核心，認為日本應不再被動，而應主動作為支撐國際秩序的國家。其推動的 FOIP 與「價值觀外交」，以及將臺灣定位為「共享價值的重要夥伴」的政策方針，正是這一信念的具體體現。此外，出於「脫離戰後體制、推動更具自主性的外交」之動機，安倍可被視為將臺灣定位為日本實踐「以價值為導向的外交」、並向國際社會展現其理念與責任的象徵性對象。

此外，安倍在政策推動上亦明顯展現出其「由上而下」與「重視人脈」的行動




特質。無論是《臺日漁業協議》中迅速的政治判斷，抑或透過其胞弟岸信夫等信任人脈推動交流，皆體現出安倍以決斷力與人際網絡為支撐的政治主導型外交風格。而且，安倍亦重視與臺灣領導人之間的直接互動，透過個人外交與私下接觸鞏固互信；同時，他亦運用社群媒體對臺發佈訊息，超越形式性外交禮節，著眼於建立基於「共感與信任」的領袖層與公民層關係。

總的而言，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對臺政策，是安倍個人之信念、動機、決策風格與人際風格交互作用的結果，其核心在於以「價值共享」為軸心，構築嶄新的臺日關係。此一政策不僅在象徵層面與制度層面上深化了臺日關係，也成為展現日本主動外交方向的重要轉折點。

## 第二節 比較安倍兩任政策

安倍曾於 2006 年 9 月 26 日至 2007 年 8 月 27 日期間執政。然而，在其第一次政權期間，安倍推動對臺政策的力度極為有限，並未取得顯著的可見成效。個人的信念與世界觀等特質並非輕易改變的事物。若果真如此，那麼為何在第一次政權期間對臺政策並未受到積極推進，然而在第二次政權時卻明顯走向積極化？本文承認除了安倍晉三個人因素外，第二次政權期間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促成了安倍得以推動對臺政策。換句話說，即便安倍本人在個人特質和決策風格上對於臺日關係有意願推動，但也仍需要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氛圍的機會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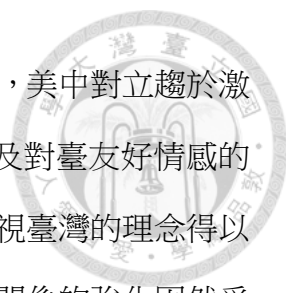
而在安倍兩任內閣時期中，最關鍵的環境因素即是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變。2006 年，第一次安倍政權期間的美國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對中政策，是一種結合對立與合作的方針。布希政府自競選階段起便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並與前任柯林頓政府強調經濟利益的外交方針形成對比，提出以安全保障為核心的外交路線（阿部純一，2003：3）。然而，隨著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布希政府將中國的定位由「競爭對手」重



新調整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並在反恐優先的前提下與中國建立起合作關係。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中國在中亞與巴基斯坦地區擁有顯著影響力，且能在恐怖組織監控與情報蒐集方面提供實質協助（和田大樹，2025）。儘管美國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提升、人權問題以及經濟影響力的擴大抱持警戒，但其對中政策仍屬於「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的框架之內，且反恐的優先順位極為突出。在美國與中國進行協調的情勢下，日本的對臺政策自然難以不趨於謹慎。相較之下，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自歐巴馬政府起即展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的「再平衡」（Rebalance）政策，而進入川普政府後更採取對中強硬方針，使美中競爭開始加劇。在此背景下，日本對美國對中協調政策的追隨制約有所緩解，因而更易推動對臺關係的強化。

儘管自歐巴馬政府時期起，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逐漸增強，但美國對中強硬政策明確化則是在川普政府上臺的 2017 年之後。然而，2012 年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政權，早在 2017 年以前便已開始推動對臺政策。因此，不僅是美中對立加劇這一國際因素，自 2010 年釣魚臺中國漁船衝突事件以降日本輿論中反中情緒的高漲、對民主黨政權的不滿與批判的擴大，以及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後臺灣對日援助所帶動的對臺友好情感上升等國內輿論的變化，亦是重要因素之一。根據言論 NPO 的調查，2011 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中，「比較沒有好感」與「非常沒有好感」合計達 78.3%；然而在 2006 年，這一比例僅為 36.4%（言論 NPO，2006；言論 NPO，2011）。由此可見，在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日本的對中輿論並未如第二次政權時期那般惡化。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隨著臺灣對日本震災的援助以及日中關係的惡化，日本國內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氛圍，即相較以往，因為顧忌中國而對臺灣採取無視或冷淡態度的做法變得不再容易（川島真等，2021：241）。此外，無庸置疑，自 2012 年起長達 7 年 8 個月的安倍長期政權所具有的政策連續性，也對推動對臺政策形成了助力。相比之下，第一次政權僅持續約一年。

從安倍自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以來與臺灣的交流經驗來看，其個人理念與對臺觀均展現出一貫性。然而，由於在第一次政權期間制度性制約較為強大，安倍個



人因素的影響並未得以顯現。相對而言，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美中對立趨於激化使對中協調的外部制約有所鬆弛，而國內對中國的警戒提升及對臺友好情感的增長，再加之長期執政所確立的穩固政治基礎，使得安倍個人重視臺灣的理念得以具體呈現並落實為政策行動。換言之，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對臺關係的強化固然受到安倍個人信念的影響，但本文亦承認促使其能付諸實現的機會乃是來自國際結構變化以及國內政治環境的共同作用。


### 第三節 卸任首相後與臺灣的互動

而當安倍卸下首相後，其需要考慮的國際外部因素和國內政治結構反而限制變小，因此個人特質和行事風格與意願就更為顯著。本節簡要檢視安倍晉三在卸任首相後，作為一名政治家與臺灣之間所展開的交流。即使在脫離執政黨權限的階段，安倍仍持續進行訪臺、與臺灣政要互動並參與民間活動，這些行動具體呈現出其作為個人所具備的問題意識與人脈網絡，顯示其對臺關懷並非僅源自政權運作層面的考量。

2020年8月卸任首相後，安倍晉三針對中國對臺灣及日本構成的侵略威脅，開始發表越來越直接而明確的言論。2021年12月1日，安倍晉三以線上方式出席由臺灣民間智庫——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影響力論壇」，並以「新時代的臺日關係」為題發表主題演講。安倍表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習近平主席絕對不可以誤判這一點」語氣強烈而堅決。他並進一步警告指出：「日本、臺灣，以及所有奉行民主主義的人們，都必須不斷向習近平主席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呼籲，切勿踏上錯誤的道路。軍事冒險也是通往經濟自殺之路」以此對中國提出強烈警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2021b）。<sup>60</sup>此番言

---

<sup>60</sup> 原文如下：「安倍氏は『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る。この認識を習近平主席は断じて見誤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強い口調で述べた。また、『日本と台湾、そし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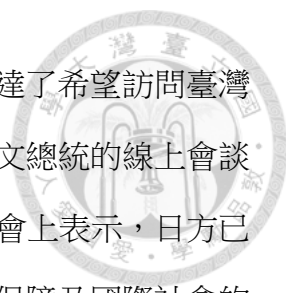
論隨即成為臺日兩國媒體的焦點，被廣泛報導並引發熱烈討論。有學者認為，安倍之所以發表「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論，其背後意圖在於透過營造「臺灣有事迫在眉睫」的危機感，來推動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轉型（岡田充，2023）。針對安倍的發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12 月 1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強烈不滿並堅決反對」，並強調「已透過外交管道提出嚴正交涉」，以強烈態度表達抗議（西本秀，2021）。

安倍亦持續透過社群媒體對臺灣發佈訊息。例如，2021 年 3 月，中國以檢疫為由禁止進口臺灣鳳梨。由於臺灣鳳梨外銷量中有九成以上依賴中國市場，此一禁令被普遍視為北京對蔡英文政府施壓的手段（日本經濟新聞，2021a）。隨後，日本國內出現了結合親臺與反中情緒的「挺臺灣鳳梨」運動。同年 4 月 28 日，安倍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一張自己手持臺灣鳳梨、面帶笑容的照片，此舉隨即成為臺灣媒體關注與熱議的焦點（家永真幸，2023）。2025 年 9 月 16 日，臺灣外交部長林佳龍在其臉書上表示，今年出口的臺灣鳳梨中，有超過九成銷往日本。此外，他並表示感謝道：「2021 年，中國突襲宣布禁止臺灣鳳梨進口，在農民最艱困的時刻，日本率先伸出援手。前首相安倍晉三更在社群媒體貼出自己與臺灣鳳梨的合照，讓「自由鳳梨」一夕之間知名度打開」（楊堯茹，2025）。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包括安倍前首相在內的日本政界人士，對臺海與兩岸關係議題的關注再度升溫。3 月 22 日，安倍以顧問身分出席在東京舉行的跨黨派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總會，並在會中與蔡英文總統進行了線上會談。依據報導，雙方就烏克蘭局勢及臺日關係交換了意見。蔡總統對日本重視臺海和平與穩定一事表達感謝，而安倍則被認為在會談中闡述了自己對「臺灣有事」的看法。此外，安倍也在其推特上表示，雙方在會談中「就決不能容許以武力改變

---

民主主義を奉じるすべての人々は、習近平主席と中国共産党のリーダーたちに繰り返し、誤った道に踏み込むなと訴えつづける必要がある。軍事的冒険は経済的自殺への道でもある』として中国をけん制した。」



現狀的企圖達成共識」。另據相關人士透露，安倍亦向蔡總統表達了希望訪問臺灣的意願（日本經濟新聞，2022a）。中國政府就安倍前首相與蔡英文總統的線上會談向日方提出抗議，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 24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日方已「適切地予以反駁」，並強調「臺海的和平與穩定對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日本經濟新聞，2022b）。

此外，4 月 12 日，安倍在美國《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發表了一篇有關烏克蘭局勢與臺灣問題的論文（日本經濟新聞，2022c）。安倍指出，美國對臺「戰略模糊」的政策，在過去美國軍事力量遠超中國時或許行之有效，但如今情勢已然不同。此一政策現階段只會加劇印太地區的不穩定，使中國低估美國的決心，並在臺北引發不必要的不安。因此，他呼籲美國政府應明確表態，「承諾保衛臺灣，抵禦中國的侵略」（傅長壽，2022；Liao, K., 2022）。

總而言之，安倍晉三在卸任首相後所展現的重視臺灣立場，依然一貫不變，充分體現出他個人信念與問題意識的堅定與深厚。自 2020 年卸任以來，安倍多次在國際場合明確指出，「臺灣有事」即是「日本與日美同盟的安全保障問題」，公開呼籲警惕並遏制中國的軍事行動。此外，透過與蔡英文總統的線上會談及在國際媒體發表評論，安倍反覆強調「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觀點，向國內外傳達其堅定立場。這樣的態度，體現在他以更明確的方式強調「防衛臺灣」的立場——這在其任內時期仍屬於謹慎克制的議題。正因卸任後不再受政治職務的拘束，安倍得以以更加直接、坦率的方式，對外傳達自身的信念與訊息。此中明顯體現出安倍「日本應由日本人親自守護」的信念，以及他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強烈關切與作為民主國家的責任意識。同時，也具體展現出他對臺灣社會的支持與民主夥伴間連帶的意志。

如此一來，卸任後的安倍作為一個人，以超越政府框架的方式，將臺灣視為日本外交的核心夥伴，並透過言行明確展現出這一立場。這樣的行動清楚顯示出，安倍的個人特質——特別是其「價值觀外交」與「安全保障上的危機意識」——即便在卸任後、脫離職務的情況下，仍持續以外交性的方式展現出來。他的言論所展現

出的連續性與一貫性，充分證明安倍對臺灣的重視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深植於其個人信念之中。



## 第七章 結論




### 第一節 安倍個人特質對臺政策的影響

本論文分析安倍個人的特質如何影響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日本對臺政策。安倍在一個政治家世家中成長，再加上當時革新勢力崛起的時代背景，使其在這樣的環境下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個人特質。他特別重視自由、民主、基本人權與法治等日本所奉行的核心價值，並堅信日本的安全應由日本人自身來維護。為此，他認為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也同樣重要，並以擺脫束縛戰後日本的既有體制、與各國建立更對等的關係，以及為維護自由民主的國際秩序展現更大的領導能力為目標。在決策風格上，他展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傾向，重視國家利益，並強調在情勢判斷上保持靈活。然而，對於涉及其核心信念與戰略方向的部分，他也具有在批評風險下仍不輕易妥協、堅持到底的強烈一面。在人際風格方面，他重視與各國領袖建立個人的信任關係，並擅長運用首腦外交。同時，他也善於任用與自身理念相近的人才擔任要職，並透過這些人員作為延伸，將其政策構想有效地傳達至國際社會。

可認為，這些個人特質在安倍政權推動對臺政策的過程中確已展現出其作用。為了在維護自由民主主義秩序中展現領導力，並在此過程中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臺灣被視為日本的重要合作夥伴。此外，尤其在《臺日漁業協議》的案例中，安倍的決策風格與人際運作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並最終促成協定的簽署。此外，從拔擢親臺派人士擔任要職、與李登輝與蔡英文等領袖建立關係，以及在社群媒體上與臺灣進行互動等作為中，也可清楚看出安倍個人對臺灣的重視，以及其個人特質對政策決策所產生的影響。

從他在第一次政權下臺後的潛伏期間中積極經營與臺灣的關係、涉入臺灣相關的外交經驗，以及在第二次政權卸任後對臺灣更明確的公開表述等情況來看，更可窺見安倍個人對臺灣的高度重視。安倍對臺灣的重視或許包含一定的親近感因



素。然而，本研究分析所顯示的是，塑造其對臺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實際上更應從他一貫追求的結構性外交理念與戰略目標中尋求，包括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回復、提升國際地位、維護自由民主主義秩序，以及因應地緣政治風險等面向。基於價值規範上的高度相近性，以及其所具備的地緣政治戰略重要性，臺灣可被視為在安倍外交中被合理定位為一個「戰略夥伴」。換言之，重視臺灣並非單純出於親近感的展現，而是作為一項結構性的戰略判斷，被納入安倍外交的整體架構之中。

此外，安倍自第一次政權起便已明確具有對臺灣的友好認知，以及足以影響外交政策的四項個人特質。然而，儘管具備這些特質，第一次政權期間仍未出現明顯的對臺政策作為。本研究也顯示，個人特質要能具體轉化為政策行動，仍需具備相應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作為支撐。在第一次政權期間，相關條件並未充分具備；然而到了第二次政權，由於中國威脅認知的增加、美國對中政策的轉向，以及日本國內反中與親臺輿論的高漲等因素，使得與安倍個人特質高度契合的環境逐漸形成。在這些條件齊備的情況下，安倍的個人特質得以更容易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行動。其結果，可認為對臺政策在第二次政權期間得到了大幅推進。

## 第二節 後安倍時期的發展

第二次安倍政權所建立的對臺關係架構，在安倍卸任後仍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延續性，甚至在部分領域上更進一步深化。2021年4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舉行日美首腦會談，並於同日共同發布了《新時代的日美全球夥伴關係》首腦聯合聲明。在該聲明中，日美兩國在表明反對中國以單方面方式改變現狀的立場後，並明確寫入如下內容：「強調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敦促兩岸問題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sup>61</sup>在日美首腦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及臺灣海峽，為自

---

<sup>61</sup> 原文如下：「臺灣海峽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を強調するとともに、兩岸問題の平和的解決を促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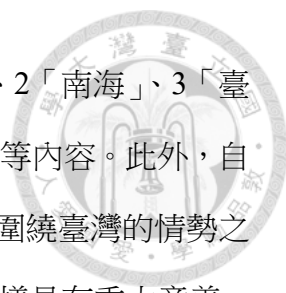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即 1969 年 11 月的聯合聲明以來的首次（中溝丘，2021）。

2021 年 6 月，自民黨的外交部會「臺灣政策檢討專案小組」發布了第一份建議報告。在這份文件中指出：「近年中國對臺灣施加的各類壓力不斷升高，已可能對日本的安全保障造成影響。在此情況下，本黨與臺灣之間的議員外交相較以往更具重要性，並有必要在更廣泛的領域，以更具組織性與功能性的方式加以推動」。<sup>62</sup>基於此，文件對未來強化與臺灣關係的方向進行了檢討（自民黨，2021）。同年 8 月，日本自民黨與臺灣民進黨首次以視訊方式進行協商，並就如何嚇阻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擴張行動交換意見。此次會議由自民黨主動發起，自民黨方面由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久與國防部會長大塚拓出席；臺灣方面則由民進黨立法委員、負責外交事務的羅致政以及負責國防事務的蔡適應參與討論。日本方面將此視為外務與防衛主管部長級協議「2+2」的「執政黨版本」，並藉此展現深化議員層級外交的方向性（日本經濟新聞，2021b）。其後，在同年 12 月舉行了以線上方式進行的「2+2」會議，討論外交與經濟安全保障等議題；並於 2023 年 3 月 21 日在臺北市首次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2023）。其後，即便日本政權發生更替，臺日之間的「2+2」對話機制仍得以持續運作。

此外，日本的政治領導人也開始公開討論一旦臺灣遭受攻擊時，日本在支援臺灣方面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雖然日本民眾確實對臺灣抱持良好印象，但這類情境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被視為敏感甚至帶有禁忌性的議題（Green, M. J., 2022: 57）。例如，自 2021 年版起，《防衛白書》中關於臺灣的相關記述有所擴充。在《防衛白書》第一部「我國周邊的安全保障環境」中，新增設了第三節「美中關係等」，置於原有的第一節「美國」與第二節「中國」之後。在這一新設節次下，又編排了「印

---

<sup>62</sup> 原文如下：「近年の臺灣に対する中国の各種圧力の激化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にも影響しかねない状況となっており、これまで以上にわが党と臺灣との議員外交は比重を増し、さらに幅広い分野で組織的・機能的に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



太地區的美中軍事動向」等項目，並在其中依序設定 1「概況」、2「南海」、3「臺灣」等小項目；其後並新增「臺灣的軍事力量與中臺軍事平衡」等內容。此外，自 2021 年版起，在這一新設的節次中，首次明確寫入如下內容：「圍繞臺灣的情勢之穩定，不僅對我國的安全保障至關重要，對國際社會的穩定亦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國有必要以更高的警覺持續加以關注」（日本防衛省，2021：52）。<sup>63</sup>

2021 年 3 月，時任防衛大臣、亦為安倍晉三胞弟的岸信夫在防衛省與訪日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伊德·奧斯汀舉行會談。會談後，岸防衛大臣表示：「雙方就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達成共識；同時，對於中國藉由《海警法》在東海與南海升高中緊張局勢一事，也同樣抱持深切憂慮」（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2021a）。2021 年 6 月，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表示，日本、美國等許多國家自 1970 年代以來一直遵循「一個中國政策」，但他坦言並不確定這是否是正確的判斷。他強調，面對中國對臺灣施加的壓力，「各國必須醒覺」。民主國家應當彼此守望相助，他並指出：「我們有必要守護作為民主國家的臺灣」（ロイター，2021）。2022 年 1 月，「臺日安保夥伴關係論壇」以線上方式舉行。臺灣方面由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立法委員王定宇、趙天麟與林靜儀三人出席；日本方面則由自民黨前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與總務副大臣田畑裕明兩人參與。會中針對制定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等議題進行了討論（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2022）。此外，2022 年 12 月，日本政府經內閣會議決定修訂新版的「安保三文件」。此次修訂的背景，正是基於區域安全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圍繞臺灣海峽所產生的日益增長的安全關切。2023 年 8 月，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訪臺並發表演說。他在談及臺灣有事時指出：「僅僅投入資金、具備防衛能力還不夠，真正關鍵時刻必須能為防衛臺灣而加以運用」。<sup>64</sup>他並強調：「包括日本、臺灣、以及美國在內的志同

<sup>63</sup> 原文如下：「臺灣をめぐる情勢の安定は、わが国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であり、わが国としても一層緊張感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

<sup>64</sup> 原文如下：「お金をかけて防衛力を持っているだけではだめで、いざとなったら臺灣防衛の

國家，必須具備使嚇阻力真正發揮作用的決心，也就是做好『戰鬥的覺悟』(大橋拓史，2023)。<sup>65</sup>

傅長壽針對安倍政權以後日本對臺政策的變化進行分析時指出：「在安倍的努力以及其他原因之下，日本政府已經開始放鬆之前僵化的一個中國政策。最明顯證據，就是首相、日本防衛大臣和防衛副大臣這類高階官員，先後公開發表了挺臺言論，無懼於這樣通常會激怒中國」(傅長壽，2022)。如前所述，安倍本人在卸任後也明確指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除了安倍之外，亦有許多高層官員主動就臺灣的安全議題發表積極談話，同時可以觀察到，在政府相關文件中，臺灣安全的重要性也愈加被明確地呈現。

### 第三節 研究貢獻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的意義在於，除了延續以往著重於結構性因素的論述外，亦將分析焦點置於作為政治領導人的安倍晉三之個人特質，從而探討其如何影響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日本對臺政策的強化。先前的研究多將美中關係的變化、中國崛起、國內政治與民意等環境因素作為主要的解釋變數。本研究則在考量上述環境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安倍的信念、動機、價值觀與決策風格等個人特質如何影響對臺政策的方向，從而提供一種可補充既有研究的分析視角。

此外，本研究亦在釐清安倍個人特質如何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具體途徑方面具有其貢獻。以往的研究傾向將安倍外交中所強調的價值觀外交或對臺觀，解釋為一種對外展演的規範性論述。然而，本研究指出，這些立場實際上植根於安倍個人的內在信念，並且正是在此信念的延伸之下，臺灣被定位為共享普世價

---

ために(防衛力を)使う。」

<sup>65</sup> 原文如下：「日本、臺灣、米国をはじめとした有志国は強い抑止力を機能させる覚悟が求められている。戦う覚悟だ。」



值的重要夥伴。此外，本研究亦著眼於安倍的人際風格及其非正式網絡對政策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具體分析了其與李登輝、蔡英文等人的個人互動、親臺派政治人物的重用，以及透過親近人脈發出政策訊息等現象，從而呈現領導人個人的對人行為如何實際反映於政策成果之中。上述分析在釐清個人特質如何轉化為具體政策成果的機制方面，對於個人因素研究具有理論與實證上的貢獻。

此外，本研究透過比較安倍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政權，指出在同一位領導者卻產生截然不同政策成果的背後，可能存在著個人特質與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作用。雖然在第一次政權期間亦可觀察到安倍的對臺認識及其價值導向的外交傾向，但當時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並未充分具備使這些傾向得以具體化為政策的條件。相較之下，在第二次政權時期，隨著美中關係的結構性變化、對中國崛起的警戒心理加深，以及國內民意中反中、親臺傾向的累積，形成了一個更有利於安倍個人特質得以顯現並轉化為政策行動的環境。對此脈絡的梳理，作為嘗試連結個人因素研究與結構因素研究的一項努力，或可具有一定的貢獻。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存在若干限制。首先，在取得與外交政策形成相關的一手資料方面，仍面臨一定的可及性限制。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關鍵文件與決策紀錄多半未予公開，尤其是首相官邸內部的討論過程，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層級的判斷過程，更是研究者難以直接取得。因此，本研究主要依賴公開文件、演說、國會答詢、媒體報導與先行研究等資料，無法完全重建安倍政權時期的政策形成過程。未來若政府文件的公開程度進一步提高，預期將有助於進行更為精細的分析。

其次，由於本研究以安倍晉三個人為核心進行分析，因此尚未充分與其他政治領導人或政權進行比較。若要更準確地評估安倍的個人特質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對臺政策，未來有必要選取在個人特質以及政策取向上均有所不同的領導者作為比較對象，藉此釐清個人層次因素在不同條件下可能產生的差異與影響。此外，除了關注領導者個人層面的影響，若能更為系統地納入政黨組織、官僚體制、

朝野關係與議會政治等制度性因素，將可更審慎地評估個人影響的適用範圍。

第三，本研究主要從日本方面的視角進行分析，對於臺灣一側的政策形成過程以及其國內政治動態如何影響對日政策，著墨仍相對不足。未來的研究亦應探討臺灣政府在對日外交中所具備的戰略意圖，以及其採取何種外交操作與政策判斷，進而引發日本方面的回應。由於臺日關係乃是在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形成，若能將臺灣方面的外交取向與國內政治的影響一併納入分析，將有助於建立更為立體且精緻的理解。

第四，本研究主要聚焦於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亦即 2012 年至 2020 年間的政策動態，而對其後的發展則僅進行概述性的整理。然而，自 2021 年以來，臺灣海峽情勢出現顯著變化，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亦發生明顯轉折，其中包括安保三文件的調整在內的多項動向都顯示出政策方向的變化。由於這些發展對理解日本對臺政策的制度化進程與政策框架的延續性具有重要意義，未來有必要更為細緻地分析安倍下臺後的政策演變，作為後續研究的重要課題。


未來的研究若能以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為起點，持續累積更多多元資料，並推進比較研究的深化，將更有助於拓展學界對臺日關係實態的理解，同時也將深化對日本外交中領導者角色的整體認識。透過這些努力，相關研究領域有望獲得更全面而精緻的發展。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份

- 小笠原欣幸，2020，「安倍政府與臺日關係」，自由時報網站：自由評論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98063>，2020/9/7。
-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2021，《臺日關係史(1945-2020)(Vol. 28)》，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贈勳表彰北村滋前局長對臺日關係貢獻 總統：維護區域和平穩定 臺日共同實現『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願景」，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131>，2023/12/26。
- 李中邦，2007，〈日本教臺灣搞和平獨立 前駐臺「大使」內田勝久的真心話〉，《海峽評論》，201：42-46。
- 何思慎，2010，〈釣魚臺爭議對臺日中三方的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8(10)：1-5。
- 何思慎、楊雯婷，2020，〈結構性限制：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臺日關係〉，《中國大陸研究》，63(3)：頁 83-118。
- 陈友骏，2016，〈安倍政府对臺政策思维及臺日关系走势〉，《国际关系研究》，1：頁 133-148。
- 林正義，2010，〈日本國家利益與臺海兩岸和解〉，《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臺日交流センター》，臺日研究支援事業報告書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14。
- 林賢參，2013，〈臺日締結漁業協議之意涵〉，《展望與探索月刊》，11(5)：17-25。
- 林賢參，2017，〈日本安倍晉三內閣對『中』避險戰略的臺灣因素〉，《展望與探索》，15(12)：頁 41-55。
- 张云，2019，〈日本对臺灣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日本学刊》，頁 1-22。


- 
- 郭育仁，2014，〈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46：46-47。
- 陳育晟，2022，「挺臺代言人驟逝！誰能接下安倍政治遺產，未來臺日關係怎麼走？」，天下雜誌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1911?\\_gl=1\\*\\_jdwoigm\\*\\_gcl\\_au\\*MTA0NjM0NTcyNC4xNzU2ODczMDg1&\\_ga=2.52517162.383910749.1757142690-1541325061.1756873086](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1911?_gl=1*_jdwoigm*_gcl_au*MTA0NjM0NTcyNC4xNzU2ODczMDg1&_ga=2.52517162.383910749.1757142690-1541325061.1756873086)，2022/7/8。
- 野嶋剛，2017，「野島剛：親日蔡英文上臺 臺日友好了嗎？」，天下雜誌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2964>，2017/6/7。
- 童倩，2012，「臺日漁業談判預備磋商未達一致」，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2/11/121130\\_jp\\_tw\\_finshing\\_meeting](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2/11/121130_jp_tw_finshing_meeting)，2012/11/30。
- 黃自進，2008，〈岸信介「反共親美」的戰略思想(1957-1960)〉，《亞太研究論壇》，42：1-32。
- 傅長壽，2022，「安倍晉三改變了臺日關係」，Anue 鉅亨網站，<https://news.cnyes.com/news/id/4935492>，2022/8/15。
- 廖克杭，2022，「【時事】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日本「戰後最友臺首相」對臺政策回顧」，換日線網站，<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6454>，2022/7/8。

## 貳、日文部份

- 秋田浩之，2024，〈日本の内政は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をどう動かしてきたかー「適応国家」の視点からー〉，《地政学時代の日本ー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新たな潮流ー》：23-34。
- 阿部純一，2003，〈米中関係における対立と協調:ブッシュ政権の対中政策を中心に〉，《国際安全保障》，30(4)：1-15。
- 安倍晋三，2013，《新しい国へー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日本：文藝春秋。
- 安倍晋三，2015，「内閣総理大臣談話」，内閣官房内閣広報室網站，[https://warp.n dl.go.jp/info:ndljp/pid/10992693/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https://warp.n dl.go.jp/info:ndljp/pid/10992693/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



- danwa.html, 2015/8/14。
- 安倍晋三、橋本五郎、尾山宏、北村滋, 2023, 《安倍晋三回顧録》, 日本: 中央公論新社。
- 安倍寛信, 2020, 《安倍家の素顔—安倍家長男が語る家族の日常》, 日本: オデッセー出版。
- 安倍洋子, 2022, 《宿命: 安倍晋三、安倍晋太郎、岸信介を語る》, 日本: 文藝春秋。
- 家永真幸, 2023, 「等身大の銅像を建立し、全土で半旗を掲げる…臺灣の人たちが安倍元首相を熱烈に支持する本当の理由」, President Online網站, [https://president.jp/articles/-/76792?page=2#goog\\_rewarded](https://president.jp/articles/-/76792?page=2#goog_rewarded), 2023/12/23。
- 池上寛, 2014, 〈懸案であった日本との漁業交渉で合意: 2013年の臺灣〉, 《アジア動向年報2014年版》, 189-216。
- 石田仁志, 2017, 「臺灣との関係は非政府間の実務関係、交流進めたい=菅官房長官」, 路透社網站(ロイター),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opinion/-idUSKBN16Z06I/>, 2017/3/28。
- 石原忠浩, 2016, 〈日臺関係の回顧と展望: 馬英九政権から蔡英文政権へ〉, 《海外事情》, 64(4): 91-108。
- 石原忠浩, 2017a, 〈日臺関係、対外関係をめぐる動向(2016年10月中旬~2017年1月上旬) 日臺海洋協力対話、日臺貿易経済会議の開催、トランプ蔡英文電話会談〉, 《交流》, 910: 24-30。
- 石原忠浩, 2017b, 〈第二期馬英九政権下の日臺関係の展開: 日臺民間漁業取決めを中心に〉, 《交流》, 921: 25-34。
- 石原忠浩, 2023, 〈政権交代期の日臺関係: 分析レベルの視角〉, 《問題と研究: アジア太平洋研究専門誌》, 52(2): 149-184。
- 宇佐美正行、中内康夫、寺林裕介, 2007, 〈「価値の外交」は日本外交の新機軸となり得るか~第166回国会(常会)における外交論議の焦点~〉, 《調査と立法》, 272: 3-12。
- 梅本哲也, 2020, 〈トランプ政権の対中認識・政策〉, 《令和元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中国の対外政策と諸外国の対中政策」》: 135-145。

- 
- NHK, 2010, 「普天間基地問題 鳩山政権迷走」, NHKアーカイブス網站, [https://www2.nhk.or.jp/archives/movies/?id=D0009030359\\_00000](https://www2.nhk.or.jp/archives/movies/?id=D0009030359_00000)。
- 大庭三枝, 2018, 〈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構想〉, 《国際安全保障》, 46(3): 12-32。
- 大川千寿, 2019, 〈第2次安倍政権とその政策〉, 《選挙研究》, 35(1): 5-18。
- 大橋拓史, 2023, 「麻生氏『いざとなったら臺灣防衛に防衛力使う』」, 産経新聞網站, <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30808-F6MMDS6Y5NN77HFUIBNZAFBWXE/>, 2023/8/8。
- 岡崎久彦, 2012, 《二十一世紀をいかに生き抜くか—近代国際政治の潮流と日本》, 日本: PHP研究所。
- 小笠原欣幸, 2014, 〈馬英九の博士論文から読み解く日臺漁業交渉〉, 《東洋文化》, 94: 61-87。
- 小笠原欣幸, 2022, 「日臺関係の50年 相互の好感度を高めた3つの出来事」, 小笠原ホームページ網站, <https://www.tufs.ac.jp/ts/personal/ogasawara/>, 2022/10/8。
- 岡田充, 2023, 「銃撃事件から1年。安倍元首相『臺灣有事は日本有事』発言が日米臺関係にもたらし、日中関係から奪ったもの」, BUSINESS INSIDER網站, <https://www.businessinsider.jp/article/272578/>, 2023/7/13。
- 小熊真也, 2013, 〈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決定における官邸主導—第一次安倍政権以降の展開—〉, 《安全保障戦略研究 = Security & strategy》, 3(2): 185-205。
- 小澤一郎, 1993, 《日本改造計画》, 日本: 講談社。
- 小野寺五典、高見沢将林、奈良岡聰智, 2022, 「安倍政治の外交・安全保障をふり返る —7年8カ月の歴史的意義—」, 公研網站, <https://koken-publication.com/archives/1704>, 2022/10。
- 川島真, 2013, 「『歴史的』日臺漁業協定締結—その意義と課題」, nippon.com網站, <https://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81/>, 2013/5/14。
- 川島真, 2020, 〈アメリカ新政権の成立と日米中臺関係〉, 《交流》, 957: 2-8。
- 川島真, 2024, 〈日臺関係のバージョンアップと「制度的」課題〉, 《交流》, 994: 1-6。

言論NPO，2006，「『第2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網站，<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853.html>，2006/8/2。

言論NPO，2011，「日本国民の中国へのイメージ形成が『生活感覚中心』から『尖閣』に移り始めてきた～『第7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網站，<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4165.html>，2011/8/11。

黄洗姫，2021，〈安倍政権のレガシー政治と日本外交の現実主義〉，《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会》，94(2)：297-315。

櫻井よしこ，2015，〈日臺の未来を語る 日臺で『対中国包囲網』を！（総力大特集 櫻井よしこさんへエール！）〉，《WiLL》，132：64-76。

佐々木貴文，2016，〈「日臺民間漁業取決め」締結とそれによる尖閣諸島周辺海域での日本および臺灣漁船の漁場利用変化〉，《漁業経済研究》，60（1）：43-62。

佐藤優，2016，「まさかのトランプ当選で慌てた日本外務省」，東洋経済網站，<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562027>，2016/12/3。

産経新聞，2015a，「安倍首相、李元総統と会談 軍事力増強の中国などについて協議か」，産経新聞網站，<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50724-L6BF2QG4CNOXXGZXKE7PW6M3ZU//>，2015/7/24。

産経新聞，2015b，「安倍首相、臺灣・次期総統最有力の蔡英文氏と非公式に接触か 政権交代見越し日臺関係改善の兆し」，産経新聞網站，<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51009-SK6BBIBWY5IY3GBT6AQJ3SHCXMX/>，2015/10/9。

産経新聞，2020，「茂木外相、蔡氏再選で『大切な友人』との協力深化に意欲」，産経新聞網站，<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00111-H6GDDGG5P5OCTNBTI5EFNX57F4/>，2020/1/11。

時事ドットコム，2022，「首相への一里塚？「自民党青年局」とは【政界Web】」，時事ドットコム網站，[https://www.jiji.com/jc/v8?id=20220318seikaiweb#goog\\_rewarded](https://www.jiji.com/jc/v8?id=20220318seikaiweb#goog_rewarded)，2022/3/18。

自民党，2012，「『中国側の主張に根拠なし。尖閣問題で譲歩するつもりはない』安倍晋三総裁が、バーンズ米 국무副長官と会談」，自民党網站，<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129557.html/10/15>，2012/10/15。

自民党，2021，「外交部会 臺灣政策検討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 第一次提言」，自民党網站，<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1712.html>，2021/6/3。

朱建榮，2010，〈尖閣問題が映す中国の論理と本音〉，《外交専門誌「外交」》，4：53-61。

信田智人，2011，〈第二部 第六章 公共財としての日米同盟と日本の役割—中国関係〉，《平成22年度外務省国際問題調査研究・提言事業報告書 日米関係の今後の展開と日本の外交》：199-214。

信田智人，2018，〈安倍晋三首相と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国際安全保障》，46（1）：68-87。

人民網，2017，「『推進役』引き受けた日本はTPPを救えるか？」，人民網網站，<https://j.people.com.cn/n3/2017/0428/c94476-9208875.html>，2017/4/28。

関野博，2017，〈アメリカのアジア太平洋リバランス：二重の安心供与〉，《海幹校戦略研究= Japan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Staff College review》，7(1)：34-54。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2011，「臺灣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1年6月1日）」，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網站，[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2060.html](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2060.html)，2011/6/1。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2021a，「日米防衛相会談、臺灣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認識を共有」，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網站，[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77279.html](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77279.html)，2021/3/18。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2021b，「安倍晋三氏、『臺灣有事は日本有事』」，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網站，[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82174.html](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82174.html)，2021/12/2。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2022，「臺灣と日本、国会レベルで初の安保フォーラム開催」，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網站，[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83374.html](https://www.roc-taiwan.org/jp_ja/post/83374.html)，2022/1/19。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2023，「臺灣と日本の与党、外交・防衛の2プラス2会合開催」，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処網站，[https://roc-taiwan.org/jp\\_ja/post/90833.html](https://roc-taiwan.org/jp_ja/post/90833.html)，2023/3/23。

臺灣光華雜誌，2013，「17年にわたる協議の末『日臺漁業協定』締結」，臺灣光華雜誌網站，<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ja/Articles/Details?Guid=e26e5f86-3f8b-4040-b73d-c36e597343ea&CatId=10&postname=17%E5%B9%B4%E3%81%AB%E3%82%8F%E3%81%9F%E3%82%8B%E5%8D%94%E8%AD%B0%E3%81%AE%E6%9C%AB%E3%80%8C%E5%8F%B0%E6%97%A5%E6%BC%81%E6%A5%AD%E5%8D%94%E5%AE%9A%E3%80%8D%E7%B7%A0%E7%B5%90&srsltid=AfmBOor-m9FwxXlDkSDEt44aWa25uxfWTPCVeFZQO3RIIRTBQU26GnEW>，2013/6。

臺灣新聞，2013a，「3.11 東日本大震災2周年追悼式で臺灣を指名献花の対象に」，臺灣新聞網站，<https://taiwannews.jp/2013/03/%EF%BC%93%EF%BC%8E%EF%BC%91%EF%BC%91%E3%80%80%E6%9D%B1%E6%97%A5%E6%9C%AC%E5%A4%A7%E9%9C%87%E7%81%BD%EF%BC%92%E5%91%A8%E5%B9%B4%E8%BF%BD%E6%82%BC%E5%BC%8F%E3%81%A7%E5%8F%B0%E6%B9%BE%E3%82%92%E6%8C%87/>，2013/3/7。

臺灣新聞，2013b，「自民党岸信夫・秋元司両議員インタビュー 日臺の良好な関係を『形』に」，臺灣新聞網站，<https://taiwannews.jp/2013/05/%E8%87%AA%E6%B0%91%E5%85%9A%E5%B2%B8%E4%BF%A1%E5%A4%AB%E2%80%A7%E7%A7%8B%E5%85%83%E5%8F%B8%E4%B8%A1%E8%AD%B0%E5%93%A1%E3%82%A4%E3%83%B3%E3%82%BF%E3%83%93%E3%83%A5%E3%83%BC-%E6%97%A5%E5%8F%B0%E3%81%AE/>，2013/5/6。

TAIWAN TODAY，2017，「日本臺灣交流協会、名称変更で日臺関係のさらなる発展を」，TAIWAN TODAY網站，[https://jp.taiwantoday.tw/%E3%83%8B%E3%83%A5%E3%83%BC%E3%82%B9/%E5%A4%96%E4%BA%A4/106683/gdp\\_r](https://jp.taiwantoday.tw/%E3%83%8B%E3%83%A5%E3%83%BC%E3%82%B9/%E5%A4%96%E4%BA%A4/106683/gdp_r)，2017/1/4。

高橋杉雄，2012，「米国の『リバランス』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東京財団網站，<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2273>，2012/11/14。

滝田賢治，2018，〈米中対立の背景と現状－対中「関与政策」の果てに－〉，《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年報》，23：109-129。

竹内洋一、山川剛史，2006，「『安倍氏ブレーン』どんな人？靖国、拉致、教育問題…」，東京新聞網站，<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022144738/http://www.>

- tokyo-np.co.jp/00/tokuho/20060909/mng\_\_\_\_\_tokuho\_\_000.shtml，2006/10/22。
- 田中靖人，2015，「蔡英文氏、会談相手は『答えられない』 派手な演出避け、日本からの厚遇勝ち取る」，産経新聞網站，<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51009-VAMAHGUBZ5MIXAHVXM2SNHFE5M/>，2015/10/9。
- 田中靖人，2017，「赤間二郎総務副大臣が訪臺、公務では断交後初」，産経新聞網站，<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70325-QWNRQSYRHNLFRBCWKZBGP6UPQ/>，2017/3/25。
- 谷崎泰明，2017，〈日本臺灣交流協会理事長就任御挨拶〉，《交流》，916：1-2。
- 中央社，2015，「〈蔡英文氏訪日〉歴代首相ゆかりの地訪問「指導者は寂然不動たるべき」」，中央社網站，<https://japan.focustaiwan.tw/politics/201510080004>，2015/10/8。
- 中華人民共和国駐日本国大使館，2013，「臺灣側の追悼式での献花は一つの中国政策に背くもの 外交部報道官」，中華人民共和国駐日本国大使館網站，[http://jp.china-embassy.gov.cn/jpn/lcibt/wjbfyr/202406/t20240612\\_11434476.htm](http://jp.china-embassy.gov.cn/jpn/lcibt/wjbfyr/202406/t20240612_11434476.htm)，2013/3/12。
- 陳冠伶，2016，〈同床異夢の日臺關係 -日臺断交危機（1963－64年）の再検討〉，《國際公共政策研究》，20(2)：93-107。
- 塚崎公義，2017，「TPP合意が米国抜きでも日本にメリットが大きい理由」，ダイヤモンドオンライン網站，<https://diamond.jp/articles/-/149891>，2017/11/17。
- 長島昭久，2022，「追悼：戦略的思考を貫いた大宰相・安倍晋三」，The Global Forum of Japan (GFJ) 網站，<http://www.gfj.jp/cgi/m-bbs/index.php?no=4796>，2022/8/23。
- 中溝丘，2021，「日米首脳共同声明で「臺灣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を明記」，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 網站，<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1/04/c1eb3c73e2f33d18.html>，2021/4/19。
- 名越健郎，2017，〈安倍外交に転機、戦略修正も（特集 我が国が直面する内政・外交問題）〉，《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季報》，74：54-57。
- 新垣拓，2023，〈米国と対中競争——固定化される強硬姿勢——〉，《大国間競争の新常態》：43-67。

西本秀，2021，「『臺灣有事は日本有事』安倍元首相が臺灣のシンポでオンライン講演」，朝日新聞網站，<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0PD1UHBI01K.html>，2021/12/1。

日本外務省，2012，「第一節2（2）臺灣」《地域別に見た外交》，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2\\_1.pdf](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2_1.pdf)，頁 52-53。

日本外務省，2013a，「第一節2（2）臺灣」《地域別に見た外交》，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3/pdf/pdfs/2\\_1.pdf](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3/pdf/pdfs/2_1.pdf)，頁 31-32。

日本外務省，2013b，「安倍総理大臣の政策スピーチ『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総理大臣演説，[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us\\_0222.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us_0222.html)，2013/2/22。

日本外務省，2015a，「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網站，[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114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1148.html)，2015/4/28。

日本外務省，2015b，「第一節2（2）臺灣」《地域別に見た外交》，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5/pdf/pdfs/2\\_1.pdf](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5/pdf/pdfs/2_1.pdf)，頁 41。

日本外務省，2016a，「臺灣総統選挙の結果について（外務大臣談話）」，日本外務省網站，[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1538.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1538.html)，2016/1/16。

日本外務省，2016b，「臺灣の地震に関する安倍総理大臣発馬英九総統宛て，岸田外務大臣発林外交部長宛てお見舞いメッセージ」，日本外務省網站，[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2/tw/page4\\_001756.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2/tw/page4_001756.html)，2016/2/6。

日本外務省，2018a，「第一節2（2）臺灣」《地域別に見た外交》，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2\\_1.pdf](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pdf/pdfs/2_1.pdf)，頁 38-39。

日本外務省，2018b，「第73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外務省網站，[https://www.mofa.go.jp/mofaj/fp/unp\\_a/page3\\_002562.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fp/unp_a/page3_002562.html)，2018/9/25。

日本外務省，2020，「第一節3（2）臺灣」《地域別に見た外交》，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1.pdf](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1.pdf)，頁 47-48。

日本経済新聞，2012，「尖閣国有化、66%が評価 本社世論調査」，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702X\\_X20C12A9EA2000/](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702X_X20C12A9EA2000/)，



2012/9/27。

日本経済新聞，2016，「異例づくしの安倍・トランプ初会談」，日本経済新聞網站，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518H1K\\_Y6A111C1EAF000/](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518H1K_Y6A111C1EAF000/)，2016/1/18。

日本経済新聞，2021a，「臺灣産パイナップル『日本に”買う”空気』 中国禁輸で 超党派の日華議員懇談会」，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DE2236B0S1A320C2000000/>，2021/3/22。

日本経済新聞，2021b，「日臺『与党版2プラス2』初開催 対中抑止を議論」，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73540X20C21A8000000/>，2021/8/27。

日本経済新聞，2022a，「安倍氏、臺灣総統とオンライン協議 訪臺の意向表明」，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2AKJ0S2A320C2000000/>，2022/3/22。

日本経済新聞，2022b，「政府、中国の抗議に反論 安倍氏と臺灣総統の協議」，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42Z50U2A320C2000000//>，2022/3/24。

日本経済新聞，2022c，「安倍元首相『米国は臺灣防衛の姿勢を明確に』」，日本経済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38T50T10C22A4000000/>，2022/4/13。

日本国立公文書館，2007，「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及び関係文書・御署名原本・昭和三十五年・第十巻・条約第六号」，国立公文書館網站，[https://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s35\\_1960\\_01.html](https://www.archives.go.jp/ayumi/kobetsu/s35_1960_01.html)。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2013，「第183回国会 参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10号 平成25年4月23日」，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網站，<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8315261X01020130423&current=4>，2013/4/23。

日本首相官邸，2007，「第166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網站，<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244428/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7/01/26sisei.html>，2007/1/26。

日本首相官邸，2020，「李登輝元臺灣總統の逝去についての会見」，首相官邸網站，  
[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2007/31bura.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2007/31bura.html)，2020/7/31。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6，「日臺関係の動向 2016年度」，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網站，  
<https://www.koryu.or.jp/publications/relation/trend/2016/>。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24，「公益財団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会と臺灣日本関係協会との間の取決め」，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網站，<https://www.koryu.or.jp/about/introduction/public/agreement/>，2024/12/19。

日本内閣官房，2014，「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逐条解説】」，内閣官房網站，[https://www.cas.go.jp/jp/tokuteihimitsu/pdf/bessi\\_kaisetsu.pdf](https://www.cas.go.jp/jp/tokuteihimitsu/pdf/bessi_kaisetsu.pdf)。

日本内閣府，2010，「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2年10月調査）」，内閣府世論調査網站，<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2/h22-gaiko/>，2010/12/20。

日本防衛省，2021，「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日本外務省網站，<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index.html>，頁52。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5a，「安倍首相、参議院の委員会質疑で『臺灣は重要なパートナー、日本の大切な友人』と答弁」，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50730/>，2015/7/30。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5b，「戦後70周年の安倍談話は臺灣にも言及」，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50814/>，2015/8/14。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5c，「李登輝總統の国会講演と安倍総理談話の背景について夕刊フジが報道」，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50819/>，2015/8/19。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6a，「安倍総理も菅官房長官も蔡英文氏の当選に祝意 米国は特使を派遣し祝意を伝える」，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60119/>，2016/1/19。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6b，「安倍首相『日本の古い友人である臺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には、とりわけ励まされました』」，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60419/>，2016/4/19。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6c，「【祝】交流協会が1月1日より名称を『日本臺灣交流協会』に変更！」，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



- o/20161228/，2016/12/28。
-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2017，「総務副大臣訪臺に中国『断固として反対』」菅官房長官『訪臺は意義あるもの』，日本李登輝友の会網站，<http://www.ritouki.jp/index.php/info/20170328/>，2017/3/28。
- 丹羽文生，2018，〈安倍外交と臺灣：その政治的系譜（特集 日本の政治経済情勢）〉，《問題と研究》，47(2)：141-171。
- 丹羽文生，2019，〈岸信介と蒋介石－蜜月関係の実相－〉，《拓殖大学臺灣研究》，3：1-25。
- 野上忠興，2015，《安倍晋三 沈黙の仮面 その血脈と生き立ちの秘密》，日本：小学館。
- 平川幸子，2022，〈安倍外交の検証：ASEANと臺灣への接近を中心に（特集 日本の内外情勢）〉，《問題と研究》，51(1)：65-98。
- 福田円，2014，〈ポスト民主化臺灣と日本：関係の制度化と緊密化（特集 繁栄と自立のディレンマ：ポスト民主化臺灣の国際政治経済学）〉，《東洋文化》，94：89-120。
- 舟津奈緒子，2020，〈トランプ政権の対中認識〉，《令和元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トランプ政権の対外政策と日米関係」》：33-38。
- 星山隆，2007，〈「価値の外交」は日本の新総合安全保障戦略－「普通の国」を目指して－〉，《IIPS policy paper》，331J：1-36。
- Marsh, J.，2022，「安倍元首相が銃撃で死去－各国・地域要人から寄せられたコメント」，Bloomberg網站，<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22-07-08/REOZYSDWRGG001>，2022/7/8。
- 前田達也，2017，〈オバマ期における米国防省の対中認識の推移〉，《海幹校戦略研究= Japan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Staff College review》，7(1)：55-75。
- 松本健一，2013，「日本は本当に右傾化しているのか『リアリズム外交が試される第2次安倍政権』」，言論NPO網站，<https://www.genron-npo.net/politics/archives/17603.html>，2013/2/25。
- 門間理良，2017，〈蔡英文政権下の日臺関係：日中臺は健全な距離感を重視すべ

- 
- き時（特集 中臺関係の現状と展望：蔡英文総統誕生から1年）》，《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レポート》，105：43-53。
- 楊鈞池，2016，〈馬英九政権期の日臺関係と今後の展望〉，《天理臺灣學報》，25：53-64。
- 楊堯茹，2025，「今年輸出の臺灣産パイン、9割超が日本に 林外交部長が感謝」，中央社網站，<https://japan.focustaiwan.tw/society/202509160007>，2025/9/16。
- 夕刊フジ，2015，「専門家も驚いた臺灣“厚遇”の背景 日米臺による中国包囲網への布石か」，夕刊フジ網站，<https://www.zakzak.co.jp/society/politics/news/20150818/plt1508181830003-n1.htm>，2015/8/18。
- 李易璵，2016，〈第2次安倍内閣の『積極的平和主義』における日臺関係の展望：『臺灣問題』から『臺灣カード』への変容〉，《問題と研究》，45(2)：147-182。
- ロイター，2021，「訂正 臺灣防衛に向け「目を覚ますべき」、中ロけん制＝中山防衛副大臣」，路透社網站（ロイター），<https://jp.reuters.com/world/IOR6IW4EWBPUHCZASTBYWDBEFU-2021-07-01/>，2021/7/2。
- 渡部恒雄，2017，「トランプ大統領誕生と日米の海洋安全保障協力」，笹川平和財団網站，[https://www.spf.org/opri/newsletter/403\\_2.html](https://www.spf.org/opri/newsletter/403_2.html)，2017/5/20。
- 和田大樹，2025，「対テロ優先から対中優先へ——9.11 から読み解く米中関係の転換」，Newsweek 網站，<https://www.newsweekjapan.jp/wada/2025/09/911.php>，2025/9/11。

## 参、英文部份

Carlsnaes, W. 2012. "Actors, structur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113-129.

Charlotte N. 2024.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efinition and Examples." *Simply Psychology*, Latest update February 13, 2024, <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com/>

gy.org/political-socialization.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



Dowse, R. E. and John, H. 1971. "The family, the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Sociology*, 5(1), 21-45.

Fukuda, M. 2013. "The Japan-Taiwan Fisheries Agreement Will Not 'Contain China'." *AJISS Commentary*, 179, 1-4.

Green, M. J. 2022. *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ō*.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rmann, M. G. 1978.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Why nations ac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90-103.

Hermann, M. G. 2003.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7: 178-212.

Hornung, J. W. 2021. "Abe Shinzō's Lasting Impact: Proactive Contributions to Japan's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ies." *Asia-Pacific Review*, 28(1): 22-48.

Hudson Institute. 2018.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Latest update October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

Hughes, E. S. and Riley, W. 2022. "Shinzo Abe's Taiwan Legacy." Hudson Institute, Latest update March 4, 2022, <<https://www.hudson.org/foreign-policy/shinzo>



abe-s-taiwan-legacy>.

Hyman, 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Free Press.

Liao, K. 2022. "Shinzō Abe and Taiwan-Japan Relations." Taiwan Insight, Latest update September 23, 2022,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2/09/23/shinzo-abe-and-taiwan-japan-relations/>>.

Nilsson-Wright, J. 2020. "Shinzo Abe: Revisionist nationalist or pragmatic realist?" BBC, Latest update August 29, 2020,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3950704> >.

Singer, J. 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1): 77-92.

The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

Waltz, K.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eh, Y. H., Tseng, H. S., Su, D. T., and Ou, C. H. 2015. "Taiwan and Japan: A complex fisheries relationship." *Marine Policy*. 51: 293-301.

Zhang, Y. 2017. "Shinzo Abe's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Foreign Affairs Review*, 6, 1-45.

